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 伟	朱 民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 祥
张卓元	陈 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高尚全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樊 纲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全球智库峰会专题 •

交流互鉴 合作共赢 携手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刘延东 (005)

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曾培炎 (010)

• 本刊专论 •

中国从“世界工厂”到国际产能合作
——中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 丁学东 (012)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新动力研究 聂振邦 肖金成 马庆斌 (021)

• 宏观经济 •

我国供需格局变化和政策选择 杨 萍 岳国强 (035)

• 国际经济 •

当前我国外贸形势分析及对策建议 王晓红 (054)

全面开放“一带一路”沿线口岸与各国打造命运共同体
沈进建 陈家勤 (073)

• 区域经济 •

新常态下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分析 黄茂兴 李军军 (085)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心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 产业发展 •

世界经济发展新动力与中国国企改革改革

李保民 李恒世 (099)

• 智库信息 •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共同宣言

(113)

加快期刊评价体系改革 促进中国智库刊物发展

——智库期刊评价体系研讨会综述

沈家文 (115)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19)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4)



CONTENTS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exchanges, mutual learning,
and win – win cooperation *Liu Yandong* (005)

Promot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Zeng Peiyan* (010)

China’ s Role from the “World Factory”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pacity
Ding Xuedong (012)

Study on New Impetus of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
Nie Zhenbang, Xiao Jincheng, Ma Qingbin (021)

Changes of National Supply – Demand Pattern and Choices of Policies
Yang Ping, Yue Guoqiang (035)

Analysis on China’ s Current Foreign Trade Situation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ang Xiaohong (054)

Opening up overall the Port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route and building the
common community of destiny *Shen Jinjian, Chen Jiaqin* (073)

Analysis on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 s provincial econom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ormal *Huang Maoxing, Li Junjun* (085)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Economy & the Restructuring and
Reform of Chinese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Li Baomin, Li Hengshi* (099)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Fourth Global Think Tank Summit (113)

Accelerating the Journal Evaluation System Reform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ink Tank Journals *Shen Jiawen* (115)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9)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4)

交流互鉴 合作共赢 携手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刘延东

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愿景的重要共识，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需要凝聚全球的智慧和力量，把握合作共赢基本主线，把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作为核心，推进经济、社会、环境平衡发展。加大教育发展力度，加强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形式创新合作，推动创新成果传播共享，深化人文交流，促进和谐共生，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治理体系。全球智库加强交流合作，多献务实之策，开辟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广阔空间，携手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全球智库 合作共赢

作者简介：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很高兴参加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六年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创办了首届全球智库峰会，秉持“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宗旨，搭建各国智库交流的平台，越来越彰显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今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再次相

^{*}本文为作者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聚北京。刚才，李克强总理会见了参会的中外代表，介绍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强调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希望各国智库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一会儿，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先生还要宣读潘基文秘书长的书面致辞。首先，我代表中国政府，对峰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各位中外嘉宾表示欢迎！

今年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收官之年，也是研究制定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关键之年。对中国来说，我们将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本届峰会以“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 年后新路径”为主题，可以说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一、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愿景的重要共识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愿景的重要共识。1992 年，联合国通过的《21 世纪议程》，提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明确了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成为推动 21 世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蓝图。20 多年来，各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也面临南北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全球气候变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挑战。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期盼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为突出，日益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指引着人类前行的步伐。

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是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哲学崇尚“天人和諧”“道法自然”，揭示的就是遵循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刻哲理。中国始终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众多、环境压力大，人均淡水、耕地和森林资源占有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8%、40% 和 25%。这一国情决定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必然选择。中国是最早通过《21 世纪议程》、最早制定《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第一个提前实现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使 6 亿多人摆脱贫困，减贫数量占全球的 70% 左右。中国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各级各类教育在校生 2.6 亿人，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中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均 GDP 仍排在世界 80 位以后，按联合国标准，中国还有 1 亿多贫困人口。近些年来，中国坚持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行动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更加扎实有效。

二、中国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坚定践行者

中国把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

进入新常态，我们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中国把推动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的。近年来，即使在受金融危机影响、财政增收减缓的情况下，民生投入依然不减反增，2014年国家财政用于民生的比例达到70%。我们把教育、卫生、就业、养老等民生事业摆在优先位置，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和全社会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超过4%和2%，技术市场交易额2014年突破8500亿元，近20年均增速超过15%，全民基本医保覆盖人口超过13亿，去年为76亿人次提供各类医疗服务。我们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国把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中国用占全球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全球1/5的人口。由于人口的基数很大，加上传统发展方式粗放，近年来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越来越突出。为此，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中国是一个煤炭大国，煤炭企业转型牵涉几百万煤矿工人的切身利益，但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积极推行煤炭清洁利用。北京和天津城区已关停所有燃煤电厂。河北省2014年削减煤炭消费量1500万吨，压减钢铁产能3000万吨、水泥近4000万吨。我们对一切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中国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保障。我们坚持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结构性调整，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坚定不移推进简政放权，两年多来国务院部门共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537项，本届政府承诺减少1/3的目标提前两年多完成。投资审核事项中央层面减少76%，境外投资项目核准除特殊情况外全面取消。工商登记实行“先照后证”，前置审批事项85%改为后置审批。中央层面取消、停征、减免了42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每年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近千亿元。这些都极大释放了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制定修改了《节约能源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和《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法规，为资源环境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中国积极加强与国际社会全面合作，携手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我们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的环境、资源、人口等的国际合作交流，努力促进国际社会采取新的可持续发展行动。去年中美共同发表《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今年中国还将建立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基金，并出资 600 万美元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 120 多个发展中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将始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发展的环境会越来越透明、公平、规范、可预期。我们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在逐步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积极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未来 5 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 10 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 5000 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 5 亿人次。中国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得到了 60 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迈出实质性步伐。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造福 13 亿中国人民，也给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三、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需要凝聚人类的智慧和力量

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面对恐怖主义、公共卫生、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可以说，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国际合作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015 年 5 月，中国向联合国转交了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最新立场文件，倡导国际社会在总结千年发展目标经验基础上，携手制定一个公平、包容、可持续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需要凝聚全球的智慧和力量。借此机会，我提四点主张，与大家交流。

第一，我们认为，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共赢是基本主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曾培炎理事长也讲到了，都肩负着促进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双重任务，迫切需要树立绿色增长、包容发展的理念。我们必须坚持把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作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推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平衡发展。各国应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博鳌论坛中所提出的，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只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与务实合作，努力维护多边贸易投资体制，共同培育全球大市场，避免市场分割和规则分化，就一定能够继续有效地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夯实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第二，我们认为，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携手创新是有效途径。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文明进步的战略支撑，是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创新密集的时代，也是一个创新合作的时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创新要素跨国流动、创新资源全球配置已成大势所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加大教育发展力度，提升人民的整体素质，才能为各国的创新创造奠定坚实的人力基础和智力支撑。只有推进创新合作，才能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创新收益，形成更强的创新竞争力。国际社会应该携起手来，全面加强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创新合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广泛分享创新经验，促进创新成果的传播共享，进而推动全球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创新，充分发挥创新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巨大作用。

第三，我们认为，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文明互鉴是关键支撑。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力量，只有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凝聚成文化的共识，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世界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杭州召开了“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会议，探讨如何发挥文化的独特优势，以实现包容性发展。人类面临的很多共同问题，都需要通过文明对话、交流合作寻求答案。特别是在人类同住地球村的今天，迫切需要我们文化的高度审视传统发展理论和发展道路，迫切需要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支撑力量，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增信释疑、沟通心灵、深化友谊的独特优势。各国应共同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观，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欣赏的眼光，理解和尊重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差异，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进，通过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夯实国家关系的社会基础，开辟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崭新境界。

第四，我们认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维护和平是根本保障。回顾历史，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和平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没有和平稳定的环境，全球可持续发展将无从谈起。不忘历史才能更好开辟未来。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我们应该汲取历史的教训，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治理体制，在各国人民心灵中坚定和平理念、扬起和平风帆，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世界。

四、全球智库共同开辟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广阔空间

中国西汉思想家司马迁有句名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智库作为思想的“梦工厂”和战略的“储备库”，在谋划发展蓝图、推动合作共赢、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旨在充分发挥智库的“外脑”和“参谋”作用，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下转第11页)

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曾培炎

摘要：《联合国千年宣言》代表当今世界谋求和平、合作与发展的主流，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但是实现情况还不很平衡。中国是千年发展目标的积极践行者，在国内提前实现了减贫目标，在国际上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国正在筹划提出“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国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努力。

关键词：联合国千年宣言 减贫 气候变化 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曾培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



2000 年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及其所确立的以减贫为核心的千年发展目标，是人类社会在世纪之交的一大创举，代表了当今世界谋求和平、合作与发展的主流。这一目标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15 年来，国际社会付出了不懈努力。今年是千年发展目标的收官之年，应该说，各项任务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还不很平衡，地区之间的进展也存在较大差距，促进未来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现在联合国正在筹划提出“2015 年后发展议程”，旨在指导今后国际社会的演进。展

^{*}本文为作者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望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对美好未来期待的增长，后 15 年的目标必将迈上新台阶，内涵也应不断拓展和充实。人类不但要生存，还要发展。消除贫困无疑还应该作为主旋律，以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所说，要“让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与此同时，还应更加关注全球可持续发展，这就对国际社会提出了更高要求。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合作，共同行动，平衡推进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的各项工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推进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消除地区安全隐患，实现包容发展、绿色发展的新模式。

中国是千年发展目标的积极践行者。在国内，提前实现了减贫目标，探索了一些有效做法，譬如基础设施先行、开发式扶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动员社会资源扶贫等，我们也愿与各国交流分享这些经验。中国正在制定下一个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强调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增进民众福祉，实现全民全面小康目标。在国际上，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期合作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推动具体务实行动，对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联合国千年宣言》使无数在饥饿和贫困中挣扎的人们看到了曙光。我真诚希望，“联合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将继续普照世界各地，使更多的人过上更加安全、更加平等、更加绿色、更加美好的“有尊严的生活”；推动世界更加持续、更加健康、更加稳定的发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愿意与国内外同行一道，尽责地提供智力支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努力。

责任编辑：李 蕊

(上接第 9 页)

为了深入推进可持续发展，我们愿意倾听世界的声音，也欢迎包括在座各位在内的各国智库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希望各国智库发挥优势，不断推出有创见、有价值的思想产品，多献务实之策，做资政启民的担当者；希望各国智库加强交流合作，碰撞思想，启迪智慧，做全球治理和发展的瞭望者；希望各国智库超越权力政治、地缘竞争等传统领域，常怀友好之心，多做友好之事，开辟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广阔空间，做人文交流的促进者。

责任编辑：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中国从“世界工厂”到国际产能合作

——中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

丁学东

摘要：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依靠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廉价的劳动力、土地成本，承接了大量的国际生产外包订单，充当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获得了贸易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近年来内部和外部形势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到了一个主观上必须转型、客观上不得不转型的十字路口。从国际经验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境外设厂、成立合资公司、开展跨境收购兼并等活动，是很多国家向海外延伸或调整产业链布局、转移国内优势产能、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本文探讨和回答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什么发展阶段，在向价值链高端迈进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和政策支持。

关键词：世界工厂 国际产能 全球价值链

作者简介：丁学东，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尚不牢固，世界格局正在经历深层次调整。新形势下，各国都在努力提升国际竞争力，争取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一方面，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裹足不前的情况下，多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快速发展，各国都在积极参与国际规

则体系的制定和重塑，特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TTIP）谈判，将对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体系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产业升级和制造业复兴战略^①，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同时，印度、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正利用低廉的劳动力，培育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受此影响，国际价值链分工正经历新的变化和调整。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依靠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承接了大量的国际生产外包订单，充当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获得了贸易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近年来，我们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形势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孟加拉、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加工制造业领域快速追赶，一些跨国公司开始调整亚洲地区的产业链分工布局，一个侧面反映是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逐年下降、跨国公司关闭中国工厂的报道不断增多。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不断加大，既有不少富余产能亟待消化和转移，又有众多产业亟需升级换代。近期，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制造 2025”计划，以及支持国际产能合作和推动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总体来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到了一个主观上必须转型、客观上不得不转型的十字路口。

从国际经验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ODI），通过境外设厂、成立合资公司、开展跨境收购兼并等活动，是很多国家向海外延伸或调整产业链布局、转移国内优势产能、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外直接投资反过来又会促进多双边贸易的增长和结构调整。在 2014 年，中国的 FDI 和 ODI 流量基本持平，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迎来了资本输出“元年”，需要从“世界工厂”变为资本输出大国。由此带来的思考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什么发展阶段，在向价值链高端迈进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和政策支持，这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例如，在国际商务研究方面，市场内部化理论借鉴了传统的交易成本概念，认为外部市场特别是中间产品市场是不完善的，跨国公司有必要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内部化”（即实现“控制”），从而降低全球生产经营的总体成本和风险。在发展的不同阶段，跨国公司会根据全球生产

^①例如：德国实施“工业 4.0 战略”、美国提出“制造业复兴计划”、英国在推进“高价值制造”计划、法国则提出了“新工业法国”的战略。

分工的总成本和收益，选择出口、特许经营或对外直接投资等不同运作方式，并选择最优的生产地点。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苹果手机，核心技术研发等高附加值部分在美国，零部件生产以及组装、加工等低附加值环节外包给亚洲地区的供应商或代工厂，以便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原材料。由于掌握核心技术、产品设计、品牌或销售网络等重要资产，使得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往往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布局，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跨国公司的研究为全球价值链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但是，由于大样本分析的数据来源受限，加上跨国公司内部的转移定价等问题，使得相关的价值链实证研究有时缺乏直观性。

目前，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主要采用贸易增加值和比较优势的分析框架，来衡量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增加值核算的是一国在出口贸易中的国内增加值部分^①，即本国真实的出口增加值（图 1）。据经合组织测算，2009 年中国出口总额中的国内增加值为 8650 亿美元，国内增加值率为 67.4%（即国内增加值占总出口比重）（图 2），虽较上世纪 90 年代有显著提升，但由于出口中仍有较大比重为加工贸易，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庞大（货物贸易世界第一），但质量不高，具有明显的“加工工厂”或“组装车间”的特征。在世界范围看，中国仍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端区间，与中国的全球贸易地位并不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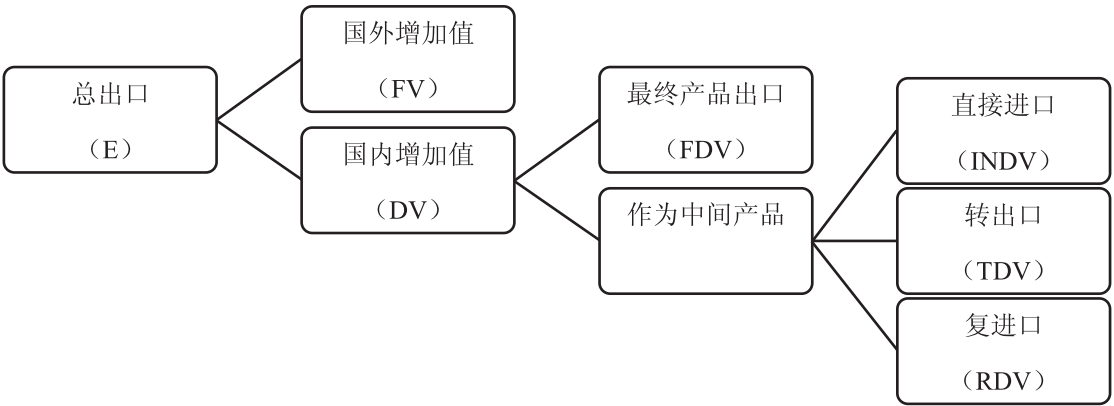


图 1 一国总出口的分解

^①例如：国家 A 向国家 B 出口 100 美元的中间品，在国家 B 加工组装后创造了 50 美元附加值，然后再向国家 C 出口总价值 150 美元的产品。如果按照增加值贸易核算，国家 B 的实际出口为 50 美元，而不是传统核算的 150 美元，无形中为国家 B 多计入 100 美元。所以，国家 B 的贸易顺差不是 150 美元，而是 50 美元。在全球出口中，约有 28% 是进口国仅仅为了将其作为生产某种出口商品或服务的中间产品而进口。例如，2010 年 19 万亿美元的全出口中，上述进口产品约有 5 万亿美元都属于重复核算（UNCTAD,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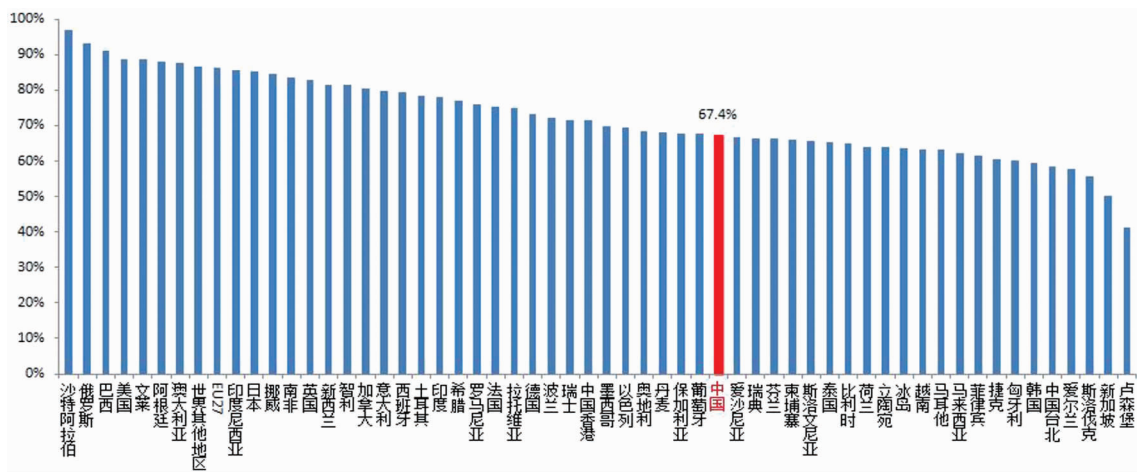


图 2 主要国家贸易增加值率情况

数据来源：OECD。

值得注意的是，经合组织的测算结果需要结合一国的经济体量和出口结构综合分析，譬如，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巴西等国家，主要是以能源资源等原材料出口为主，国内增加值率超过 90%，但这不足以反映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德国的国内增加值率大概 75%，但由于掌握核心技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较发达，特别是工业智能化水平高，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德国仍处于高端领域。因此，我们在分析贸易增加值的过程中，往往还需要辅之以行业方面的比较分析。例如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比较劣势的商品，从而获得利益。经合组织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指数）来衡量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分布，RCA 指数是一国某种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与世界该产品出口占世界总出口份额之比，若指数大于 1，说明该产品或行业在国际竞争中有比较优势，小于 1 说明该产品或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比较劣势。

经合组织的测算结果显示：（1）中国有少数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例如纺织服装、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等；（2）从趋势上看，电子及光学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技术 and 资本密集型领域的比较优势在不断提升，而其他行业的比较优势近年来出现下降；（3）与国际比较，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比较优势的行业分布总体上相对均衡，特别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竞争实力较强，相比之下，中国的制造业整体竞争实力仍有一定差距。但是，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比较（图 3），中国有不少领域的制造业竞争优势比较突出，例如纺织、机械设备制造、金属制品制造业、电子和光学设备等。在产业结构方面，我们也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有明显的互补优势，譬如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拉美国家在木材制造和食品饮料行业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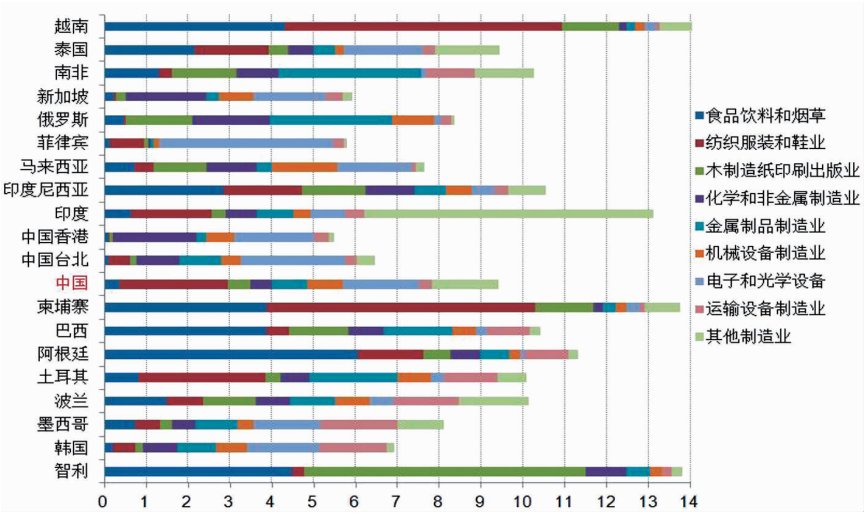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各行业 RCA 指数与新兴市场国家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OECD。

近期，中国商务部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也做了相关研究^①。基本结论与经合组织的核算结果大体一致，譬如：2013 年中国单位出口 1000 美元的国内增加值为 640 美元，相当于国内增加值率约为 64%。总体上看，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端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仍有较大的追赶空间，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比较，在一些领域已经具备了较强的产能输出能力。

三、未来方向和发展路径

（一）我们所处的阶段和未来发展方向

综合前述分析，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的出口增加值有所提高，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整体来看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端区间，与发达国家比较，出口行业结构较为落后，高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未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取决于国内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从制造业大国成长为制造业强国，需要在技术、产品、服务、人才、跨国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做大量储备和经验积累，这将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

不可否认，中国对外投资近年来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2014 年，官方统计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利用外资流量基本持平。但如果考虑到国内企业境外留存利润进行再投资或通过第三国投资等活动，那么根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① 商务部《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2014 年 9 月。

可能超出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大约 200 亿美元。从技术角度讲，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跨越成为资本输出大国、开启了资本输出“元年”呢？这一点的确需要商榷。

从国际经验看，在资本输出“量”提高的同时，不断加强资本输出的“质”，才能真正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例如，日本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资本输出主要为商品输出服务，具有极强的“顺贸易性”，仍未脱离广义贸易活动的范畴；到 70 年代后期，日本开始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开放资本项目，资本输出逐渐与贸易、技术并列，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之一，对经济推动作用明显加大；到 80 年代，日本则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资本输出大国，形成了以证券等金融产品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并重的资本输出新格局，成为影响国际资本循环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日本的资本输出在地区流向上更偏向于发达国家，同时私人资本取代国家资本成为主要的对外投资主体。

相比之下，中国目前仍处在资本输出的初级阶段，规模快速上升，但总体质量仍然偏低，距离资本输出大国仍有较大差距。一是对外投资存量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以获取自然资源为主要目的，并服务于商品生产和出口。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资本输出在很大程度上仍将侧重于推动国内商品、服务和产能出口。二是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比大约 55.2%，仍是对外投资的主要载体，民营和社会资本尽管在快速追赶，但还需要时日。三是国内仍存在资本项目方面的管制措施，对市场驱动、大规模、多元化的资本输出形成制约。

基于上述判断，中国向资本输出大国的转变需要较长时间，难以一蹴而就，目前正处于“世界工厂”向资本输出大国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优化产能布局+资本输出”，即一方面要保持“世界工厂”的竞争地位，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促进国内优势产能、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同时伴随着不断扩大的资本输出，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短期内，中国不能放弃“世界工厂”的地位和在一些传统制造领域的优势，这样做不仅不现实、不划算，也会给经济和就业增长带来问题。目前，中国中西部地区对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承接已现雏形，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一带一路”伟大战略设想，为促进和引领国内优势产能国际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样迅速，以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衡量，中国制造业成本处于东南亚主要竞争对手的中间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明显优势（图 4）。因此，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仅需要保持，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这方面中国制造业有空间、有条件，也现实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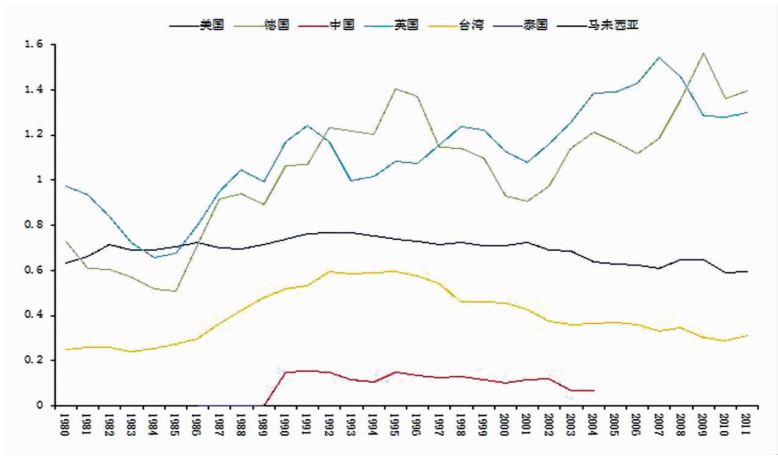


图 4 单位劳动力成本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Wind，安信证券。

（二）发展路径

中国制造业“保级升级”要注重合理有效利用产能，一方面要优化现有产能布局，将部分传统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保持中国“世界工厂”的优势，同时促进优质产能、技术、标准的输出，形成中国制造业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要通过资本运作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向制造业强国逐步推进。

一是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确保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竞争优势。以单位劳动力成本衡量，中西部地区仍具有一定的成本竞争优势，可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富余产能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在产能转移承接的过程中要有选择性。既要符合当地的发展方向，也要综合考虑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等因素，力争做到可持续。对于能够当地生产、国内市场消化的产能应当优先考虑。如果生产主要满足出口需求，则需要在出口通关、退税安排等方面予以一定的倾斜性政策支持，以便降低总体成本。

二是主要通过跨境兼并收购等方式，以资本输出支持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展。重点应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主导，通过开展跨境收购兼并、成立合资公司等方式，获取国际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品牌、国际销售渠道、创新式的商业模式和业态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要把“走出去”和“引进来”紧密结合，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和理念反哺国内市场，并推动国内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依托并逐步做强国内制造能力，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

三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支持并带动国内优势和富余产能向不具备比较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转移。高铁、核电代表着中国制造业的最高水平，对于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具有标志性和示范性的重大意义。从目前的海外投资实践来看，高铁、核电“走出去”的

难度不小。一方面有准入方面的障碍，例如地缘因素、投资保护主义、国际同业竞争等。同时，由于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盈利前景不确定，因此投资风险也较高，需要在资金和政策支持层面做出一揽子安排。在大力推动高铁、核电“走出去”的同时，中国也不应该忽视在大型基础设施的设计、建造和管理，以及钢铁、水泥、化工、建材、有色金属、平板玻璃、造船等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机会。实际上，中国在上述领域已经积累了比较扎实的工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国内生产能力富余，未来可以贴近国外消费市场开展属地化生产和经营，在国际产能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相关建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着力打造新型大国经济外交新格局，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并得到了绝大多数沿线国家政府的支持和响应。近期，国务院深入研究部署了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若干举措，对开展境外投资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在下一阶段国内企业深化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在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的同时，也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政府和市场需要有机衔接配合，企业方能借国家政策的东风顺利出海。而要把中国企业做大做强、推动中国从制造业大国成为制造业强国，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和配套政策支持。现阶段，有几个方面的关注点。

第一，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创新，提升全球产业链布局能力。一是应当注重加大股权直接投资力度，获取境外资产的所有权或长期经营权，以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回报，自然对冲一些周期性风险（例如：汇率、外国政府换届等）。股权安排要有流动性，以便满足企业或投资者的股权转让和退出需要。二是应当注重全产业链布局 and 资源整合，积极发挥协同效应和集群效应。譬如：应注重打造产业链联动的产融投资合作平台，关注多双边产业园区或自贸区建设，在做好项目总承包商的同时要努力成为项目业主，既带动上下游企业、国内大型成套装备走出去，也推动国内设计和技术标准、运营管理和人才走向国际市场。三是重大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应积极推广公私合营的合作模式，既减轻外国政府提供主权担保的压力，也可推动国内企业参与股权投资和投后经营管理。四是应当尽快研究推广融资租赁的合作模式，在中国购买或生产制造大型设备，租赁给外国政府或企业使用，收取设备的使用费，以此来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

第二，完善金融支持，形成多样化的金融支持体系。一是应当加强国内金融政策资源的统筹安排和布局，解决金融机构各自为战的现状。应抓紧设计包含对外援助、政府补贴、政策性金融、商业资本等在内的，最优的金融支持组合方案，降低整体融资成本，减少企业“走出去”的套利行为。二是抓紧推动并完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建设和运营，并依托国内现有机构，加强与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合作，搭建区域性多边金融合作平台，帮助解决一些国家和地区支付能力差、信用环境不佳的问题。三是应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开设海外分支机构，提升对国内企业的落地支持能力。四是应着力构建产融结合的多层次股权合作安排，便于股东多元化以及合作方式的多样化。

第三，以降低制度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切入点，提升国内开展国际合作的实力和效率。当前国内生产要素的成本推动压力愈发凸显，进一步降低成本的空间主要来自于体制机制，同时政策导向应当瞄准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是需要继续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深入落实简政放权，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二是需要加大国内人力资本和科研教育投入，加快提高人口质量红利和打造创新型社会。三是需要继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抓紧推广自贸区经验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打破不必要的行业垄断和市场准入限制，加快推进竞争性公用事业领域的公私合营合作，让改革红利更多地惠及民营企业 and 外资企业。四是需要加快落实“中国制造 2025”计划，大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以及在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先进轨道交通和新能源等领域的高端装备实现突破，提升中国企业的跨界资源嫁接、整合能力和国际化经营管理水平。五是需要合理引导和利用外资。重点应当加大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引进和转化力度，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

第四，注重国际化、专业化人才培养和用人机制建设。人才短板是制约国内企业“走出去”和有效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因素。一是应当着力构建能够有效吸引国际高端人才的体制机制，同时培养一批具有全球化思维、国际化视野的本土人才。二是在国内缺乏国际化经营人才的情况下，应当积极招聘和使用国外人才，特别是在海外收购或设立企业，应当通过全球招聘选择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三是应当注重用人机制建设。既要重视使用自己培养起来的人，也要重视建立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用人机制，使中资企业在海外能够招入和留住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包括中国人）。

第五，改进中资企业的形象宣传，既要树立自信又要增进互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是应当加强正面宣传，注重与世界各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沟通，依托企业的境外投资主体地位，注重按国际规则和市场规律办事。二是应当注重树立中资企业的国际社会责任，重视当地环境保护、宗教信仰等关切，适当参与当地的公益事业。三是企业应当深入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支持当地增加就业，突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精神，进一步促进与周边国家的信任 and 了解，消除不必要的顾虑，营造有利的国际政治和投资环境。

责任编辑：沈家文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新动力研究

聂振邦 肖金成 马庆斌

摘要：培育激发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力，对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有重大意义。建议以建设美丽乡村为总抓手，重点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工商资本进入现代农业、加速科技创新驱动、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农业保护区制度等几个领域开展工作，培育、激活农业农村发展新动力，实现农业农村绿色可持续发展，服务新常态背景下全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关键词：农业农村发展 新动力 工商资本

作者简介：聂振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肖金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与地区所所长、研究员；

马庆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中共中央 2015 年一号文件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这为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指明了方向。新时期，培育激发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力，对于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具有重大意义，建议以建设美丽乡村为总抓手，重点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工商资本进入现代农业、加速科技创新驱动、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农业保护区制度等几个领域开展工作，培育、激活、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新动力，实现农业农村绿色可持续发展，

服务新常态背景下全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一、加强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激发农村发展新动力

近几年来，各地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坚持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转变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有效途径，取得了明显成效。进一步加强美丽乡村建设，是广大农民实现小康愿景的迫切需要，“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必须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以农村垃圾和污水处理为切入点，以农民宅基地、承包地要素流转为抓手，以中心村、中心镇建设为支撑，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推动城乡一体化，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全面改善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

（一）以村庄规划编制为先导，统筹村庄综合治理

要把编制村庄布局和建设规划放在美丽乡村建设的首要位置，着力形成与城乡体系、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规划相互衔接的规划体系。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明确中心村镇、文化村、城中村等不同类型的村庄的发展定位，有序建设，避免出现“今天建，明天扒”的现象。结合土地综合整治，明确人口集聚区、现代农业和特色产业发展区、公共服务中心等建设内容。尊重农民的意愿、历史、文化和农村习俗的传承，紧密结合农民生活需求，对农村的民居、道路、垃圾污水处理、厕所改建等进行统筹规划。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美丽乡村融入大自然。

（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为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供保障

美丽乡村建设要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中心村镇为载体，推动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结构，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经济基础薄弱，自然条件艰苦，广大农民群众对农村环境改善的要求更为迫切，也更加需要政府投入，因此要加大对中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倾斜力度。统筹安排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等级公路、邮政、宽带等“村村通”，电视广播“村村响”和农村电话“户户通、城乡同价”。

（三）以农民群众为主体，充分发挥热爱家园、关心家园和管理家园的主人翁作用

要着眼于解决老百姓最迫切、最实际、最困难的问题，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把村庄环境整治的主动权交给农民自己，以农民群众为主体、政府规划为指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构筑农村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农村环境如何整治、如何规划、

由谁施工、由谁监管等主要环节，交由农民民主决定，发挥好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领导作用。同时，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移风易俗，逐步培养农民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四）以传统文化保护为依托，大力弘扬农村乡土文化

要注意保护、传承、发扬传统文化，把弘扬乡土文化作为彰显村庄特色的核心，通过开展特色文化村培育、历史文化村保护等，增强农村发展的吸引力、凝聚力和软实力。深度发掘农耕传统、民族风情和民间技艺等乡土文化，着力培育特色文化村，加快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乡土特色文化；围绕修复农村传统建筑、弘扬历史文化、打造宜居环境等，保护好历史文化村落；依托村内祠堂、会堂、闲置校舍等场所，建设集学教、礼仪、娱乐于一体的农民精神文化礼堂。

（五）以兴业富民为手段，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因地制宜，培育农村特色产业，打造农村经济新增长点，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鼓励农民创新创业，努力形成环境美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美丽乡村与农民富裕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把美丽乡村打造成助农致富的新亮点，充分发挥农村田园风光、山水资源等优势，运用经营村庄的理念，以休闲旅游、农家乐、民俗游等为载体，积极培育发展养生运动、文化创意等新型业态，发展景区经营、物业经营和配套服务等产业，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六）以形成乡村建设合力为目标，协调调动各方力量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政府推动、农民主体、企业和社团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建设美丽乡村的合力。中央财政要加大对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带动地方财政和社会资金的投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如，环京津地区周边农村治理直接关系到环境改善，国家对这些重点地区和环节应加大支持力度。创新融资机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农村资源要素可抵押、可流转、可交易，增强美丽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

（七）以生态文明为引领，推动乡村与自然和谐发展

从规划布局到建设实施，自始至终要贯彻生态环保理念。要在逐步渗入现代文明元素的同时，通过生态修复、改良和保护等措施，保护好农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妥善处理好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全面营造农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优美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八）以垃圾污水处理为突破口，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垃圾污水看似小事，但却是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最关注的问题。要清理露天粪坑、改造简易户厕，推行统一进厂处理、村域生态处理等污水处理办法，提高农村污水达标排放率。在推进农村垃圾集中收集的基础上，围绕解决农村垃圾收集易、无害化处理难的问题，以中心村为重点，辐射带动周边行政村的垃圾处理工作。同时，探索研究水泥窑、沼气池、太阳能等方式协同处理垃圾的新技术、新政策，努力形成各具特色、各有所长的多样化垃圾处理方式，不断提升农村垃圾处理水平。

（九）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引领作用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领导核心，要充分发挥他们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带头引领作用。通过落实经费、加强培训、明确职责等措施，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推动农村“末梢治理”。要加强与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的合作，可以在自然村层面设立互助会，管理生产发展、环境保护等公共事务。

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农业发展新动力

面对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加快农业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把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同时吸引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进入现代农业，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必由之路。

（一）当前我国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的四种模式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民家庭经营主体地位，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方式，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同时要因地制宜选择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目前，在各地实践总结出四种模式：一是“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农户”，农业公司是龙头，农业合作社是龙身，农户是龙尾，农业公司与农业合作社签订协议，双方是合作关系，农业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入社和退社的协议，双方是股权关系和劳动关系；二是“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农户”，农业合作社实际上是总公司，下面的每一家公司都是事业部，每户社员属于事业部的员工，这种模式的最大好处是稳定性强，持续性好，但是，人身依附较强，不利于人口流动，合作社之间形成了较高的壁垒，不利于统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三是“农户+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将涉及农业生产的公共事务分离出来，由专门合作社来承担；四是“家庭农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农场，据2012年调查的87.7万个家庭农场，经营耕地面积达到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

的 13.4%，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有劳动力 6.01 人，其中家庭成员 4.33 人，长期雇工 1.68 人，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达到 200.2 亩，是全国承包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 7.5 亩的近 27 倍。

（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大任务

第一，保持适当土地持有成本，可考虑征收耕地占用税，引导不种粮的农民将手中耕地流转出去，惩罚弃耕行为，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第二，加快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渠道，形成以社会养老为主体、家庭养老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模式，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医疗保障模式；第三，引导农民从分散居住向集中居住转变，在新的集中居住社区配套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环境保护设施，逐步将闲置、废弃的宅基地恢复为耕地；第四，以村为单位划定基本粮田，实施挂牌管理，严格保护，推进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加强基本粮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采取竞争性种植，培育种植大户，加强粮食收储机构与基本粮田种植大户的对接，农户可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基本粮田，分享收益并承担风险；第五，逐步做实集体经济，家庭可以土地使用权、林权入股，分享集体经济的收益，承担集体经济经营的风险；第六，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发展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三、引导规范工商资本进入现代农业，做强农村发展新动力

近年来，农业农村对工商资本的吸引力明显增强，一些国内外知名企业如高盛、联想等，均已涉足国内现代农业领域，到农村发展规模种养、绿色食品、设施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的工商企业越来越多。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大体分为两种基本模式：一是从农户手里租地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二是通过“公司+基地”“公司+合作社+农户”及股份合作等形式，间接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监管和服务，合理引导和加强规范工商资本进入现代农业领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工商资本为促进传统农业转型注入新活力

第一，为农业发展注入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通过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激发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活力；第二，引入工业化的理念、企业化的机制、市场化的运作，极大地改变了过去传统农业小农经济形态，促进了农业经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激发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活力；第三，工商资本立足于资源优势，重点投向设施农业、规模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观光农业等投资大、效益较高的领域，挖掘了

特色农业发展潜力。与此同时，也必须高度重视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可能带来的问题，如加剧土地流转“非粮化”甚至导致“非农化”，挤压农民的就业空间和经济利益，如经营不善会引发农村社会不稳定等等。

（二）引导规范工商资本进入现代农业的主要任务

第一，强化工商企业进入现代农业政策引导。建议国家强化顶层设计，明确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投入农业的重点领域，细化扶持政策，重点支持、引导工商资本发展良种种苗繁育、高标准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等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开发农村“四荒”资源发展多种经营。

第二，畅通社会资本进入现代农业渠道。通过支持组建各类农业产业协会，举办各种综合性或者专业性的农产品交易会等，搭建起政府与工商资本沟通的桥梁，使工商资本从过去面对广大农户，转变为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接，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业领域。

第三，修改完善《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土地用途管理，对进入农业领域所进行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工商资本实行以奖代补；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充实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内容，加强对流转双方的权益保护，规范土地流转的合同管理；严格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准入门槛，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中关于“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的要求，修改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明确工商资本流转农地从事农业经营的条件。

第四，完善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的监管、服务和履约机制。对工商资本进入现代农业可能带来的“非农化”“非粮化”等问题加强监管，严格农地用途管制，加强政策引导，稳步提高种粮比较效益；健全信息发布和价格形成机制，通过土地流转服务组织发布流转信息，公布流转市场参考价格，引导土地流转供需对接及形成合理价格；探索建立土地流转风险防范机制，探索设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企业诚信档案和农民工工资准备金制度等办法，降低土地规模流转过程中自然和市场风险对农民利益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五，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落实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功能的同时，加快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逐步提高农业保险风险保障水平，积极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努力满足包括工商资本在内的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保险需求。

第六，建立健全工商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以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入股龙头企业，形成产权联合的利益共同体；鼓励龙头企业通过规范购销合同、保底收购、利润返还等方式，保障农户利益；鼓励龙头企业创办领办合

作社，推进企业与合作社深度融合发展；把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方式、效果及其可持续性，作为评价和支持龙头企业的主要依据，加强对龙头企业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建设，探索建立淘汰退出机制。

四、加速科技创新驱动，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

（一）农业科技创新的总体要求

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水平决定农业产业竞争和分工格局。要适应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变化，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路线。按照增产增收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生产生态协调的原则，组织开展重大农业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快推进农业生物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农业工程技术深度变革，真正实现现代农业产出高效、产品安全、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发展目标。

（二）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大任务

第一，促进良种创新突破。“科技兴农、良种先行”，强大种业是现代农业的基础保障。一是新一代育种技术，推动我国育种实现从传统育种到分子育种的根本转变，加大种质资源挖掘和育种材料创新，建立现代生物育种创新体系；二是要针对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加快培育和推广一批作物新品种，要针对推进饲料粮品种、牧草品种等开展育种创新，引导粮食、经济、饲料作物进行“三元”结构调整；三是培育大品种研究平台，鼓励种业“走出去”“引进来”，打破院所和企业界限，汇聚全球一流的技术资源，加快形成链条完整、优势互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育种技术平台研究集群；四是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工厂化”运作的现代商业化育种模式，解决育种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的问题，既要打造2~3艘种业“航母”，也要加快培育专业化、服务型企业；五是提高企业商业化育种能力，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推动育种资源要素向企业流动，发挥现代种业基金引导作用，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打造一批育种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的现代种业集团；六是充分发挥市场在种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决打破地方封锁，清理废除任何阻碍外地种子进入本地市场的规定和做法，为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种业市场提供制度保障。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种子生产经营等微观领域的直接干预，积极推行负面清单等管理方式，完善“审”好品种的制度，创新“推”好品种的模式。

第二，因地制宜开展技术创新。重点突出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模式的差异化、特色化，形成多路径、多形式、多层次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格局。一是东部地区在着重发展第

二、第三产业的同时，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特色农业、都市型农业、节水型农业和绿色有机农业，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完善农业生产、经营、流通等服务体系，建设现代化的农产品物流基地，发展外向型农业，发展渔业及其加工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二是中部地区要建立农业专业化基地，稳定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并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拓展农业循环经济功能，加强粮食生产重大工程建设，引导资金向产粮大县倾斜，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食生产的科技贡献率，完善现代粮食物流中心建设，巩固中部地区小麦、水稻、棉花、双低油菜、肉牛肉羊、水产品等六大优质农产品，扶持构建区域优势农业体系，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巩固农业主产区地位，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积极建立围绕农业发展的新兴工业格局，形成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到食品加工工业再到出口农业等产业链条，有条件的地方要大力发展农业装备，全面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三是西部地区要构建市场取向下的生态、特色农业模式，发展农牧业是西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现实中心、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是西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潜在中心、发展特色农业是西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普适中心，以生物技术、小型农机、节水技术为突破口，构建我国西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四是东北部地区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和对黑土区水土流失的治理力度，加强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劳动产出率，由传统的农机装备向现代化农机装备转变。

第三，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和消费国，由于过量施用化肥、缺施有机肥，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土层厚度下降、土壤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加剧，耕地污染退化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1/10。生态农业包括绿色农业和有机农业。所谓绿色农业，是指按照规定有限度地使用化肥、农药、植物保护剂等化学合成物的农业生产方式，产出的是有助于公众健康的无污染产品。有机农业则不使用任何化肥、农药、饲料添加剂等化学合成物，也不采用转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目前，全国农作物绿色防控仅覆盖全国土地 20%，粮食供应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我国将长期处于初步生态化的阶段。全面生态化阶段，是以高端生态技术彻底取代化学手段，形成高端生态农业的新结构，全面实现高产、高效、优质、安全的目标，使古老的农业成为新兴产业。高端生态化阶段将彻底实现生态革命。

五、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搞活农村流通带来新动力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2014 年 12 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要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农产品电子商务可以解决中国农业“小农户与大市

场”的矛盾，实现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改善农产品流通状况，促进农产品贸易，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一）农村电子商务的现状与突出问题

2014年3月，阿里研究中心于发布的《阿里农产品电子商务白皮书》显示，2013年阿里平台上经营农产品的卖家数量约为39.4万个。但是，农村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农民电商发展面临缺乏宽带等基础设施、物流配送落后、店铺等级偏低、经营管理能力不足、学习条件严重缺乏等问题。

（二）农村电子商务的三大任务

第一，提升农产品标准化程度。要推动农产品电子商务健康和快速发展，应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主要包括产品品名和类别、质量等级、重量标准、包装规格、保鲜标准等。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应加强与农产品龙头企业的合作与联盟，通过农产品龙头企业，把分散化的农户集中起来，将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有机结合起来，严格管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等各个环节，推动农产品质量等级化、标准化、包装规格化。

第二，创新农产品配送模式。一是鼓励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自建物流，加强物流配送环节的管理，从配送上做到安全，并满足保鲜、外观无破损等感官上的特殊要求；二是引导农产品流通企业建立从农村到城市的仓储、冷藏、加工运输一体化的现代化物流配送体系，提高农产品包装质量和保鲜程度，及时、准点、便捷地配送到消费者指定地点；三是大力发展冷链物流，建立连接上游供货和下游消费的稳定流通渠道，增强配送能力；四是鼓励发展小区快捷配送，大力推广“快递驿”模式，在小区建立临时存取柜，实现农产品电商的集中配送、降低物流成本，方便消费者及时收货；五是整合现有网络直销平台，制定政策破解农产品电商投资大、竞争激烈的问题，鼓励企业抱团发展，实现规模化经营，推动农产品电子商务品牌化发展。

第三，引导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三个重点领域。一是重点推进生鲜农产品市场与供应大基地对接，与大宗农产品不同，生鲜产品大多数以非标准化的状态存在，常常出现销售大起大落的情况，地区之间在销售、价格等方面也有较大差异，推进生鲜农产品电商串联生鲜产业链，减少信息不对称，改善产销不均衡的局面，解决区域品牌优良但优质农产品滞销的矛盾；二是大力发展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垂直模式，垂直模式是指涉农企业中的龙头企业依靠其在产业链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利用规模优势和品牌实力，自建网站开展电子商务，服务于农业合作社和区域专业化生产等经营主体，整合产业链上

下游，消减中间环节，降低农产品的价格，提升竞争力；三是积极发展以中介企业为主导的模式，破解普通农户生产规模较小、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难以通过超市等途径进行销售的难题，借助中介企业对消费市场进行细分，提高农产品附加值，通过中介企业收集市场信息对农户生产进行指导，生产市场急需又无法规模生产的产品，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新动力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政府对农业生产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扶持力度。我国财政用于“三农”支出增长较快，但与强化农村基础地位相比，依然存在投入总量相对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资金使用和管理机制不完善、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方面的问题。

（一）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根据《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到 2020 年我国将要建成八亿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完成这一规划目标，需要进行大量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确保政府财政尤其是中央政府财政对“三农”投入的稳定增长。农村税费改革对县乡造成较大的冲击，地方财政负债运转现象较为普遍，基本保障能力较弱。进一步明确中央、省级财政在财政支农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确保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增强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的财力；逐步形成以中央和省级财政为主、以市县乡财政为辅的财政支农投入保障机制。

（二）优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农的方向和结构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财政尤其是中央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中存在生产性投入低、非生产性投入高，即用于农业主管部门的人员经费投入多，对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投入相对较少，主要农产品的补贴政策正承受着国际国内价格倒挂和“黄箱”政策接近上限两个“天花板”的挤压，农业增效、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不断加大。迫切需要优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农的方向和结构：一是逐步减少农业主管部门人员经费投入，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三农”支出中的比重；二是调整“黄箱政策”支出，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逐步减少对单个小规模农户的粮食直补，加大对家庭农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补贴。

（三）创新政府财政支农资金使用与管理机制

第一，整合现有财政支农资金，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成“项目”平台。在不调整原有管理体制、不改变资金原有性质的前提下，把农业基建投资、农业综合开发、水利建设基金、农村小型公益设施等方面的资金进行有机捆绑，按照统一的规划投入到重点区域，统筹安排使用，通过农业、水利、交通、扶贫等相关部门之间相互衔接、匹配投入、各司其职、项目共建、资源共享、利益均沾和政绩共现，实现涉农资金的有效整合。

第二，通过调整机构和职能实现农业资金整合，改变目前支农投资多头管理的局面。重点是理顺投资主管部门和财政主管部门在政府财政性建设资金分配管理方面的职能定位，改变单个部门既要管项目又管资金的格局，建立两部门间合理分工、共同协商、相互制衡和有效监督的机制，从源头上改变投资渠道多、使用分散的状况。

第三，创新支农资金管理使用新机制。可以考虑成立全国性农业行业协会，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进行管理，理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渠道；建立实施支农项目绩效评价制度，制定刚性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办法，实行严格的项目绩效评价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上级主管部门和县级财政部门要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通过开展支农资金绩效评价、支农资金使用情况分析，强化支农资金管理，提高财政支农项目尤其是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

（四）发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作用

培育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搭便车”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积极性的状况。一是设立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的专项资金，支持农民合作社等农业经营组织加强内部生产能力建设、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给予必要的资金补助；二是调整农村土地适度规模流转补贴政策，提高补助标准，扩大流转规模，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培育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引导和促进作用；三是加强乡镇公益性为农服务能力建设，全面建成乡镇农技推广综合服务中心，为农业经营组织发展提供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农技服务；四是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水平，增强其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组织职能，这是构建主体多元化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效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分类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农村建设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在农业基础

设施供给不足、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政府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通过进行产权制度、投资制度、融资模式等改革与创新，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增加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和提高供给效率，构建主体多元化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农业基础设施公共性的程度，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创新融资模式。将集体所有、不能正常运营的小型水利设施等农业基础设施出售或承包给私人经营；在按照项目性质、投资周期长短、投资额度大小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大型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农产品市场网络等具有较强收费功能的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利用建设—经营—转让模式进行融资建设；对具有较强外溢性、投资规模大、投资时间长、收益性较为明显的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如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等，采用公私合作（PPP）模式进行融资建设；对投资量大、周期长、收益稳定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农产品加工基地等农业基础设施项目，采用以项目所属资产为支撑的证券化模式进行融资建设。

七、建立农业保护区制度，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土地资源紧张程度尤为明显，必须探索一条将现行国土规划及土地用途管制政策与市场化改革目标相衔接的新路子，既能有效保护乃至扩大我国农业用地，又能适当满足各地城镇发展的用地需求。农业保护区制度在大部分发达国家以不同形式存在，这一制度既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土地整治，加强土地用途管制，推动农业现代化，也有利于保障各级政府“主体功能区”建设工作，提高土地的科学规划管理水平。

（一）农业保护区制建立的基本要求

第一，最大限度地将优质耕地划入农业保护区。可规定现有基本农田的 90% 必须划入农业保护区，尽可能将浅山区土地和各种不易发展规模化农业的土地划到农业保护区之外，鼓励城市经济部门利用这些土地。在农业保护区的监管中，建立土地肥力指数化动态管理机制。在谷物生产为主的农业保护区，农业设施占地不得超过农业保护区总面积的 0.5%。在畜牧业比重较大的农业保护区，畜牧业设施占地经济产出密度必须达到谷物生产占地十倍以上，否则不得批准建设新畜牧业设施。

第二，农业保护区内禁止发展任何非农产业。农业保护区内可以接待游客，满足游客度假观光需求，但不得建设经营性住宿设施；从事农产品流通与服务的企业，其管理机构不得进驻农业保护区；引导这些机构常驻农业保护区周边的小城镇。鉴于现有农区

已经有一定数量的非农产业，在开始划定农业保护区时可以允许非农产业存在，也可以允许已经脱离农业的人口居住，但非农产业只能减少，不能增加；除原住户新出生子女外，不得增加新的非农业人口。地方政府应制定规划与政策，逐步引导非农产业与非农业人口离开农业保护区。

第三，除面积在十万亩以上的连片农业保护区外，其他农业保护区内的各类居民点均不建设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设施，这类设施在保护区边界外的居民点按高标准建设。因此造成的不便，政府可只给专业农户提供补偿，以鼓励脱离农业的其他农户逐步离开保护区。面积为一平方公里以上、容积率为 1.0 以上的连片村镇建设用地，不得划入农业保护区。在村镇密集区域，区内所存在的农田边界的最大距离不超过 100 米，均看作连片建设用地。

第四，农业保护区边界的划定要尽可能有容易识别的标志作为参照，例如河流、重要道路、高压电线走廊以及重要永久性建筑等。农业保护区内可以有连片森林，但在一个农业保护区内连片森林的面积不得超过总面积的 30%；县域范围里，农业保护区内的连片森林面积不得超过农业保护区总面积的 10%；参照有关法规对森林进行保护。

（二）制定配套改革措施

农业保护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还需要有配套改革措施。

第一，下放土地管理权限。对农业保护区以外的其他土地，中央政府可将管理权限大幅度下放给地方。在相关法律修改之前，中央政府可授权省级政府国土部门代行中央政府权力。中央政府对农业保护区的土地规划与开发整理应直接管控，同时对其他类型土地的利用做“目标指导管理”。例如，设定“开发强度”“建设用地 GDP（国内生产总值）产出率”“居民住宅用地占用比例”“闲置土地占比”“基准地价偏离率”等指标，依据这些指标来确定土地用途改变的总量。

第二，以农业保护区发展为核心，调整财政支农政策。农村土地整理资金集中投放于农业保护区。农业保护区之外的户籍农民不再享受各类农业补贴，但暂时实际经营农业的农户除外。允许地方政府将此项调整所节约资金在农业保护区建设工作中统筹使用。

第三，建立“注册农业经营者制度”。注册农业经营者分为“公司法人农业经营者”“合作社法人农业经营者”与“自然人农业经营者”，后者主要为家庭农场。支农政策对这三类分别对待。

第四，扎实推进农村产权改革，落实中央关于农民土地承包权确权颁证的意见。

第五，国土资源部试行的“增减挂钩”政策继续执行，可考虑转化为一般性政策，

但具体规定应作出调整。在农业保护区内，不得建设新的集中居住社区。应允许专业农户或家庭农场主分散居住。专业农户需要建设生产生活相结合的农庄，只能在保护区内部的村庄占地上安排。对于自愿迁出农业保护区并将宅基地复垦的原住农户，其出让宅基地的补偿标准，要参考城市建设用地的出让价位。城市建设用地因“增减挂钩”政策得以扩大时，应将一部分溢价收入用于农业保护区建设。

第六，试行农业经营者规模管理政策。区别不同品种、不同生产方式，确定农业经营者的最大规模。例如，粮食经营的最大规模为 300 亩、蔬菜水果生产最大规模为 30 亩等。具体标准由地方政府做出规定，旱作农业的最大规模可适当扩大，最大规模的标准可三年调整一次。

第七，适当调整地方行政区划。支持农业主产区的小县合并为大县，或建立专门的管理区等，以提高农业县的财政脱困能力。

第八，在放活地方用地自主权过程中，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城市建成区（包括工矿区）经济密度规定进行监控，制定监控指数，建立预警信息发布机制。核心监控指数为城市建成区经济密度三年动态平均指数。

参考文献：

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调研报告》，《全球化》2014 年第 5 期。
2. 赵海艳：《如何加强支农资金管理的审计工作》，《农民致富之友》2013 年 19 期。
3. 韩长赋：《改革释放种业活力》，农博网，2014 年 5 月 20 日。
4. 褚兴海：《谈谈加强支农资金管理的对策》，《现代农业》2013 年第 5 期。
5. 周希祥：《财政涉农资金管理面临的问题与整合建议》，《农村财政与财务》2011 年第 5 期。
6. 张晓非：《浅论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管理学家》2011 年第 3 期。
7. 潘锋：《积极探索新农村建设投入新机制——临泽县整合支农资金的实践与思考》，《发展》2006 年第 8 期。
8. 经济研究参考课题组：《提高广西预算支出进度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9 年 35 期。
9. 李若云：《整合财政支农资金确保提高使用效益》，《农村财政与财务》2008 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李 蕊

我国供需格局变化和政策选择

杨 萍 岳国强

摘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看，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具有投资率高、对外需依赖较大的特点，内需、外需先后成为经济增速上行的推动力量。从“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条件及国际经验看，在需求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内需和消费的增长；在供给方面，我国将更多地依赖技术进步和资本增长。我国可能采取供求结合的政策选择：放宽行业进入限制，不断完善市场环境，促进服务业中技术进步较快部门，如信息和通讯部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加快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领域的改革步伐。

关键词：需求格局 供给格局 供求结合

作者简介：杨 萍，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岳国强，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投融资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面临下行压力，2015年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显现。在此期间，学界出现了对我国投资和经济增长可能发生断崖式下跌的担心。为了把握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及变动趋势，更好地为宏观决策服务，我们从供需格局入手，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演变历程，估计和判断“十三五”时期我国可能的经济增长状况，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需求格局

国民经济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个部分。消费和投资之和可称为内需（或内部吸收^①），净出口可称为外需（或外部吸收）。

（一）外需和内需

1. 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内需、外需构成看，我国一直是以内需为主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投资和消费（即国内需求）占 GDP 的比重始终在 90%以上，净出口自 1994 年以来一直为正，而之前的年份则有正、有负（见表 1）。

表 1 1978 年—2013 年支出法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

年份	内部需求			外部需求
	最终消费率 （消费率%）	资本形成率 （投资率%）	国内需求占比 （消费率+投资率%）	净出口占比 （%）
1978	62.1	38.2	100.3	-0.3
1979	64.4	36.1	100.5	-0.5
1980	65.5	34.8	100.3	-0.3
1981	67.1	32.5	99.6	0.4
1982	66.5	31.9	98.4	1.6
1983	66.4	32.8	99.2	0.8
1984	65.8	34.2	100.0	0.0
1985	66.0	38.1	104.1	-4.1
1986	64.9	37.5	102.4	-2.4
1987	63.6	36.3	99.9	0.1
1988	63.9	37.0	100.9	-0.9
1989	64.5	36.6	101.1	-1.1
1990	62.5	34.9	97.4	2.6
1991	62.4	34.8	97.2	2.8

^①国内消费和投资之和常常被称为吸收，这里为方便理解和分析将之称为内部吸收，净出口部分称为外部吸收。（吉利斯、波金斯、罗默、斯诺德格拉斯：《发展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P522。）

续表 1

年份	内部需求			外部需求
	最终消费率 (消费率%)	资本形成率 (投资率%)	国内需求占比 (消费率 + 投资率%)	净出口占比 (%)
1992	62.4	36.6	99.0	1.0
1993	59.3	42.6	101.9	-1.9
1994	58.2	40.5	98.7	1.3
1995	58.1	40.3	98.4	1.6
1996	59.2	38.8	98.0	2.0
1997	59.0	36.7	95.7	4.3
1998	59.6	36.2	95.8	4.2
1999	61.1	36.2	97.3	2.7
2000	62.3	35.3	97.6	2.4
2001	61.4	36.5	97.9	2.1
2002	59.6	37.8	97.4	2.6
2003	56.9	41.0	97.8	2.2
2004	54.4	43.0	97.4	2.6
2005	53.0	41.5	94.6	5.4
2006	50.8	41.7	92.5	7.5
2007	49.6	41.6	91.2	8.8
2008	48.6	43.8	92.3	7.7
2009	48.5	47.2	95.7	4.3
2010	48.2	48.1	96.3	3.7
2011	49.1	48.3	97.4	2.6
2012	49.5	47.7	97.2	2.8
2013	49.8	47.8	97.6	2.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2. 从不同时期经济加速增长的动因看，内需和外需先后成为三次增速上行的推动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 9.9%。根据 1978 年—2013 年的统计数据，期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特征，按

GDP 增长速度的“谷—谷”划分，我国经济增长可以划分成三个较大的周期（截至 2013 年，第三个周期尚未完成）（见图 1）。三个周期的经济增速上行期分别为 1981 年—1984 年、1990 年—1992 年和 1999 年—2007 年，下行期分别为 1984 年—1990 年、1992 年—1999 年和 2007 年—2013 年，三个周期中经济增速上行的动因各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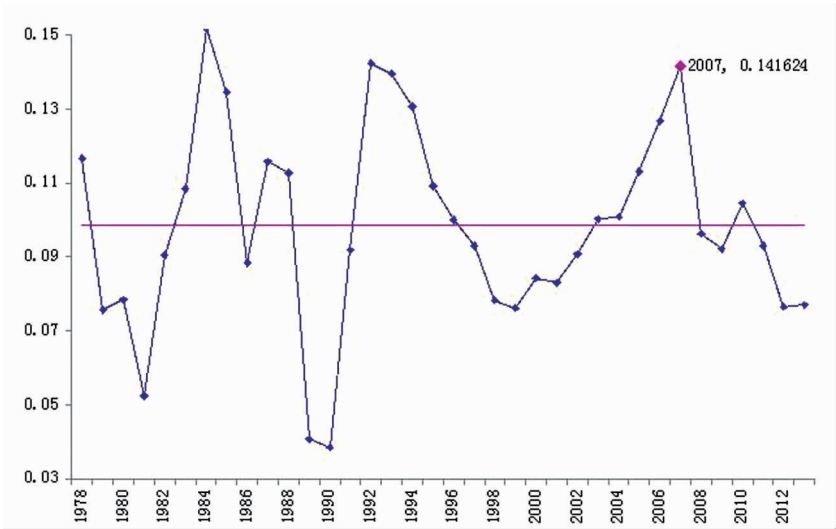


图 1 1978 年—2013 年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1) 1981 年—1990 年，内外需格局基本合理，内需是推动经济加速增长的动力来源。第一个周期中，我国内需与 GDP 之比的均值为 100.3%（见图 2）。内部吸收中，最终消费率阶段性均值为 65.1%，投资率阶段性均值为 35.2%（见图 3）。与内需相对应，外需占比为负，国际贸易略有逆差（见图 2）。从一个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角度看，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内外需格局基本合理。在这一轮周期中，经济增长率的峰值出现在 1984 年和 1985 年，年增长率分别达到 15.2% 和 13.5%，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分别为 102.7 和 109.3。从内外均衡的角度看，这个周期中，推动经济过热的原因是内需过快增长，1983 年—1985 年内需增速（以现价计算）分别为 12.1%、19.4% 和 28.3%，对应的支出法下 GDP 增速（以现价计算）是 11.2%、18.4% 和 23.3%，可见内需增速愈来愈高于同期经济增速。

(2) 1990 年—1999 年，对外贸易基本均衡，内需过快增长导致经济过热和物价过快上涨。在第二个周期中，我国内需均值与 GDP 之比为 98%（见图 2）。在内需中，最终消费率阶段性均值为 59.9%，投资率阶段性均值为 38.1%（见图 3）。这一时期的外部吸收为正，国际贸易有 2% 的顺差（见图 3）。从国际收支均衡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表现为基本均衡。此轮经济增长中，经济增速的峰值年是 1992 年、1993 年和 1994 年，年

增长率分别为 14.2%、14.0% 和 13.1%，CPI 连续三年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1992 年—1996 年的 CPI 分别为 106.4、114.7、124.1、117.1 和 108.3。从内外均衡的角度看，在这个周期中，推动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是内需连续四年以 20% 以上的速度（名义）增长，1993 年和 1994 年甚至超过了 30%（1992 年—1995 年内需名义增速分别是 24.3%、37.8%、31.8% 和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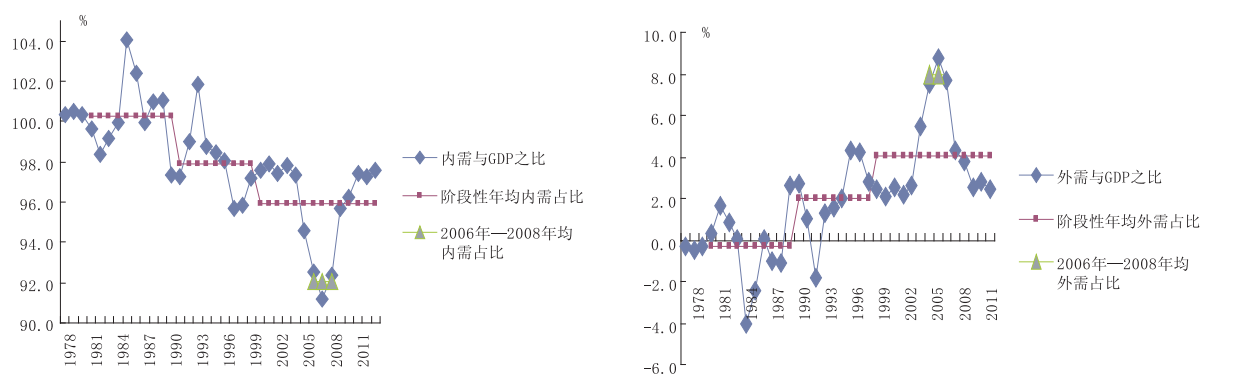


图 2 1981 年—2013 年我国三个周期中的内需和外需占 GDP 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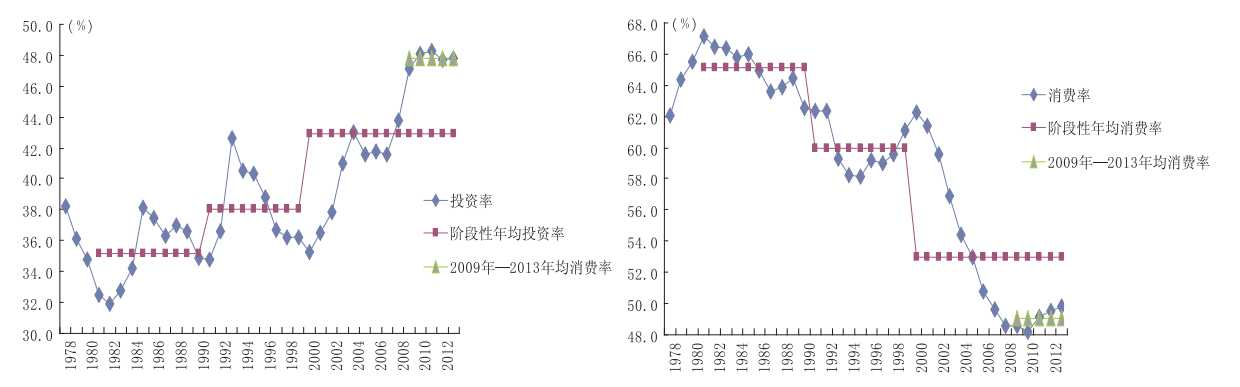


图 3 1981 年—2013 年我国三个周期中的消费率和投资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3) 1999 年—2008 年，内需占比持续下降，对外贸易失衡，外需强劲增长是推动上行期经济加速增长的主导力量。第三个周期（1999 年迄今）与前两个周期显著不同，我国的内需与 GDP 之比下降到 96%，2006 年—2008 年甚至只及 92%，从内外均衡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表现为严重失衡（见图 2）。在内部吸收中，最终消费率阶段性均值为 53.5%，2009 年—2013 年均值为 49.0%；投资率阶段性均值为 42.5%，2009 年—2013 年均值为 47.8%（见图 3）。这一轮经济增长率的峰值年是 2006 年和 2007 年，年增长率分别达到 12.7% 和 14.2%，2006 年—2008 年的 CPI 分别 101.5、104.8 和 105.9。另

外，2005 年—2007 年，外需名义增速分别为 141%、63.1%和 40.6%，内需名义增速分别为 13.1%、16.3%和 18%，对应的支出法 GDP 名义增速是 16.4%、18.8%和 19.7%。上述可见，在这个周期中，内需增速低于同期经济增速，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外部吸收的强劲增长。

3. 从内需、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内需的贡献始终为正，外需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1999 年—2007 年

在供需格局的研究中，我们更关注三个周期中的经济增速上升期，因为上升期不同的上行动力恰恰孕育着下行原因。在第一个周期的上升期（1981 年—1984 年），经济加速十个百分点，内部吸收增长构成主要动力，其中资本形成增长贡献了 69.7%，消费增长贡献了 53.6%。由于内部吸收增长超过 GDP 增长，外部需求的贡献为 -23.3%。在第二个周期的上升期（1990 年—1992 年），经济加速了 10.4 个百分点，同样由内部吸收的快速增长所推动，其中消费增长贡献了 87.7%，资本形成增长贡献了 54.1%，内部吸收增长较上一轮上升期更大幅度地超过了 GDP 增长，外部吸收的贡献为 -41.9%。在第三个周期的上升期（1999 年—2007 年）中，与以往经济加速期相比显著的不同点是，外部吸收成为经济加速上升的主要推动力之一。1999 年—2007 年 GDP 增速上升了 5.4 个百分点，净出口（外部吸收）贡献率高达 27.6%，资本形成和消费的贡献率分别为 46.7%和 25.8%，表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加速增长的“三架马车”。

第三个周期增长过程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回味，其上行期持续了八年。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以及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形成和快速扩张，开启了该周期的上行之势；以美元低利率政策推动的全球周期性繁荣为我国提供了广阔的外部需求；与此同时，全球结构失衡助推了这次国内上升期的高度与长度，使国内的结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国民经济内外失衡、消费—储蓄失衡愈加严重；最终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爆发为契机，以外部需求锐减的形式，我国经济进入 2008 年—2009 年的“硬着陆”调整。

（二）投资率和消费率

从国内需求来看，投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是我国经济结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1. 消费率总体呈下行态势，近期有小幅回升，但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下行态势十分明显，但近期有所改变。2010 年我国消费率仅有 48.2%，为历史最低水平，比改革开放初期的消费率水平低十个百分点以上。但自 2011 年以来，消费率出现小幅回升，2013 年为 49.8%，尽管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比

历史最低值上升了 1.7 个百分点。

从变化过程看，1978 年—2010 年，我国消费率出现了两次上升和两次下降的过程。但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消费率变化幅度，上升期都明显偏弱，以至于至今我国消费率还处于历史低位。另外，从两次下降期看，1981 年—1995 年，14 年间消费率下降了九个百分点；2000 年—2010 年，十年间消费率下降的幅度为 14.1 个百分点，可见，21 世纪前十年，我国消费率在已有下降态势的基础上出现了加速下调情况（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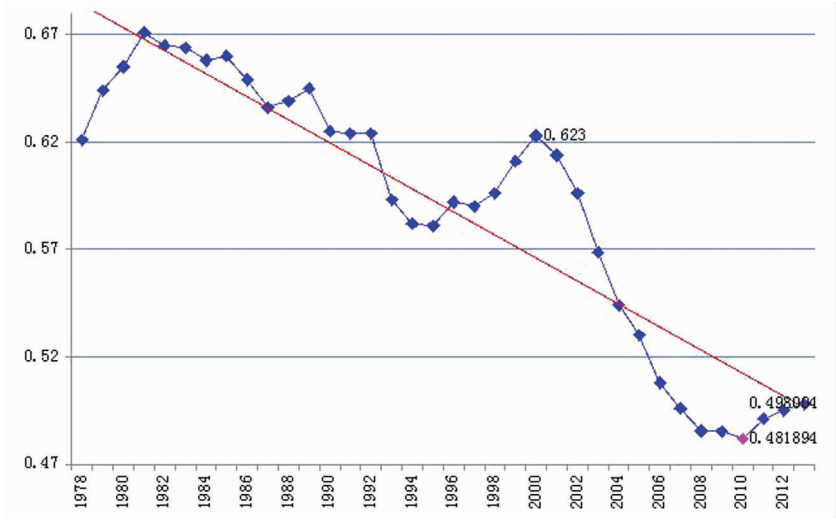


图 4 1978 年—2013 年我国的国内消费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2. 投资率振荡上行，近期有向下调整的趋势，但仍处于历史高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总体呈现振荡上升的态势。其中，最小投资率出现在 1982 年，为 31.9%；最大投资率出现在 2011 年，为 48.3%；两者相差 16.4 个百分点。2013 年，我国投资率继续高位运行，为 47.8%，但较历史峰值 48.3%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

从变化过程看，投资率上下较大幅度振荡的情况主要出现在 2000 年之前，2000 年之后，特别是 2000 年—2011 年，投资率几乎呈持续上升态势，期间只在 2004 年—2007 年间出现过 1.4 个百分点的小幅回落（见图 5）。2000 年以来投资率的持续上升，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进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强劲增长。但是不容否认，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最终需求中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个部分之间出现了结构扭曲，消费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持续上升。

3. 过高的储蓄率和过分追求出口拉动倾向导致投资率过度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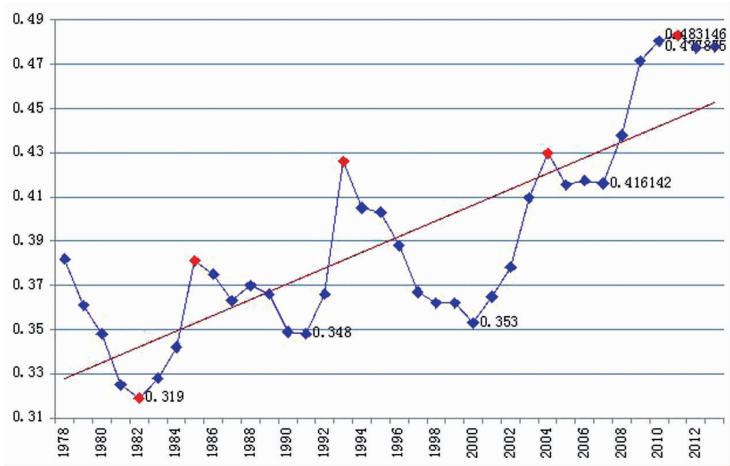


图 5 1978 年—2013 年我国的国内资本形成率（投资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导致投资率过度上升的原因，主要可由两个因素来解释^①：一是过高的储蓄率；二是过分追求出口拉动的政策倾向，尤其是低汇率安排。^②

（1）理论上讲，高储蓄率必定导致高投资率，否则将会出现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通货紧缩问题。开放经济下国民收入恒等式（ $S = I + CA$ ， S 为储蓄、 I 为投资、 CA 为经常项目余额^③）反映一段时间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它所体现的总需求增长结构是经济生活中国民及政府一系列决策后果的集中表现。这些决策包括：国民及政府在既定市场制度环境下，基于可支配收入所作的“消费—储蓄决策”；各类投资者基于资金供给成本与项目预期收益所作的“投资决策”；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而制定的各类“激励政策决策”；微观主体在既定价格、利率、汇率水平约束下基于收益进行的“内部投资和外部投资决策”等等。这一系列相互影响的决策结果，最终体现为恒等式中三个组成部分的消长。

国民的“消费—储蓄决策”是国民经济运行中一项最具基础性的决策。该决策产生的高储蓄率，虽不直接体现于宏观经济恒等式中，但却隐于恒等式的背后。这个决策的失衡必然造成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导致“内需不足、高投资率、高顺差”，是造成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居高难下”最为关键的变量，对其他总量指标变化均有着重要的、

① 详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课题组研究报告《促进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的思路 and 对策研究》（2008）。该报告分析了我国形成高储蓄的原因，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② 追求所谓“出口拉动”，显然不同于“鼓励贸易”。前者是追求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后者是注重不同经济体之间比较优势交换带来的贸易利益。

③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P294。

制约性的影响。

从实证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储蓄率与投资率变动的数量关系中直观地看到，储蓄率的上升为投资率的上升提供了现实基础，并推高投资率。储蓄率的提高，使投资资金供给更为充沛，有利于资金成本（利率）下降，导致在微观主体（依据项目收益水平和资金成本进行）的投资决策中，更多项目具有了投资的可行性，进而决定了全社会投资规模的扩大和投资率的上升。可以明确判断的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较高的储蓄率必定导致较高的投资率。

从结果来看，我国同时存在着高投资率（尽管它远远不足以消化我们的储蓄）和高净出口率（它意味着对应比例的收入在国内市场找不到对应的实物产品，从而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其根源显然在于，也只能在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①。

（2）持续的“低汇率安排”必然抑制消费率、推高投资率

持续的“低汇率安排”，必然在压缩内部吸收的同时，抑制消费率、推高投资率，并扭曲资金配置机制，推动出口部门投资过大。在国民收入恒等式中，CA毫无疑问表现为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但只有在汇率水平反映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处于或接近于均衡水平时，CA才真正表现为一个“被动存在的差额”或“平衡项”。在经济运行中，如果把汇率当作经济调节工具，并服务于扩大出口、增加就业，CA将不是一个由储蓄投资缺口决定的被动变量，而是一个被主动追求的目标（拉动经济的马车）。

当汇率被人为地控制在低于均衡水平以下的时候，根据吸收理论，将会扭曲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之间的比价（实际汇率），相对于非贸易品，可贸易品将变得更为昂贵。生产者会选择放弃非贸易品生产，转向可贸易品生产；而消费者则会相反地消费较少的可贸易品和更多的非贸易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选择的逆向变动，导致可贸易品生产量超过消费量，于是产生外部过剩（贸易盈余）。具体来看，将会产生以下三个宏观后果。^② 第一，持续维持低汇率，导致CA上升，会压缩总的内部吸收（消费+投资），也就是压缩内需。第二，持续维持低汇率，对内部吸收的两个组成部分的压缩并不是均等的，主要压缩了消费。第三，持续维持低汇率，从生产者的角度讲，将持续刺激贸易品部门（在我国集中表现为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增长，妨碍结构调整。可见，人为的低汇率安排，

^①我国高储蓄率产生的原因分析，详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课题组《促进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的思路 and 对策研究》（2008）。

^②三个后果中，第一个后果是直观的， $Y=C+I+CA=A+CA$ （Y为收入，C为消费，I为投资，CA为经常项目余额，A为内部吸收， $A=C+I$ ），净出口的增加，势必压缩内部吸收。第三个后果是第二个的自然结果。因此第二个结果是关键环节且相对费解一些。更为详尽的解释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课题组《促进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的思路 and 对策研究》（2008）。

是一个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压低消费率的重要变量。在我国，这种安排激励了工业的产能过剩，抑制了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的增长。

人们关于储蓄与消费的决策，实际上是在“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进行的跨期抉择。而经常账户盈余的实质，就是在出口“当前的储蓄”，盈余的扩大就是储蓄的提高。因此，维持低汇率，追求出口盈余的政策，就是抑制消费、鼓励储蓄的政策。也就是说，持续多年的把扩大出口当作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与我国多年来试图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由于我国是从加入 WTO 后才开始更全面地融入全球经济，对于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规律，以及相应地变得更为复杂的宏观变量间关系，经历了逐步了解到足够清晰的认识，并不断积累相关宏观管理经验的过程。宏观经济研究者也同样是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逐步加深对现实经济的理解和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结构性失衡采取的调控对策常常缺乏系统性，效果也就难以尽如人意。

二、供给格局

利用 1952 年以来的统计数据，参考现有相关文献，我们对我国历年资本存量进行估算，拟合出了我国的 CD 生产函数，并以此为基础考察我国经济增长的供给格局。

（一）资本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技术进步，第三是劳动增长

利用拟合出的 CD 生产函数，估算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TFP）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①。结果表明，1978 年—2012 年 GDP 年均增长 9.8%，其中，资本增加贡献 73%，平均每年拉动 GDP 增长 7.1 个百分点；劳动增加贡献 6%，平均每年拉动 GDP 增长 0.6 个百分点；技术进步贡献 21%，平均每年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

（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年均贡献最大的时期是 1990 年—1999 年

从上述三个周期看，前两个周期，即 1978 年—1999 年技术进步的贡献总体呈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 1978 年—1989 年的平均每年 2.0 个百分点增加到 1990 年—1999 年的 3.3 个百分点；第三个周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下降，2000 年—2012 年技术进步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 1.5 个百分点（见图 6）。

从年度间的变化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有明显的上行期和下行期，上行期分

^① 生产函数估计方程： $y=1.263+0.689k$ ，式中 y ， k 分别表示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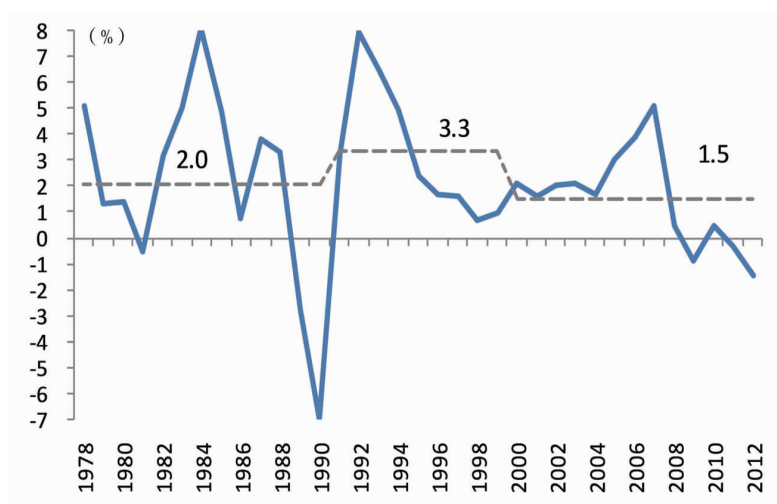


图6 1978年—2013年TFP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点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别是1981年—1984年、1990年—1992年和2004年—2007年，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年份分别是1984年、1992年和2007年，分别拉动经济增长8.08、7.96和5.11个百分点。在下行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连续为负的情况只出现在1989年—1990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三）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振荡上行，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下行趋势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呈震荡上升趋势，1981年—1989年、1990年—1999年、2000年—2012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分别是6.15、6.88和8.34个百分点（见图7）。与资本贡献的变动趋势不同，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呈下行趋势，不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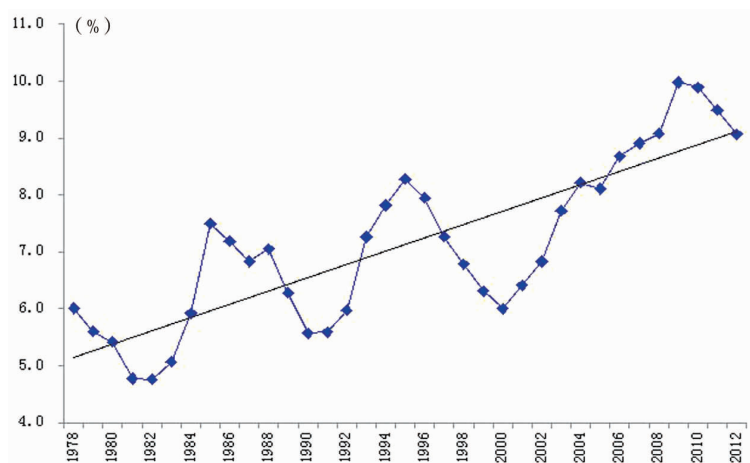


图7 1978年—2013年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点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如此，2000 年以来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前期进一步大幅下降。1981 年—1989 年、1990 年—1999 年、2000 年—2012 年劳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分别是 0.94%、0.83% 和 0.17%（见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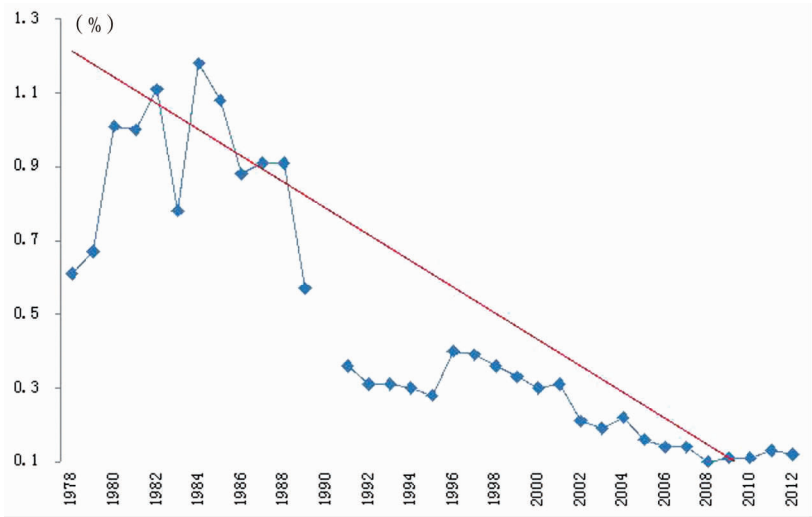


图 8 1978 年—2012 年劳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点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三、供求结合的政策着力点

（一）“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长格局

1. 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在经历了持续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我国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阶段。

首先，从经济高速增长理论看，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大要素——充沛的高质量人力资源、运行有效的市场机制和处于经济发展的早期（即技术发展差距带来很大的追赶空间），在我国正朝着中高速增长的方向变化。目前，我国上述三大要素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劳动年龄人口（15~59 岁）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重在 2011 年达到峰值，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分别较上年减少 1773 万、345 万和 371 万人；第二，我国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追赶空间相对于发展初期已经缩小（按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计算的 2014 年我国人均 GDP 达 7575 美元）；第三，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艰巨。

其次，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看，我国潜在增长率水平已从 10% 左右降至 8% 左右。以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三大事件为

线索，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分为六个阶段（见表 2）。其中，只有 1998 年—2001 年、2012 年—2014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 8% 左右，但它们所对应的物价形势很不相同。1998 年—2001 年，在经济增长率达到 8% 的同时，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2012 年—2014 年，经济增速在 8% 以下，对应的却是温和的通货膨胀。另外，在 2001 年之后，我国不仅走出了通货紧缩，而且实现了长达六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 11.2%。

表 2 1978 年—2014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及主要特征

时 期	GDP 年均增速 (%)	物价年均增速	
		CPI (%)	GDP 平减指数 (%)
1978 年—1991 年	9.3	6.1	5.3
1992 年—1997 年	10.4	7.2	10.9
1998 年—2001 年	8.0	-0.3	0.5
2002 年—2007 年	11.2	2.1	4.2
2008 年—2011 年	9.6	3.5	5.4
2012 年—2014 年	7.4	2.4	1.8
2012 年	7.7	2.6	2.4
2013 年	7.7	2.6	2.2
2014 年	7.4	2.0	0.8

资料来源：《2013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再次，从日本和韩国等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下移具有普遍性（见图 9）。日本在 1956 年—1973 年年均经济增速 9.2%，而 1975 年—1991 年经济年均增长 4.4%，两者相差 4.8 个百分点以上。韩国在 1971 年—1997 年经济年均增长 8.9%，1999 年—2008 年经济年均增长 5.7%，两者相差 3.2 个百分点。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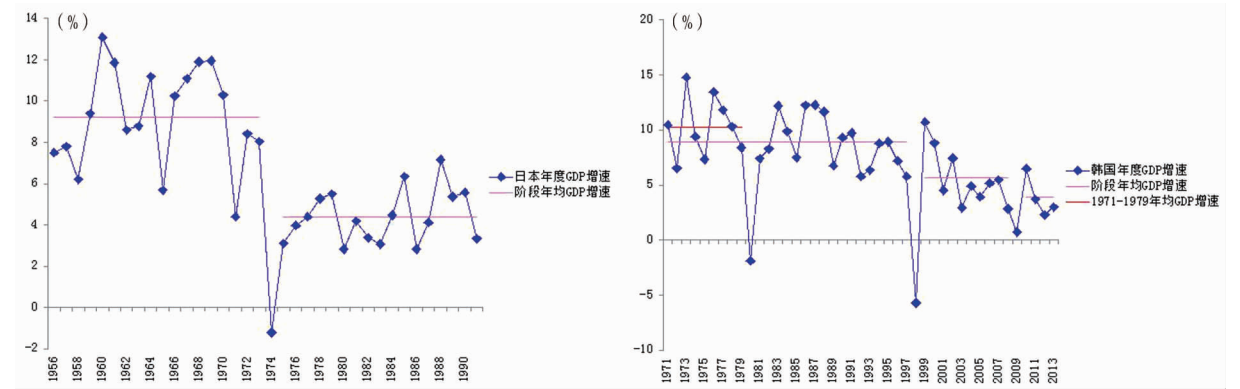


图 9 日本、韩国的经济增长历程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

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当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GDP 增速下降的幅度更大，比如日本。

2. 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投资增速

根据 CD 生产函数，2014 年—2020 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增速和技术进步两大因素。资本存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变动，而后者又决定于人口结构的变动。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劳动人口比重在 2011 年达到峰值，随后劳动人口比重开始下降，人口总抚养比开始上升，我国老龄化发展的速度要比所有的预测都要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拐点已经出现，今后一段时期高储蓄年龄人群比重将逐渐下降，负储蓄年龄群体将快速增加，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动将推动国民总储蓄率趋于下降，进而投资率亦将趋于下降。根据日本经验，我们估计 2020 年我国投资率将从 2012 年的 48% 下降到 40% 左右。

未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难判断，它主要取决于改革的进展和经济转型的情况。为此我们做出三种情景分析。一是高方案，2014 年—2020 年 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高，保持 2000 年—2012 年的平均水平，每年拉动经济增长 1.5 个百分点；二是中方案，2014 年—2020 年 TFP 每年拉动经济增长 1.0 个百分点；三是低方案，2014 年—2020 年 TFP 每年拉动经济增长 0.5 个百分点。根据 CD 生产函数，我们对这三种情景，分别测算了 2014 年—2020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见表 3）。

表 3 2014 年—2020 年经济增长情景分析

	TFP 贡献百分点数	2014 年—2020 年 GDP 年均增速
情景一	1.5	8.4%
情景二	1.0	7.7%
情景三	0.5	7.1%

根据中央提出的 2011 年—2020 年 GDP 翻一番的目标，可以推算出 2014 年—2020 年 GDP 年均增长 6.8% 即可达到目标。因此，三种情景皆可达到 GDP 翻一番的目标。但值得关注的是，2008 年以来 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低，甚至出现了贡献率为负的情况，表明经济效益下滑明显，经济增速在潜在水平以下。因此，2014 年—2020 年要实现 TFP 对经济增长贡献 0.5 个百分点以上，难度还是较大的。

3. 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内需增长

与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韩国和日本相比，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需求格局的突出特点是正的外部吸收率和更高的投资率。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现价外部吸收率为年均

0.6%，不变价外部吸收率为负（见图 10），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外部吸收率始终为负（见图 11）；日本投资率最高为 1970 年的 38.8%，韩国最高为 1996 年的 38.9%，我国最高投资率为 2012 年的 47.8%。正是由于上述差异，当日本和韩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时，外需占比上升，而我国目前正经历与之相反的变化。因此，我国“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内需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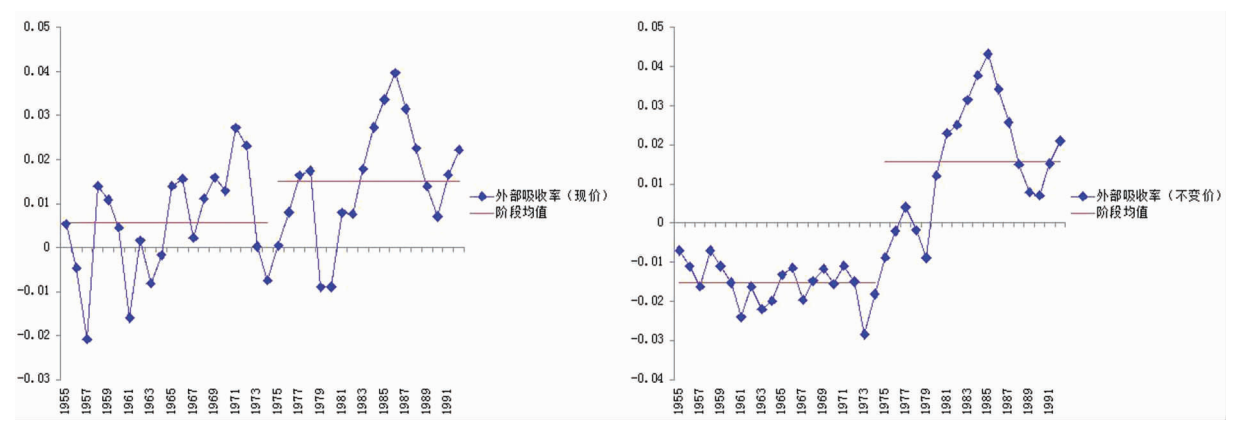


图 10 1955 年—1992 年日本外需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OECD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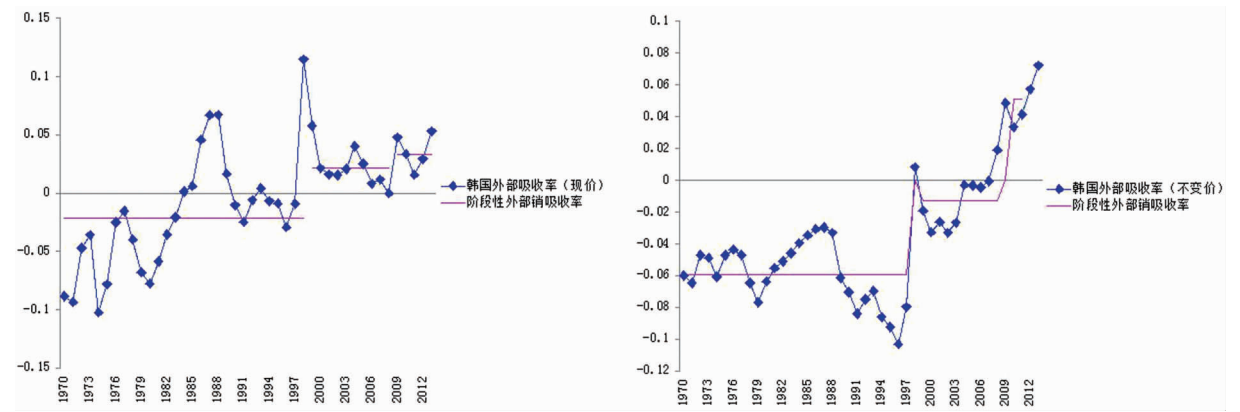


图 11 1970 年—2012 年韩国外需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OECD 数据库。

根据上述经济增长前景估计，并参考国际经验，我们对 2014 年—2020 年我国三大需求构成进行了估计。预计到 2020 年，我国投资率会由目前的 48% 左右降至 40% 左右，消费率由目前的 49% 左右上升至 60% 左右，外需占 GDP 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见表 4）。

表 4 2013 年—2020 年我国需求比率估计

年份	消费率 (%)	投资率 (%)	净出口率 (%)
2012	49.2	48.1	2.7
2013	51.2	47.0	1.8
2014	52.9	45.9	1.2
2015	54.4	44.9	0.8
2016	55.7	43.9	0.5
2017	56.8	42.9	0.3
2018	57.9	41.9	0.2
2019	58.9	40.9	0.1
2020	60.0	40.0	0.0

4. 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服务业的增长

我国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达到迄今为止的最大值，目前仍处于下降的过程中（见图 12）。尽管全球结构调整是造成我国工业产出比重向下调整的主要原因，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其中应包含了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来的结构调整要求（见图 13 和图 14、表 5）。因此，此轮调整结束后，“十三五”时期我国工业增加值比重将趋于稳定。由于制造业增速下降，服务业增速上升，“十三五”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服务业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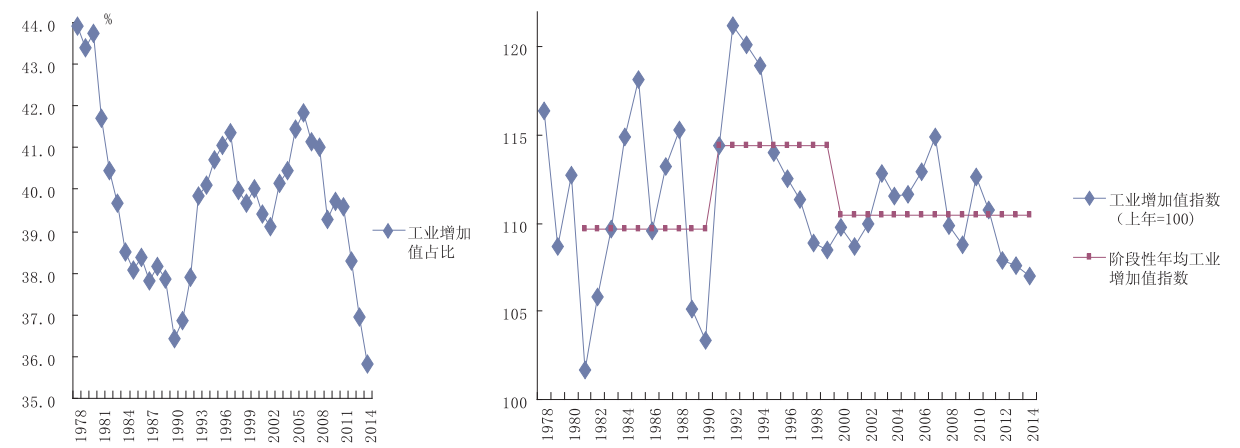


图 12 1978 年—2014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指数及其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3》、《2014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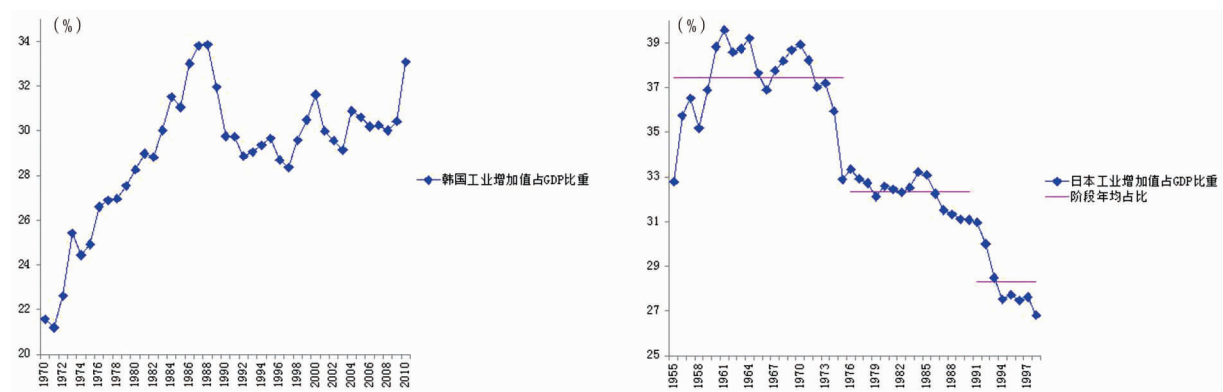


图 13 日本、韩国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情况

数据来源：OECD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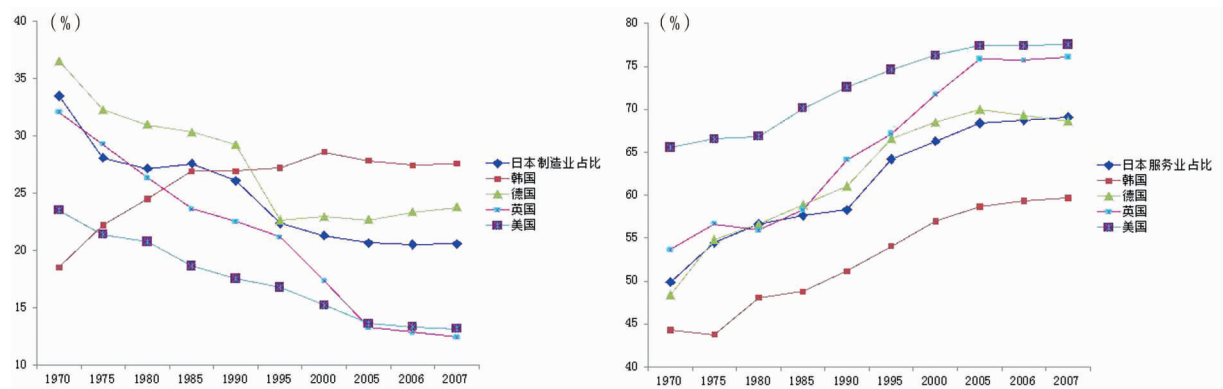


图 14 1970 年—2007 年发达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OECD 数据库。

表 5 1956 年—2008 年日本不同制造业部门实际增长速度的阶段性变化 (%)

	1956 年—1974 年	1975 年—1984 年	1985 年—1991 年	1992 年—2008 年
制造业	17.0	7.1	5.4	-1.7
轻工业（加工组装）	13.5	7.2	4.5	-1.9
食品饮料工业	10.4	10.4	2.6	-0.2
纺织业	12.2	1.1	-0.1	-7.5
其他	18.0	6.8	6.6	-2.8
轻工业（基础原料）	18.2	4.2	5.0	-1.9
纸浆、纸及纸制品业	18.0	3.9	5.7	-2.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8.5	4.5	4.5	-1.9
重工业（基础原料）	18.4	6.2	5.3	-1.3

续表 5

	1956 年—1974 年	1975 年—1984 年	1985 年—1991 年	1992 年—2008 年
化学工业	16.0	7.5	4.8	-2.4
石油和煤制品业	15.9	26.7	3.8	2.8
金属冶炼及压延业	21.8	4.7	3.7	-1.3
金属制品业	21.6	3.4	10.2	-3.2
重工业（加工组装）	21.7	8.5	6.3	-1.0
机械工业	22.6	8.8	8.0	-1.3
电器机械及设备制造业	23.1	11.6	6.6	-1.7
交通设备制造业	21.2	5.8	3.9	1.0
精密仪器制造业	18.5	6.3	5.8	-1.4

资料来源：Yashushi SUZUKI, Japan’s Financial Slump,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二）我国可以采用供需结合的政策着力点

1. 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按照十八大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要求，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包括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2. 深化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进程，将会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减少分散的“预防性储蓄”；社会保障资金的准时、足额给付，会促进当期居民消费。当前，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统一化进程，包括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及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提高居民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度、参与的积极性和强制性。

3. 调整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分配关系，为企业减负，为个人增收

坚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以效率为中心，在再分配领域强调公平为核心的原则，

调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的收入分配关系。在政府和企业收入分配关系方面，政府应大幅度降低企业税费，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宽松环境。在调整国家和个人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应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政策进行调整，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类扣除制度，降低中等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加快政府转型，加大政府在社保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降低个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的分担比例。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严格贯彻《物权法》，确保群众的财产权利和财富增值权不受侵犯；进一步完善财产性收入税收制度，减轻普通群众持有财产的税收负担；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积极探索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取得分红、收取租金收入等流转形式；制定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和私人住宅所有权抵押的办法。

4. 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消费增长

“十三五”期间，一是应通过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营造一个更加公开、公平、公正的投资市场环境，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从而通过财富的积累产生促进消费的“财富效应”；二是通过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包括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促进当期消费的增长。

5. 收缩国有资本经营领域，进一步发挥民营资本投资的作用

降低准入门槛，扩大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领域，积极营造公开透明的竞争环境，提升公共部门和受监管行业的效率及绩效管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适当收缩经营领域，为民营资本创造更大的运作空间，同时加大财政资金在生态恢复、环境保护、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以及促进区域均衡方面的投入力度。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大量“非正规部门”经济活动的情况下，适当放宽限制会使城市及非城市人口的就业状况获得很大改善。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2. 岳国强等：《我国储蓄投资失衡问题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2007年版。

责任编辑：李蕊

· 国际经济 ·

当前我国外贸形势分析及对策建议^{*}

王晓红

摘要：我国外贸增速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拐点时期，正确认识外贸形势的新变化，促进外贸稳定发展，对于实现“两个中高”、稳定就业都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外贸形势的主要特点，以及外贸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提出了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发挥海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带动作用、积极扩大进口及加快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等有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贸形势 进出口 对策建议

作者简介：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2015 年以来，受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尤其是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外贸呈现明显下滑态势，面临着严峻挑战。目前，我国外贸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新的拐点时期，正确认识我国外贸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促进外贸稳定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实现“两个中高”^①、稳定就业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应继续加快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积极拓展国际经贸合作市场空间，尤其要注重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重塑产业与贸易竞争新优势，推动产业链和价值链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

^{*}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课题《新形势下我国对外经贸合作前景及政策研究》阶段性成果。

^①“两个中高”即：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一、当前我国外贸形势的主要特点

（一）从总体上看，全国外贸增速下滑，出口增长微弱、进口降幅较大、贸易顺差急剧扩大

2015 年 1 月—4 月，我国实现进出口 12225.1 亿美元，同比下降 7.6%。其中，出口 690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进口 5323.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7.3%；贸易顺差 1578.1 亿美元，增长 337.4%。今年受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下降、部分重要产品进口数量减少的影响，一季度进口降幅创 2009 年以来同期新高。从表 1、图 1 可以看出，自 2012 年之后，我国外贸进出口开始告别两位数的高增长，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反映出未来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于内需市场。

表 1 2006 年—2015 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		出 口		进 口		差额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2006	17604.39	23.8	9689.78	27.2	7914.61	19.9	1775.08
2007	21765.72	23.6	12204.56	26.0	9561.16	20.8	2643.40
2008	25632.60	17.8	14306.93	17.3	11325.67	18.5	2981.26
2009	22075.35	-13.9	12016.12	-16.0	10059.23	-11.2	1956.89
2010	29740.01	34.7	15777.54	31.3	13962.47	38.8	1815.07
2011	36418.64	22.5	18983.81	20.3	17434.84	24.9	1548.97
2012	38671.19	6.2	20487.14	7.9	18184.05	4.3	2303.09
2013	41603.08	7.6	22100.19	7.9	19502.89	7.3	2597.30
2014	43030.37	3.4	23427.47	6.1	19602.90	0.4	3824.56
2015Q1	9041.66	-6.3	5139.33	4.7	3902.33	-17.6	1236.99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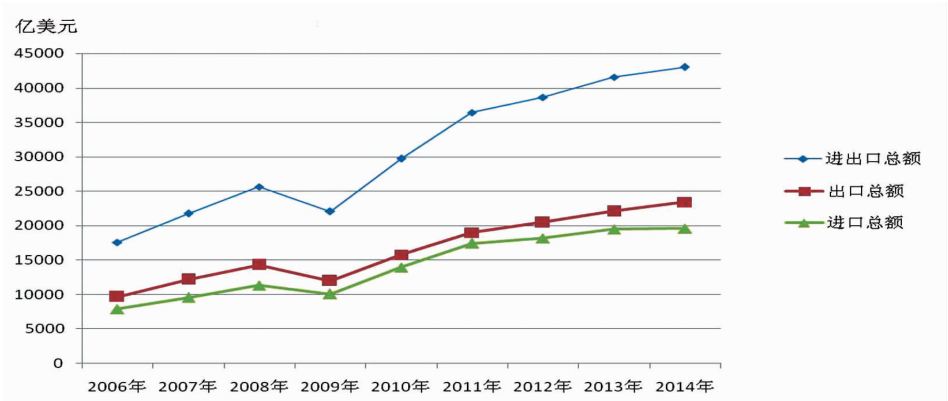


图 1 2006 年—2014 年我国进出口增长

（二）从贸易商品结构上看，机电产品出口好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大宗商品进口价格持续下跌

2015 年 1 月—4 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3997.2 亿美元，占出口总额 57.9%，同比增长 3.6%。其中，船舶、金属加工机床等装备制造产品出口增长 26.1%，说明我国机械装备制造出口竞争力显著增强；纺织服装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1365.5 亿美元，占出口总额 19.8%，同比增长 0.7%。大宗商品进口价格全面下跌。2015 年 1 月—4 月，原油、铁矿砂、成品油、液化石油气、大豆、铜矿砂和铜材进口价格分别下跌 47.7%、45.4%、38.4%、23.5%、21.0%、15.9%和 13.1%；高新技术产品进口 1646.6 亿美元，同比下降 0.9%。

从表 2、图 2、图 3 可以看出，在 2010 年—2014 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出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5.2%、5.3%、4.9%、4.9%、4.8%，有所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量比重一直稳定在 95%左右。在工业制成品中，机械及运输设备在出口总量中占比分别为 49%、48%、47%、47%、46%，有所下降；杂项制品占比分别为 24%、24%、26%、26%、27%，有所增长；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占比分别为 16%、17%、16%、16%、17%，化学品及有关产品占比分别为 6%、6%、5.5%、5.4%、5.7%，两项基本比较稳定。

表 2 2010 年—2015 年一季度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Q1
初级产品	817.17	1005.52	1005.81	1072.83	1127.05	236.48
食品及活动物	411.53	504.97	520.80	557.29	589.18	129.10
饮料及烟类	19.06	22.76	25.90	26.08	28.83	5.49
非食用原料	116.02	149.78	143.41	145.7	158.28	35.55
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267.00	322.76	310.26	337.92	344.53	64.83
动、植物油脂及蜡	3.56	5.26	5.45	5.84	6.23	1.50
工业制成品	14962.16	17980.48	19483.54	21027.36	22300.41	4902.85
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875.87	1147.87	1136.29	1196.59	1345.93	318.08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2491.51	3196.00	3331.68	3606.53	4003.75	923.27
机械及运输设备	7803.30	9019.12	9644.22	10392.46	10706.32	2405.98
杂项制品	3776.80	4594.10	5357.18	5814.48	6221.74	1249.74
未分类的其他商品	14.68	23.39	14.17	17.29	22.67	5.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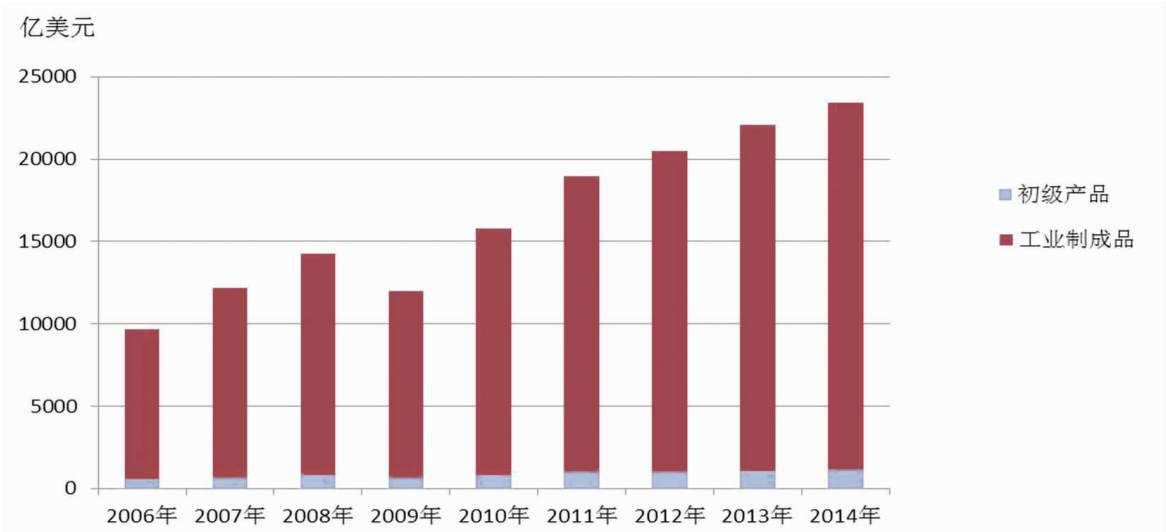


图2 2006年—2014年我国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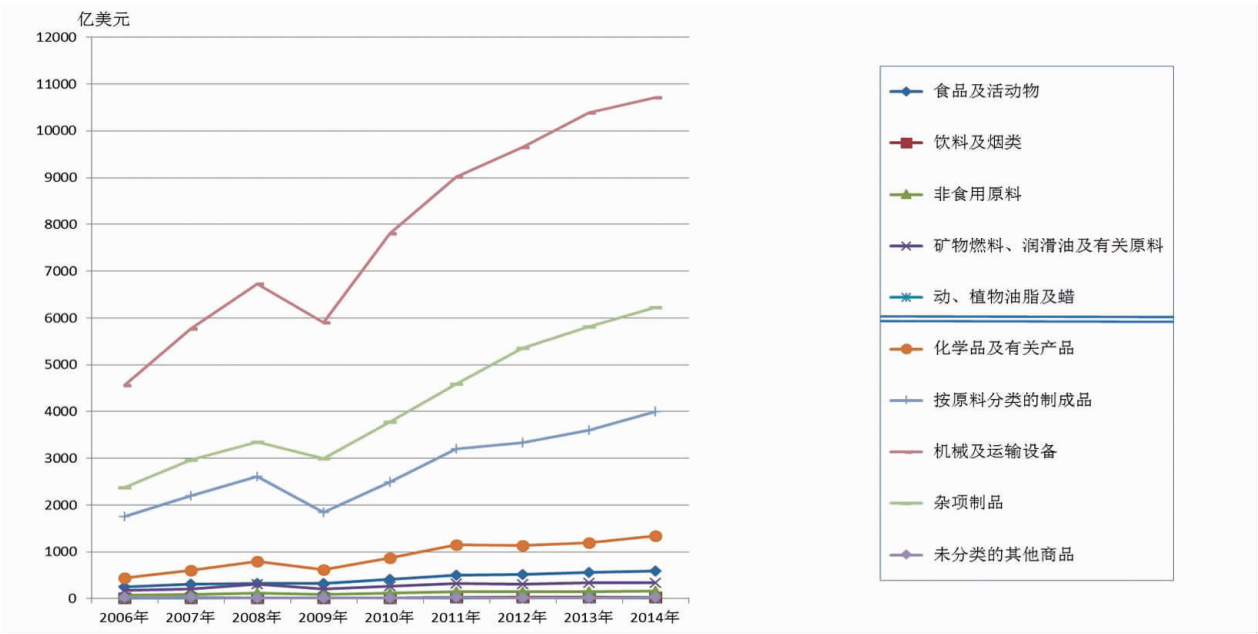


图3 2006年—2014年我国主要商品出口增长

目前，我国进口产品仍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初级产品比重较低。从表3、图4、图5可以看出，在2010年—2014年我国进口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进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31%、35%、35%、34%、33%；工业制成品进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69%、65%、65%、66%、67%，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39%、36%、36%、36%、37%。

表 3 2010 年—2015 年一季度我国进口商品结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Q1
初级产品	4325.56	6043.76	6346.05	6576.01	6474.40	1162.89
食品及活动物	215.66	287.65	352.62	416.99	468.23	116.45
饮料及烟类	24.29	36.85	44.03	45.10	52.18	11.34
非食用原料	2111.18	2852.55	2696.15	2861.43	2701.11	519.22
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1887.04	2755.60	3127.97	3149.06	3167.95	501.18
动、植物油脂及蜡	87.40	111.11	125.27	103.42	84.93	14.70
工业制成品	9622.72	11390.82	11832.21	12926.87	13128.50	2739.44
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1496.36	1811.44	1792.69	1902.98	1933.74	408.23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1311.13	1503.28	1459.00	1482.92	1724.18	309.49
机械及运输设备	5495.61	6303.88	6527.50	7103.50	7244.51	1540.66
杂项制品	1135.26	1277.09	1365.29	1390.11	1398.43	307.41
未分类的其他商品	184.37	495.13	687.74	1047.36	827.64	173.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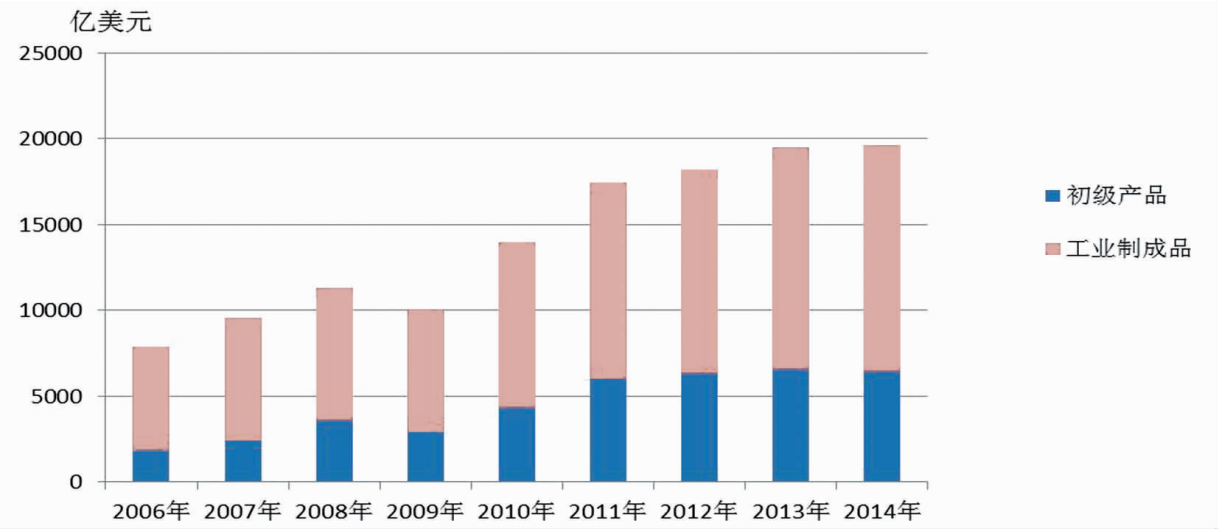


图 4 2006 年—2014 年我国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进口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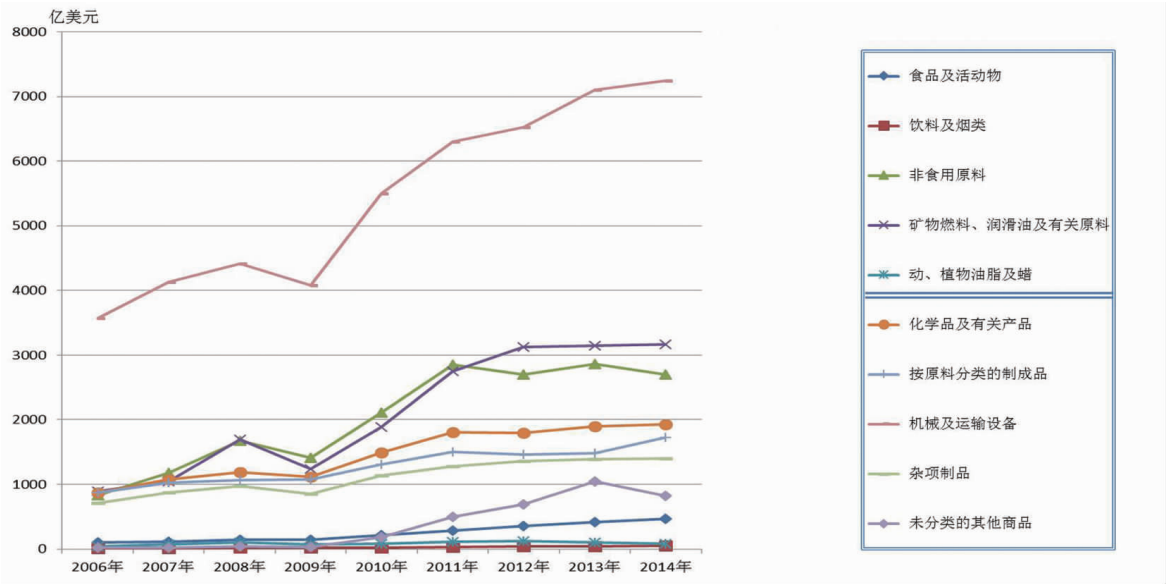


图 5 2006 年—2014 年我国主要商品进口增长

（三）从贸易国别结构上看，亚洲地区和新兴市场出口增长好于美欧日传统市场，主要资源国家进口呈现下降态势

2015 年 1 月—4 月，我国对韩国、东盟、印度、中国台湾、南非、澳大利亚出口额分别为 323 亿美元、887.6 亿美元、177.8 亿美元、133.4 亿美元、52 亿美元、120.2 亿美元，分别增长 0.8%、12.9%、15.4%、5.6%、18.4%和 5.9%；对美国、欧盟出口额分别为 1221.9 亿美元、1091.5 亿美元，分别增长 9%、-1%；对日本、中国香港、俄罗斯出口额分别为 440.1 亿美元、896.9 亿美元、93.7 亿美元，分别下降 12.2%、10%和 35.6%。2015 年 1 月—4 月，自南非、巴西、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进口分别下降 46%、33.5%、30.1%和 28.4%。

目前，我国出口市场以亚洲地区为主，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美欧日三大传统市场的地位逐步下降。2010 年—2014 年，我国对亚洲地区出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46%、47%、49%、51%、51%，其中，对东盟出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8.8%、9%、10%、11%、11.6%，对日本出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7.7%、7.8%、7.4%、6.8%、6.4%，对韩国出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4.3%、4.4%、4.3%、4.1%、4.3%；对欧盟出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19.7%、18.7%、16.3%、15.3%、15.8%；对北美地区出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19%、18%、19%、18%、18%，其中对美国出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18%、17%、17%、17%、17%；对拉美地区出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5.8%、6.4%、6.6%、6%、5.8%；对非洲地区出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3.8%、3.9%、4.2%、4.2%、4.5%（表 4、图 6、图 7）。

表 4 2010 年—2015 年一季度我国出口国别（地区）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Q1
亚洲	7320.66	8991.42	10069.63	11347.06	11886.36	2566.13
日本	1210.61	1482.98	1516.43	1502.75	1494.42	328.55
韩国	687.71	829.24	876.81	911.76	1003.40	238.42
中国香港	2183.17	2680.25	3235.27	3847.92	3631.91	650.39
中国台湾	296.77	351.12	367.79	406.44	462.85	95.01
东盟	1382.07	1700.83	2042.72	2440.70	2720.71	677.89
新加坡	323.48	355.70	407.52	458.64	489.15	130.60
非洲	599.58	730.99	853.20	928.09	1061.47	252.41
欧洲	3552.04	4136.16	3964.24	4057.75	4388.69	925.88
欧盟	3112.35	3560.20	3339.89	3389.85	3708.84	824.76
英国	387.71	441.25	462.99	509.49	571.43	130.45
德国	680.47	764.35	692.18	673.48	727.12	163.85
法国	276.54	299.97	269.00	267.19	287.08	63.71
意大利	311.41	336.98	256.57	257.56	287.58	64.60
荷兰	497.06	595.00	589.04	603.17	649.31	138.83
俄罗斯	296.13	389.04	440.58	495.95	536.78	70.62
拉丁美洲	918.21	1217.31	1352.17	1342.71	1362.35	312.37
北美洲	3058.61	3501.17	3801.30	3978.38	4262.78	968.42
加拿大	222.17	252.68	281.26	292.19	300.06	70.35
美国	2833.04	3244.93	3517.96	3684.27	3960.82	897.17
大洋洲	330.23	408.95	448.80	446.20	465.82	114.11
澳大利亚	272.26	339.10	377.40	375.60	391.54	88.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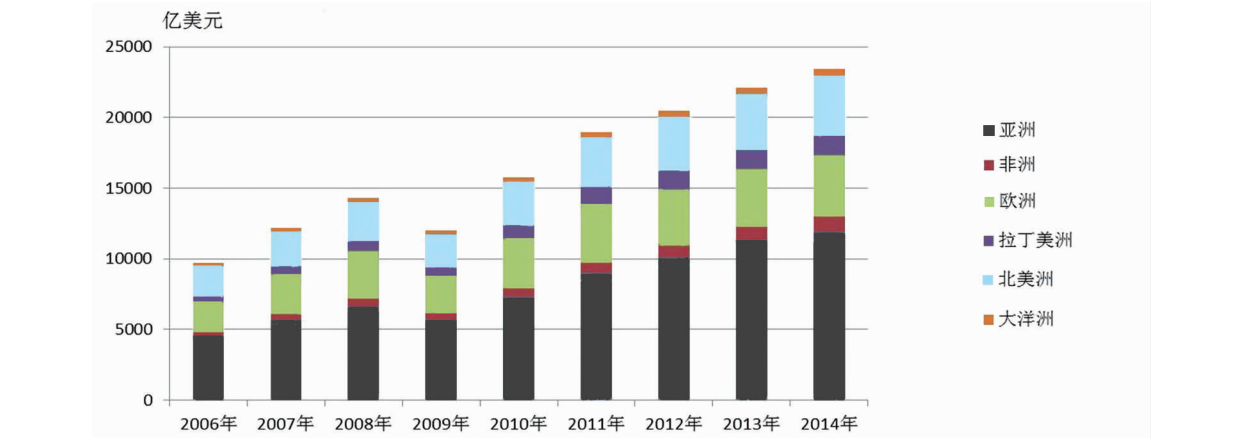


图 6 2006 年—2014 年我国出口市场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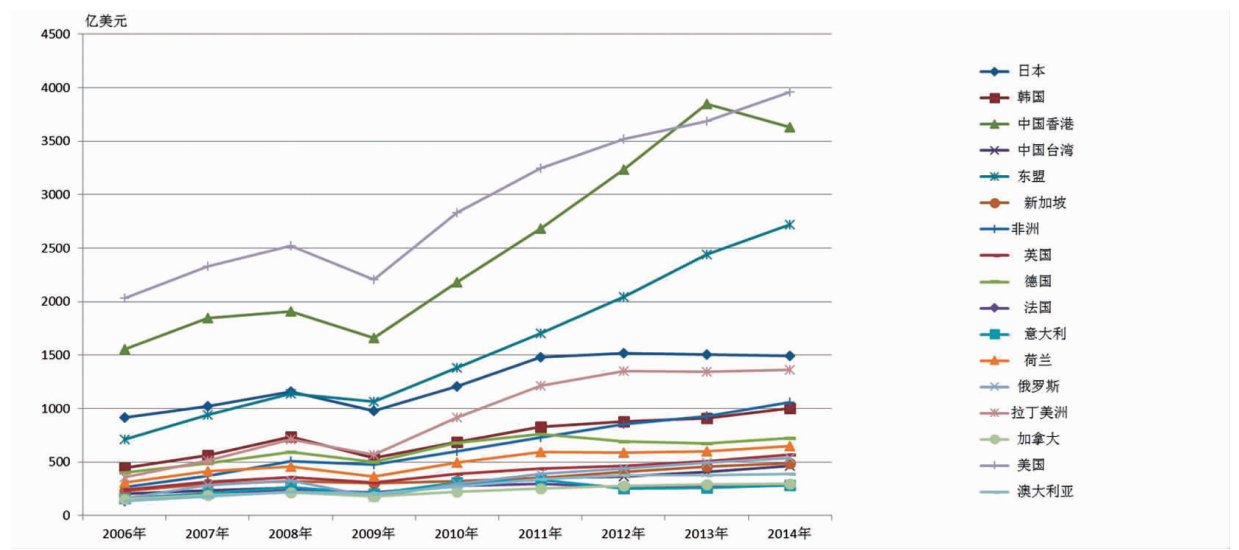


图 7 2006 年—2014 年我国出口主要国家和地区增长

目前，亚洲作为我国的主要进口市场总体呈现下滑趋势，其中日本下滑明显，东盟和韩国市场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欧盟和美国作为主要经济体仍具增长空间；非洲和拉美等新兴市场都具有增长潜力。2010 年—2014 年，我国从亚洲地区进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60%、58%、57%、56%、55%，其中，从日本进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13%、11%、9.8%、8.3%、8.3%，从韩国进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10%、9.3%、9.3%、9.4%、9.7%，从东盟进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11%、11%、10.7%、10%、10.6%；从欧盟进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12%、12%、11.6%、11%、12.5%；从北美地区进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8.4%、8.3%、8.6%、9.1%、9.4%，其中从美国进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7.3%、7%、7.3%、7.8%、8.1%；从拉美地区进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6.5%、6.9%、7%、6.5%、6.5%；从非洲地区进口占总量比重分别为 4.8%、5.3%、6.2%、6%、6%（表 5、图 8、图 9）。

表 5 2006 年—2015 年一季度我国进口国别（地区）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Q1
亚洲	8346.10	10038.87	10379.67	10901.70	10855.75	2179.53
日本	1767.07	1945.91	1778.09	1622.78	1629.97	332.39
韩国	1384.00	1627.09	1686.48	1830.73	1901.52	407.31
中国香港	122.58	154.99	179.60	162.15	129.03	19.92
中国台湾	1156.94	1249.20	1321.84	1566.37	1520.30	324.93
东盟	1545.69	1927.71	1958.21	1995.40	2083.22	417.98

续表 5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Q1
新加坡	247.10	279.12	285.24	300.50	308.26	68.43
非洲	669.52	932.21	1131.71	1174.29	1157.37	165.08
欧洲	2178.94	2871.93	2866.36	3241.91	3362.91	707.12
欧盟	1684.77	2111.93	2120.55	2200.55	2442.55	505.01
英国	113.04	145.60	168.07	190.91	237.29	44.68
德国	743.41	927.16	919.12	942.04	1050.40	214.98
法国	171.44	220.80	241.22	231.13	270.89	55.02
意大利	140.11	175.86	160.68	175.78	192.86	40.15
荷兰	64.77	86.53	87.05	98.31	93.51	21.06
俄罗斯	258.36	403.46	441.01	396.18	416.07	73.50
拉丁美洲	912.47	1197.54	1260.26	1273.00	1272.27	205.30
北美洲	1169.79	1443.83	1561.90	1778.66	1843.14	420.53
加拿大	148.87	221.81	232.46	252.19	252.14	55.27
美国	1020.38	1221.54	1328.86	1525.75	1590.36	365.09
大洋洲	657.59	889.79	916.07	1085.61	1096.00	219.86
澳大利亚	608.66	827.23	845.61	988.18	977.51	19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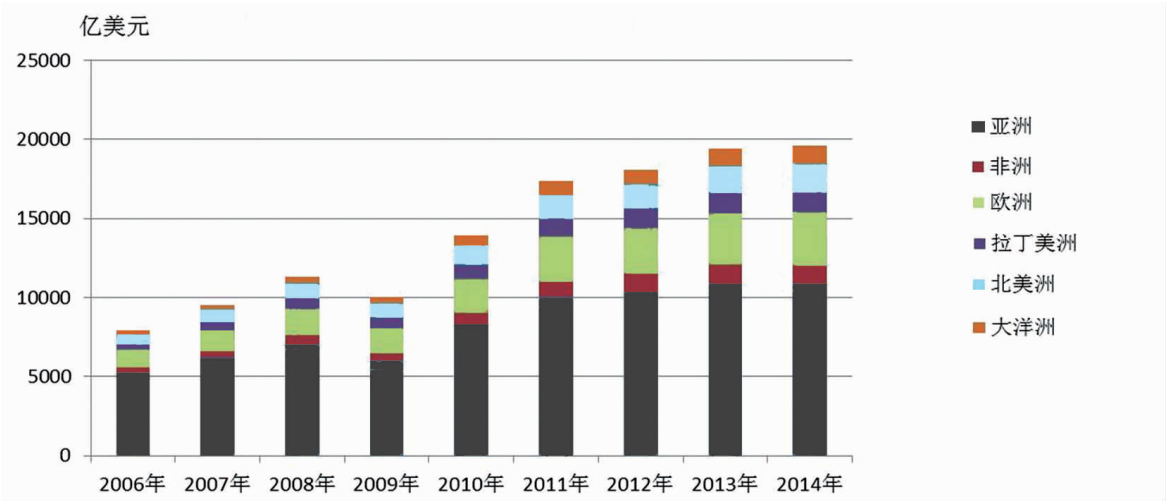


图 8 2006 年—2014 年我国进口市场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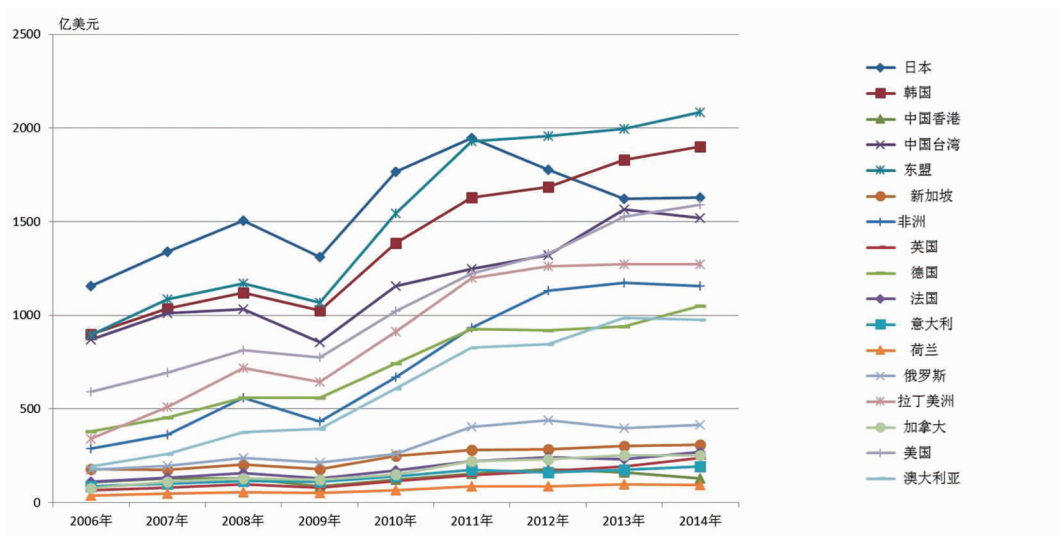


图 9 2006 年—2014 年我国进口主要国家和地区增长

（四）从贸易方式上看，一般贸易出口增长好于加工贸易

2015 年 1 月—4 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6751.2 亿美元，出口和进口分别占 53.9% 和 56.9%，其中出口增长 7.3%，进口下降 20.7%；加工贸易进出口 3848.9 亿美元，出口和进口分别占 35.5% 和 26.2%，分别下降 6.9% 和 8.9%；其他贸易进出口 1625 亿美元，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 5.5% 和 -17.2%。近年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成效，一般贸易比重逐年上升，贸易方式明显优化。2010 年—2014 年，我国一般贸易占出口总量比重分别为 46%、48%、48%、49%、51%，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量比重分别为 47%、44%、42%、39%、38%（表 6、图 10）。

表 6 2010 年—2015 年一季度我国不同贸易方式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Q1
一般贸易	7207.33	9171.24	9880.07	10875.31	12036.8	2776.4
加工贸易	7403.34	8354.16	8627.79	8608.16	8843.6	1820.1
其他	1168.65	1460.60	1979.96	2616.72	2547.1	542.9

（五）从贸易企业结构上看，民营企业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主力

2015 年 1 月—4 月，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4259.2 亿美元，出口和进口分别占比 43% 和 24.2%，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30.3%，出口贡献率为 177%；外资企业进出口 5838.9 亿美元，分别占出口和进口的 45.9% 和 50.2%，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 2.3% 和 6.2%；国有企业进出口 2126.7 亿美元，分别占出口和进口的 11.1% 和 25.6%，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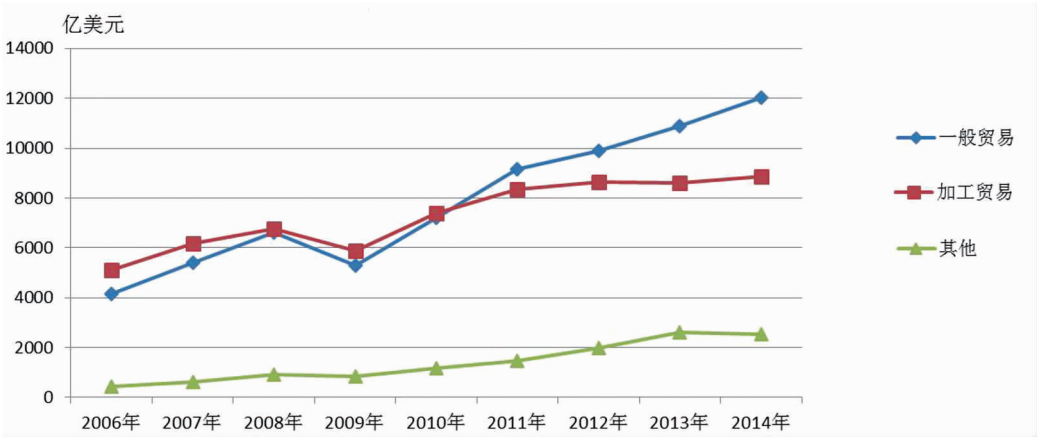


图 10 2006 年—2014 年我国不同贸易方式出口增长

1.2%和 21.6%。

从表 7、图 11 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企业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2010 年—2014 年，国有企业占出口总量比重分别为 15%、14%、13%、11%、11%，外资企业占出口总量比重分别为 55%、52%、50%、47%、46%；民营企业出口快速增长，2013 年和 2014 年占出口总量比重分别为 39%和 41%。

表 7 2010 年—2015 年一季度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Q1
国有企业	2343.60	2672.22	2562.83	2489.86	2564.94	571.40
外商投资企业	8623.06	9953.30	10227.49	10442.62	10747.34	2347.61
私营企业	—	—	—	8633.37	9546.71	2096.89
其他	—	—	—	534.35	568.47	12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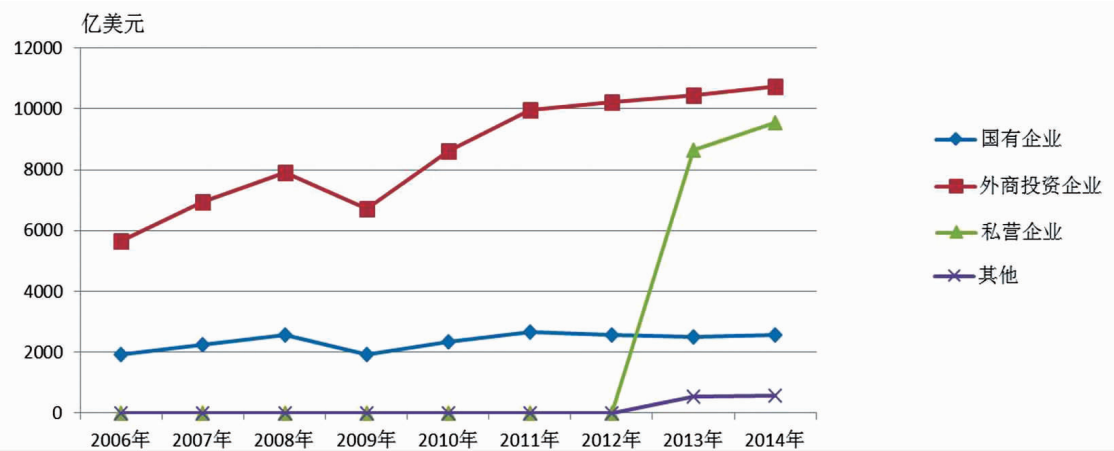


图 11 2006 年—2014 年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增长

(六) 从国内区域结构上看，中西部地区出口贡献度明显提高

我国中西部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外贸潜力不断释放。2015 年 1 月—4 月，中西部地区进出口 1866.4 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15.3%，出口增长 4.3%，对全国出口增量贡献达 45%；东部地区进出口 10358.7 亿美元，下降 8.6%。其中，2015 年一季度，青海出口增长 2.3 倍，湖南出口增长 82.8%，山西、河南、湖北、广西、重庆、云南、陕西等地区出口增长也超过 20%。

表 8 2008 年—2015 年一季度我国出口分省（区、市） 单位：万美元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Q1
全国	142854571	120166392	157793225	189859984	204893476	221001909	234274655	51393258
北京	5745424	4838402	5545661	5902502	5965035	6324622	6234791	1285548
天津	4204293	2989327	3751728	4449792	4831432	4902478	5259657	1309825
河北	2402913	1569173	2257003	2858157	2960384	3096268	3571342	805267
山西	924474	283836	470930	542823	701620	799650	894222	221557
内蒙古	357953	231552	333485	468723	397070	409475	639419	117122
辽宁	4205456	3344148	4311978	5104050	5795032	6454057	5875924	1217914
吉林	477159	313155	447640	499848	598270	675701	577772	118375
黑龙江	1657359	1007614	1628176	1767264	1443614	1623159	1734041	228186
上海	16920838	14187770	18072413	20969033	20674437	20419686	21016331	4668405
江苏	23803625	19924278	27054996	31262305	32853789	32885683	34186844	7524884
浙江	15429443	13301538	18047980	21636041	22456888	24879195	27335364	6107974
安徽	1135271	888732	1241597	1708390	2675228	2825638	3149309	622600
福建	5698588	5332901	7149662	9284251	9783591	10650364	11345747	2552271
江西	768567	736354	1341603	2188121	2511054	2816971	3203807	911567
山东	9307672	7950234	10424695	12578809	12873174	13449911	14474545	3078601
河南	1071386	734648	1053447	1924040	2967788	3599206	3938370	1014817
湖北	1159209	997840	1444158	1953477	1940060	2283768	2664580	536566
湖南	840950	549192	795630	989747	1259965	1482083	2002348	526574
广东	40409677	35895607	45319865	53194187	57413613	63640373	64622226	13299243
广西	734832	837590	960283	1245805	1546841	1869499	2433004	678216
海南	158691	130865	232033	254154	314314	370635	441674	88180
重庆	572182	428008	748875	1983813	3857043	4679749	6340918	1824032

续表 8

年份\省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Q1
四川	1310796	1415167	1884504	2904596	3846351	4195160	4485006	1165339
贵州	190101	135656	191965	298531	495227	688583	939739	87526
云南	498590	451404	760568	947277	1001785	1595851	1880161	458000
西藏	70720	37541	77103	118285	335502	326905	210086	31206
陕西	540689	398536	620740	701085	865208	1022408	1392926	351141
甘肃	160122	73547	163863	215866	357378	467877	533135	214089
青海	41875	25099	46630	66183	72984	84726	112833	28754
宁夏	125791	74294	117034	159945	164116	255246	430281	66292
新疆	1929925	1082325	1296981	1682886	1934687	2226980	2348255	253190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10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6 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2 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3 个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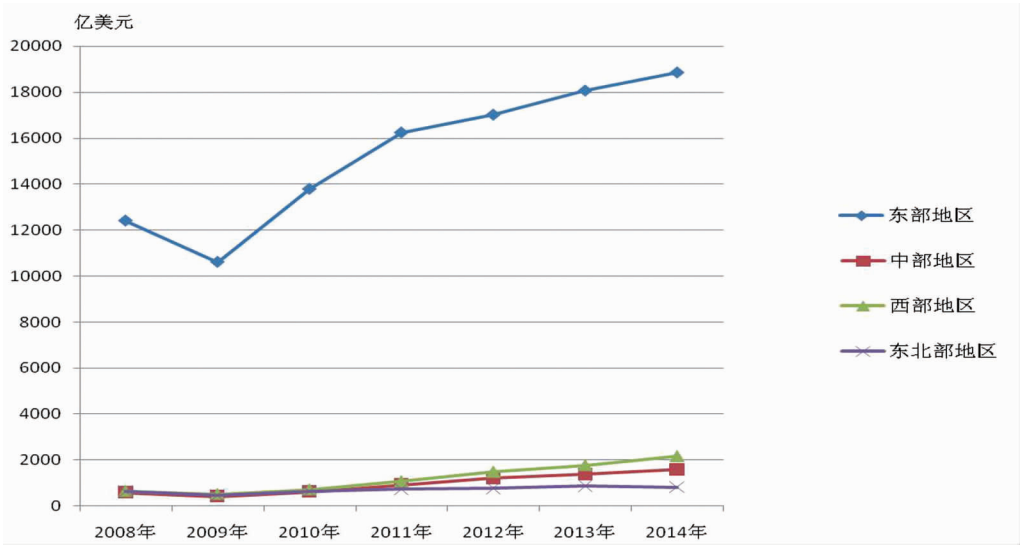


图 12 2008 年—2014 年我国东、中、西及东北部出口增长

（七）服务贸易保持快速增长，尤其是高端服务贸易、服务外包规模持续扩大，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扩大

2014 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6043.4 亿美元，比 2013 年增长 12.6%，高于全球 4.7% 的平均水平；其中，服务出口额和进口额全球占比分别为 4.6% 和 8.1%，位居第五位和第二位，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至 1599.3 亿美元。2015 年一季度，服务进出口总额 1495.4 亿

美元，增长 10.6%，其中服务出口 549.4 亿美元，增长 10.5%，进口 946 亿美元，增长 10.6%；旅游服务进出口总额为 657.4 亿美元，占总量比重 44%，居首位；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实现 1.5 倍的高增长，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幅达 89.5%，保险和养老金服务、计算机服务出口增幅分别为 25%和 17.4%；服务贸易逆差 396.6 亿美元，其中旅游和运输服务为逆差主要来源，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均实现顺差。2015 年一季度“长江经济带”地区服务进出口总额 614 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 41.1%。2015 年 1 月—4 月，我国服务外包完成执行金额 246 亿美元，增长 12%；其中，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 163.5 亿美元，增长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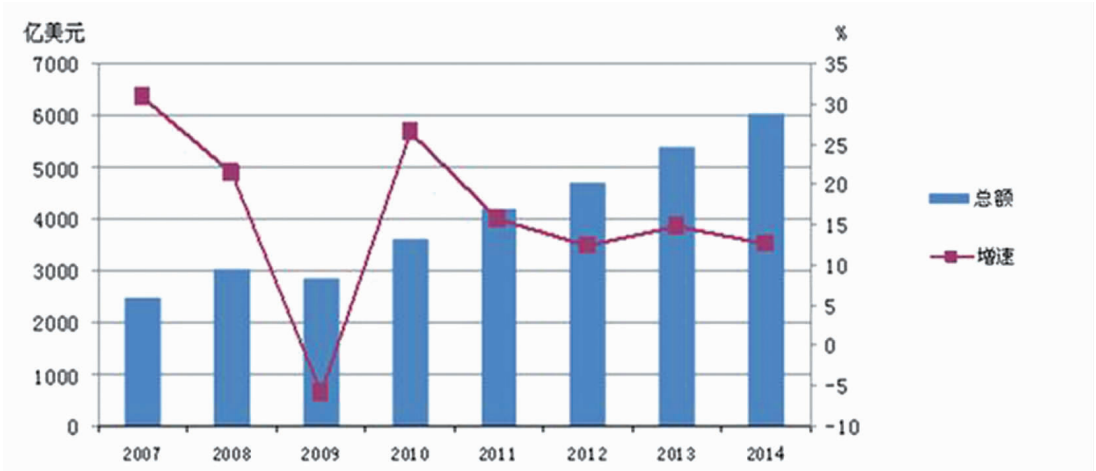


图 13 2007 年—2014 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及增速

数据来源：商务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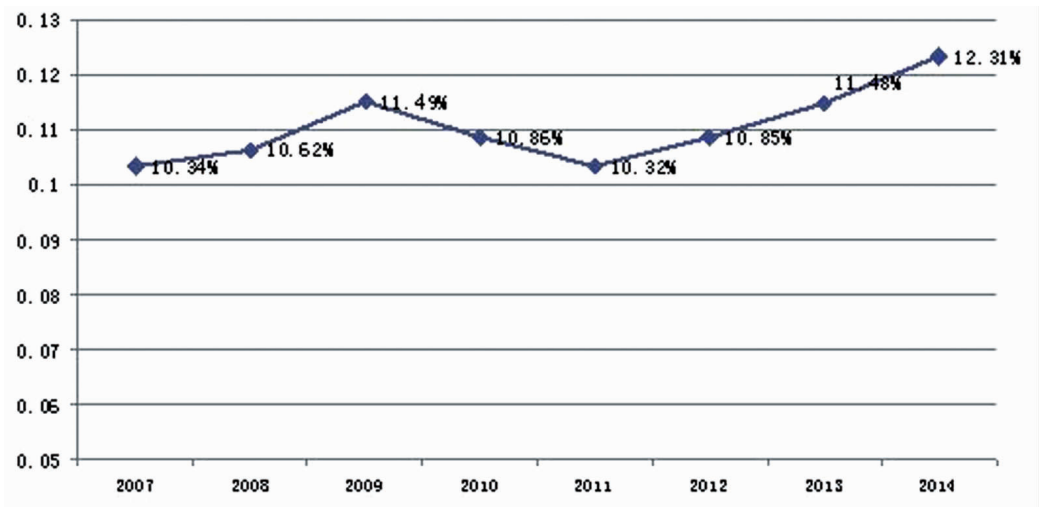


图 14 2007 年—2014 年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易总额比重

数据来源：商务部。

二、当前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

2015 年我国外贸发展仍将面临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从总体趋势上看,世界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阶段,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仍将持续,市场需求不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将继续下跌,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依然强烈,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外部风险有可能增多。

一是外需市场仍然不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5 年世界经济增长 3.5%,增速比 2014 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欧元区、日本将分别增长 3.1%、1.5%、1.0%;主要新兴经济体印度、俄罗斯、巴西将分别增长 7.5%、-3.8%、-1.0%。各国消费、投资需求普遍不振,导致国际贸易增长仍然乏力。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2015 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 3.3%;其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长分别为 3.2%和 3.6%,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进口增长分别为 3.2%和 3.7%。

二是高端产业出口面临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随着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蓬勃发展,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品和服务领域快速发展,继续推动高技术产品和服务出口。过去五年间,美国和欧盟出口额年均增长分别为 9%和 8.2%。特别是智能制造装备将成为未来高端制造的国际竞争焦点,德国确立了“工业 4.0 战略”、日本政府通过了“机器人新战略”、美国发布了“实现 21 世纪智能制造”都说明了这一点,各国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都将带来智能制造装备的大量市场需求。其次,电子信息产业升级也为发达国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传统消费电子产品正在向网络智能化发展,设备与服务相互交融,“互联网+”概念产品,包括支持物联网的硬件设备、家居数字化和智能化设备、可穿戴设备、3D 设备、交互和超高清电子产品等市场前景广阔。国际数据公司(IDC)预计,2015 年全球 PC 出货量将下滑 4.9%,智能手机及其他移动设备成为下一代计算平台;在大数据、机器人、智能汽车、新一代智能家电推动下,超级计算、大型存储、传感器等将是新的增长点。高纳德公司(Gartner)预计,2015 年全球半导体营销收入将达 3580 亿美元,与物联网有关的处理、传感及通信半导体市场增长 36.2%。

三是中低端产业面临周边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压力。由于我国生产要素成本全面上升,周边国家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比我国低廉,引资政策优惠,承接加工制造业转移速度加快,促进了出口快速增长。过去五年间,印度和东盟出口额年均增长分别为 14.2%和 9.8%,一些在华跨国公司逐步向周边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转移。

四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将继续影响进出口。2015 年全球石油市场供应过剩压力难以缓解。截至 2015 年 3 月末，纽约、伦敦两地油价比 2014 年高点已下跌一半以上。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世界石油库存将在 2015 年中期达到峰值，下半年有望企稳并于 2016 年小幅回升。英国商品研究局（CRU）编制的钢材价格指数显示，到 2015 年 4 月初，全球钢价指数同比跌幅扩大至 16.8%，其中北美、欧洲、亚洲比上年同期分别下跌 22.4%、6.7%和 20.5%。铁矿石市场 2014 年价格跌幅高达 47%，2015 年以来价格继续下跌。

五是贸易保护主义依然严重。一些区域自贸协定形成规则壁垒，对协定外的国家形成产品和服务出口歧视。据 WTO 统计，截至 2014 年 10 月，二十国集团（G20）实施贸易限制措施 962 件，比一年前增长 12.4%。据英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监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超过 1/4 对中国出口产生影响。由美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核心是制定新规则，涵盖了货物贸易、农业、纺织品与服装、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电信、投资、国有企业、劳工、环境、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电子商务、跨领域事项、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救济措施、能力建设、法律事项等内容。该战略通过创建“内部市场”达到“去中国化”目的。TPP 内部市场和供应链规模达到 27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近四成，占世界贸易总量近 1/3。

六是人民币升值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2014 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 6.4%，2015 年一季度又升值 4.2%。

但是，世界经贸仍具增长潜力，对我国也将产生有利影响。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印度等周边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外资；同时，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开始有向好的表现，对扩大我国外贸出口具有积极作用。二是机电产品出口市场将呈扩大趋势。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扩大工程机械、交通运输设备、通讯设备、电力设备、农业机械等市场需求，推动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三是全球贸易投资正在向新兴产业领域转移。2015 年一季度国际并购交易活跃，交易总额同比上升 21%，其中以医药、能源、科技、媒体、通信等新兴领域表现突出，有利于我国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贸易。

三、对策建议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外贸增速明显下降，但结构在不断优化，说明近年来我国外贸战略和政策调整已见成效，外贸的基本面仍然是向好的。从国际方面看，随着美欧

经济继续复苏，新兴经济体加快发展，有利因素仍然存在。随着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增强，服务业持续发展，海外直接投资进入加速期，都将为外贸出口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尤其是自贸区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为外贸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空间。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和看待当前外贸增速变化。一方面国际经济大环境短期内难以改变；另一方面我国贸易规模已列世界第一，过去的高增长难以重现，中低速增长将成为新常态。应坚持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与产业创新发展相结合、扩大外需与扩大内需相结合、长期战略与短期战略相结合的原则，推动我国外贸从规模速度增长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第一，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构建全球自贸区网络、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等拓展国际经贸合作空间。一要稳固美国、欧盟市场。一方面要通过加快商谈中美自贸区、中美双边投资贸易协定（BITT），重点消除高技术产品和服务壁垒，扩大双边进出口；另一方面应充分挖掘欧盟市场潜力，重点扩大高端装备、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二要利用“一带一路”“孟中印缅”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等战略，大力开拓东盟、韩国、印度等亚洲市场，积极拓展东欧市场。亚洲是我国贸易的主要市场，今年一季度亚洲地区占我国出口和进口总量的 50%和 56%。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我国对沿线国家贸易量快速增长。2014 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 1.12 万亿美元，占比 26%；预计未来十年将突破 2.5 万亿美元。2014 年我国承接沿线国家服务外包执行金额 98.4 亿美元，增长 36.3%，其中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执行金额 53.8 亿美元，增长 58.3%；2015 年一季度承接沿线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 33.3 亿美元和 20.1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30%和 8.1%。我国企业已经对沿线 47 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应加快拓展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空间，尽快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贸区，消除贸易投资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依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合作平台，扩大贸易投资规模。尤其是通过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投资、产能合作等，带动我国大型成套设备、高端装备制造、零部件、核电、高铁等产品出口，以及金融、交通运输、研发设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等服务出口。三是扩大自贸区网络，逐步拓展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

第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为外贸出口奠定了坚实基础，产业体系、出口产业链、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装备制造、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应着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要发挥创新设计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作用，提高钢铁冶金、纺织服装、家用电器、汽车、消费电子、金属制品、机械等传统

产业的创新设计能力，实现从出口规模向质量、品牌、高附加值的转变；提升高端装备制造、轨道交通、飞机、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研发、系统集成、服务模式创新能力，扩大出口规模。通过推动“两化融合”“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战略，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释放产业创新活力，培育外贸企业的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等新的竞争优势。

第三，加快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落地生根。加工贸易为我国新一轮吸引高端服务业外资、延伸外资产业链布局奠定了有利基础。国内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等产业合作平台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加工制造企业，不仅形成了开放型经济的基础，而且与跨国公司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应利用跨国公司上一轮投资制造业的基础开展二次招商，重点引进跨国公司研发设计、财务结算、物流等相关服务机构。与此同时，扩大国内上下游配套企业规模，从而形成外资在我国的全产业链布局。据苏州工业园调研，由于飞利浦、三星等加工制造企业落户园区，近年来园区管委会开展二次招商，相继吸引了这些企业的研发中心、共享服务中心等服务机构落户园区，有力带动了园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第四，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我国服务贸易增长潜力大，特别是服务外包、跨境电子商务、网络物流等互联网新兴服务业态的兴起，降低了中小企业出口门槛和成本，为扩大服务出口提供了技术条件。应继续加大对服务贸易的政策支持，发挥示范城市、示范园区的带动作用，重点提高软件、信息技术、电子商务、金融保险、现代物流、文化创意、设计咨询等高端服务出口能力，积极扩大旅游、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出口规模，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服务企业。同时，扩大研发设计、节能环保、信息技术、咨询、教育、医疗、金融等高端服务进口。

第五，发挥海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带动作用。国际经验证明，通过海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避开贸易壁垒带动出口。我国海外投资已经进入加速期。2015年1月—4月，我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49.7亿美元，增长36.1%，遍布14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欧盟投资增长487%，对东盟和美国投资增速分别达62%和33.5%。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813亿美元。应在鼓励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海外投资的同时，带动各类机械、装备、零部件等相关产品出口，以及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科技咨询、信息技术、现代物流等服务出口。

第六，实施积极的扩大进口战略。一是扩大消费品进口规模，尤其要扩大婴儿用品、老人用品、日用消费品、奢侈品等进口，解决长期以来国人境外采购问题，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二是抓住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时机，继续扩大矿产资源、石油等产品进

口，完善国家储备体系，支持企业建立商业储备。三是抓住国际农产品价格下跌时机，适度扩大农产品进口，利用进口调节的同时，减少国内粮食、水果等农副产品的化肥使用量，提高农产品绿色安全标准，节约水和土地资源。四是鼓励高技术产品和服务、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等进口。优化进口环节管理，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

第七，加快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优化外贸发展环境，加速发展模式创新。近年来，国家在扩大企业外贸自主权、通关便利化、放宽外资准入、完善金融服务等方面不断出台政策，使外贸企业经营环境得到一定改善。尤其是通过设立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外贸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动力。但必须看到，我国外贸管理体制、管理方式仍然严重滞后，既不能适应外贸快速发展的要求，也不能适应网络信息时代和新产业革命的要求。如，外贸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出口退税慢、通关效率低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多数企业反映成本上升过快、税负过重，对跨境电商等互联网新业态贸易缺乏规范管理、制度顶层设计等，都严重制约了我国外贸企业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为此，一要加强通关便利化、贸易便利化、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等方面的改革，通过探索“负面清单”“通关一体化”“一站式办公”等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二要加强外贸金融创新，尤其要注重利用互联网金融、众筹等新的融资模式，降低中小外贸企业融资成本，解决融资难问题。三要鼓励企业创新贸易方式。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全球贸易方式、管理方式、商业模式、服务模式的快速创新，为拓宽贸易增长空间提供了难得机遇，要使企业树立“买全球、卖全球”的理念，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四要加强金融保险、数据信息、法律咨询等服务平台建设，为外贸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支撑，有效解决贸易摩擦。五要建立跨境电子商务等互联网新业态贸易的规范管理和统计体系。近年来，跨境电商的贸易量迅速增长，由于在税收、统计等制度设计上不完善，产生的漏税、漏统等问题比较严重，应尽快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加以完善。

责任编辑：李 蕊

全面开放“一带一路”沿线口岸 与各国打造命运共同体

沈进建 陈家勤

摘要：本文对全面开放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口岸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边境口岸在共同构建“一带一路”中的战略地位与重要作用；二是中国与邻国互相扩大边境口岸开放，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开放口岸的基本条件；三是扩大开放“一带一路”边境口岸，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四是以“一带一路”口岸开放为依托，加快实施对外经贸发展战略转型；五是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扩大边境口岸开放，与周边国家打造“三位一体”口岸共同开放示范区。从以上五个层面，与各国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朝着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体制完善的方向而努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 新动力 边境口岸 共同体

作者简介：沈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研究员；
陈家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引言

“一带一路”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具潜力的增长区域，为中国的两个一百年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共享地缘优势，共同发展，共享经济繁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全面开放沿线口岸，实现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战略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一、中国沿边口岸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中的重要地位与重要作用

（一）“一带一路”上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沿边口岸，是新常态下中国与邻国共同发展的增长节点

从地理方位上看，中国沿边省市大部分地区，正处在欧亚增长极交汇区域的核心地带，与“一带一路”相交相汇，边境口岸与周边国家对接相连，成为“一带一路”上的增长节点。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陆路边境线长达 22800 公里，与 15 个国家的领土接壤。“一带一路”上的开放口岸有 285 个，其中空运口岸 63 个，水运口岸 139 个，公路口岸 64 个，铁路口岸 19 个。在这些口岸中，边境水运口岸有辽宁省丹东港、吉林省大安港、黑龙江省黑河港、内蒙古孙吴港、云南省思茅港等五个水运国际口岸。空运口岸有呼和浩特、海拉尔、满洲里。铁路口岸有辽宁丹东、吉林集安、黑龙江绥芬河、内蒙古满洲里、新疆阿拉山口、云南河口、广西凭祥等七个国际铁路口岸，还有 60 多个跨境国际公路口岸。陆路口岸从广西防城港市东兴市开始，按顺时针方向，从东南经过越南、老挝，东北至辽宁丹东。中国南方广西东兴口岸是进出境旅客总人数最多的国际陆路口岸，北方内蒙古满洲里口岸是进出口货物总量最多的国际陆路口岸。早在 1992 年 3 月，在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的进程中，中国将较大的边境口岸提升为口岸城市，开放了黑龙江省黑河市、绥芬河市，吉林省的珲春市，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市、塔城市、博乐市，云南省的瑞丽市、畹町市、河口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凭祥市和东兴市等。

中国的水路口岸更加丰富，在东南沿海和内陆沿江沿河口岸较之北方更为绵长，蜿蜒曲折，大的港口多在海岸河口之地，水路运输方便、成本低，利于港口向内陆腹地延伸。海上丝路港口数不胜数，著名的港口有两千年长盛不衰的大港广州，元代时期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港，唐朝时形成的宁波港，扬州、杭州、北部湾、上海、连云港、青岛、大连等等。这些分布在“一带一路”上的通关要塞、河湖港的口岸，在中国陆路和水路上形成了一条蜿蜒绵长的边境口岸国际经济带，成为中国与毗邻国经贸进出口的国门，连接国家间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守望国家安全的桥头堡、对接两国人员交流的便捷门户，不仅仅为促进与周边国家边境地区的合作发展，为推动我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在新常态下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大经贸的战略转移，与各国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优厚的自然条件。

（二）在新常态下全面开放“一带一路”边境口岸，撬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目前，中国的贸易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突破了10%，稳坐世界贸易大国的第一把交椅，进入新常态。全面开放“一带一路”沿线口岸，为中国在新常态下保持高水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从规模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60多个，覆盖人口44亿，占全球63%，经济规模达21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3，沿线口岸的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出口占全球的23.9%，欧亚铁路网长达8.1万公里，涉及沿线城市核心发展区18个，“一带一路”口岸开放将撬动中国开放的新格局。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亚、南亚、东北亚、中亚各国出访的一系列外交动作，撬动了中国同周边各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打开了“一带一路”的大通道，中国外经贸局面得到了迅速改善。因此，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对接口，“一带一路”上的边境口岸在与周边国家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应抓住这个机遇期，在新常态的背景下，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周边国家一道，扩大口岸相互开放，相互给力借力，把边境口岸建成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拉动交通、通信领域合作的通道枢纽。

二、全面开放“一带一路”边境口岸开放： 中国口岸现行的基本条件和发展展望

（一）当前中国口岸的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加强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城市公共交通的有机衔接，加快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1. 在海港建设方面，《十二五规划纲要》指标要求沿海新增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440个左右。截至2011年底，中国沿海港口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已达1442个，提前超额完成规划，比规划增加1002个^①。同时，沿海口岸货物吞吐量、港口集装箱运输量、港口旅客吞吐量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2. 在铁路建设方面，《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建成“四纵四横”客运专线，建设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干线，建设兰新铁路第二双线、郑州至重庆等区际干线，基本建成快速铁路网，营业里程达到4.5万公里，基本覆盖50万以上人口城市。公路方面，基本建成由7条放射线、9条纵线和18条横线组成的国家高速公路网，通车里程达到8.3万公

^①资料来源：《2012中国商务年鉴》，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第354页。

里，基本覆盖 20 万以上人口城市。这些指标均已基本完成。

3. “十二五”以来，中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趋势明显加快，带动物流需求持续旺盛，区域物流布局加快向中西部倾斜，物流量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都很快，区域物流一体化速度加快发展。长江三角区域的江苏、上海、浙江在物流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在口岸合作机制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物流信息共享等方面统筹力度加大，形成了区域物流联动发展格局。在珠江三角区域合作方面，建立和完善“属地报关、口岸验收”的通关机制，建立与健全检验检疫直通放行制度。

4. 区域物流中心集聚效应得到明显改善。上海率先试点建立口岸通关服务协调新机制，海关和检验检疫的报检报关“一单两报”试点首先在上海启动。深圳打造全球性物流枢纽，把高端物流业打造成现代物流业业态，基本建成具有产业支撑和民生服务功能的服务型城市，具有国际资源配置和国际商务运营功能全球性物流枢纽城市，以及与香港共同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成都建设西部区域物流中心，带动省内其他城市的物流业发展，已建设成为全国第四大航空枢纽、全国第五大铁路枢纽，西部高速公路的枢纽，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综合运输的大通道。

5. 中国口岸建设在全国已形成四大板块的布局。2015 年是“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收官之年。实践证明，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口岸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四大板块的布局，为“十三五”口岸建设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北五省（区）、东北三省加内蒙：充分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向南开放，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一带一路”上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一带一路”核心区。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发挥东北和内蒙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吉、辽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西南地区：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

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程度高、经济势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经验的推广和普及。

内陆地区：利用内陆纵深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优势，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重点区域，推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地开放型经济高地。

（二）在国际经济持续走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对外全面开放“一带一路”口岸的未来发展展望

根据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发展状况统筹考虑，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边境口岸，进一步扩大口岸的通关数量，已经是势在必行。仅从贸易地理的历史发展上来看，传统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大陆桥是贯穿中国和欧洲大陆的贸易大通道。但随着航海技术的大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放，连接欧亚大陆的陆路丝绸之路，逐渐丧失东西方贸易输送带的作用。从 2013 年的统计看，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额高达 5591 亿美元，但只有不到 1% 的贸易产品通过中亚丝路欧亚大陆桥的陆上运输。现在，随着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陆地运输的效率大幅度提高，成本逐渐降低，与周边国家双边贸易的通关数量日益增加，许多国家都提出共同构建贯通欧亚的大陆桥，建立交通运输线，构建 21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拓展空间，寻求发展新动力，找到各自在“一带一路”中的发展定位。因此，对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边境口岸自然成为各自与邻国之间的利益共同点和交汇点，实现道路、贸易、货币、信息、民心相通的新的对接口，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抓手。调整产业结构，互相扩大“一带一路”上的口岸的开放，势在必行。

（三）“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新常态下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边境口岸，与周边国家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从地理人文的角度看，古老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发展史上跨越国家最多、路途最长、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路线，是一条多样化的文化与贸易相互交融的路线。而依此形成的“一带一路”的建设，必须依托“一带一路”国家边境国际口岸的开放、沿线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心城市对接、域内贸易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共同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作为通往世界的通关口岸，在未来共建“一带一路”的构建中，拥有独特的地理优

势，并具备对外开放的示范作用。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慢、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新常态下，互相扩大开放，共同建立口岸国际合作机制，推进周边地区的经济共同繁荣，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构想“一带一路”的进程中，打造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形成一个新的亚欧经济区域，拉动中国经济发展，这将给世界和中国经济格局带来重大变化，也为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边境口岸，与周边国家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四）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布局 and 结构调整，为“一带一路”边境口岸开放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有力支撑

开放“一带一路”边境口岸，中国与周边国家都有地缘优势，而且优势互补。相互扩大边境口岸顺应了各国谋和平、求发展的共同意愿和分享东亚共同发展的利益诉求。中国近几年经济的调整，始终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为边境口岸和边境口岸城市的开放做足了功课，有力地支撑了口岸的扩大开放，是中国边境口岸扩大开放的动力源泉。

从中国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来看，中国东北部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已经为中国东北沿边口岸的开放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开放沿边口岸条件已经成熟。东北亚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辐射地带，在地理上包括中国东三省、内蒙古东部地区、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国及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总和达 17 亿。东北亚区域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 20%，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量的 20%。在这一区域，各国之间的贸易结构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相互依存度高，互补性强，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升值空间。不管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资源，日韩的资本和技术，还是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农业资源、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各国之间在经济、科技、金融、能源、交通、旅游等各方面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地处东北亚的重要区域，针对这一地区的发展，国家先后制订了《中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纲要》《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预警机制转型规划》《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若干意见》《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的实施意见》等。

为推进东北地区的沿海沿边开放和整个东北亚区域的开放和发展，中国相继实施了加快东北振兴的战略、吉林省的长吉图开发开放、辽宁省的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战略以及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沿边开发战略。2009 年国务院批复了《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长吉图地区被列为先导区，正式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开发区。2013 年，中国国务院批准连续三年、每年拨八亿元资金，专项支

持长吉图先导区建设，图们江作为边境口岸，将建成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新窗口”和通向东北亚市场的“桥头堡”，带动东北亚区域合作，开创中国面向东北亚国际合作的新格局。因此，进一步扩大东北的边境口岸开放已经是水到渠成。

沿海地区的北部湾经济区、连云港贸易区的开发和与东盟十国贸易区的共建，加上上海自贸区的实验，为中国开放海上丝路的口岸，进行了制度性的探索和区域的进一步扩大开放。陆路和海路的口岸开放，不仅会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区域发展，还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外贸战略的转移，形成新常态下有利于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地发展。

（五）“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周边国家发展战略不谋而合，为边境口岸的开放提供强大动力

金融危机以后，周边国家共谋发展、求繁荣的愿望空前一致，与扩大开放“一带一路”边境口岸的战略不谋而合。作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主体，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发将为东北亚区域合作创造新动力。俄罗斯的学者提出了《2050年：中国俄罗斯共同发展战略》，提出要加强俄罗斯在东北亚和亚太地区的地位。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战略目标是要把该地区建成亚太的高附加值地区，提升俄罗斯的亚洲市场竞争力。目前，俄罗斯已决定在远东地区建立14个经济特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打造中企、韩企、日企等合作的平台。与中国的发展战略不谋而合，成为地区发展的新动力。其次，俄罗斯的入世有助于东北亚各国按照世贸组织的机制框架，进一步规范各国之间的贸易，更加有效地解决贸易争端，减少贸易摩擦，促进贸易公平、有序地发展。2010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年度峰会上签署《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确定了东北亚地区接下来十年的合作计划，为长吉图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2012年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启动谈判以来，已达成多项共识，自贸区建设也取得长远发展，争取早日完成自贸区的谈判。大图们江行动计划、环黄渤海经济区、环日本海经济区等次区域合作也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合作模式日渐成熟。另外，受区域合作多层次、民间合作的意愿强烈，更需要有更加灵活的合作机制。为此举办的东北亚地方政府首脑会议、东北亚经济论坛以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等，从不同层面，采用不同的机制，有力地促进了东北亚各国的交流合作，地区的发展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总之，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相互扩大开放边境口岸的条件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旦国际安全环境出现转机，可以预见，扩大开放即将全面展开，应尽早谋划，积极筹备。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陆路口岸开放相辅相成，在中国的南部，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口岸。早在1979年，中国先后选择具有历史区位优势在广东、福

建两省，优先实行对外开放，实行有利于对外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开辟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使其具有出口加区和自由贸易区的某些功能。1984 年，在东南沿海城市开放了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沿海港口城市。在这些港口开放城市中，大多数又专门开辟了供吸收外资办企业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或开发区。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这些城市工业基础较好、科技水平较高、交通方便、信息灵通的口岸优势，通过外引内联、建立新产业、开发新产品，面向海外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1986 年—1988 年，先后开辟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1988 年，又将海南省划为经济特区，带动了中国最发达地区的港口与台湾、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十个国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区的资本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的流动，加快了这一地区的产业升级、外贸转型、资本流动，成为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从未来长远发展来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沿海口岸的扩大开放，必将成为中国深化改革、产业升级的一个强大驱动力，进一步拓展沿海口岸与邻国之间的人才、技术、资金等市场要素的流动，弥补中国在创新意识和某些领域的短板不足，带动国内周边城市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其中，上海自贸区的试验，将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海口岸开放的先导，从而，为加快实现中国对外经贸战略的全面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成为各国不谋而合的发展战略的最有力的支撑点。

三、开放“一带一路”边境口岸，与邻国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

（一）加快中国经贸战略转型，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打造边境口岸“三位一体”共同发展的新模式

近两年来，亚太局势出现动荡，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主动外交行动，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实现了华丽转身。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走访“一带一路”70 个国家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不断解读和阐述“让共同体的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这些讲话已经成为当前指导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中国高端通信电子产品和工业制造业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指导思想。为此，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共同体思想为指导方针，设计发展规划，制定相关的法规措施。共同体要以中国为主导，从地缘临近的国家做起，逐步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太平洋诸多岛国，向欧洲、澳洲、美洲等发达国家共同合作的发展模式，也是未来中国对外经贸战略转型的目标和战略实施的支撑点。打造全球共同体目标要求，中国边境口岸必须更加开放，经贸发展更加便利，制度更加健全，联系更加紧密，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更要兼顾发展不同阶段国家彼此的利

益。在对外经贸战略转型的顶层设计上，首先要考虑国家层面的大经贸，积极开展首脑外交，实施国家间合作的重大项目，同时也要筹划中国与周边城市之间、边境口岸之间的共同发展，兼顾文化交流、生态保护、民生幸福、城镇就业、产业集聚与生活配套共同发展等，把中国的对外经贸战略转型，上升为与周边国家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使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市场更加开放，加快构建亚欧区域的一体化。各国首脑相聚和平、携手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一带一路”边境口岸，与周边国家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提供了政策支持，夯实了基础。

2014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合组织会议上的讲话得到了各国首脑的支持和积极回应，并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俄中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要加快建设，要充分发挥两国间100多对友好省州、城市关系的作用，促进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中蒙要拉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跨境运输；中哈要扩大两国能源、双向投资、加工制造业、加强过境运输等领域合作，建设好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提升经贸合作水平；土库曼斯坦愿意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改善本国交通基础设施，推进中亚同中国跨境运输；吉尔吉斯斯坦提出与中方合作，打击“东突”和“三股势力”；中国则更愿意积极主动地加大与周边国家相互支持，开展农业合作，扩大农作物示范种植、蔬菜栽培、畜牧育种、兽医、淡水养殖、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与贸易及人员培训。共建农业科技示范园，进一步加强农产品生产、加工与销售各环节的合作。上述这些共已成为互相扩大开放的指南和动力，也预示着一场互相扩大开放边境口岸，构建“共同体”的大幕即将拉开。

（二）新常态下中国对外经贸发展面临新挑战，应把口岸开放作为新的突破口，加快对外经贸的战略转型

虽然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出访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但也应当指出，尽管中国贸易进出口总值2013年超过美国，排到世界第一，但中国外贸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在新常态下其主要表现是：面临内外忧患的中国制造，对环境资源破坏型的发展，低附加值缺少品牌的总体出口产品结构。国内外经济政策调整不到位，企业税费负担较重，生产要素成本持续增加，贸易便利化水平不高，融资难度较大。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地区冲突危机不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增加。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也受到影响。中日贸易更是遭遇了寒流，一些驻华企业的经营受到影响，国内一些外经贸企业是最大的受害者，一些企业的生产和技术升级受此影响，产业转型陷于停顿，一些国际经济合作开发区的规划也无法实施。

这些都说明，中国对外经贸发展战略转型和升级已迫在眉睫，必须保持清醒，早做

谋划。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应积极创新，把“一带一路”的口岸开放，作为寻求中国对外经贸发展战略转型的突破口。

（三）在命运共同体的框架内，创建“一带一路”口岸共同发展的新模式

在新常态下，寻求“一带一路”边境口岸的共同发展，应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体的思想为指导，有针对性地设计“一带一路”发展规划口岸共同发展的新型模式，并制定相关的法规措施。共同体是由中国主导的、与地缘临近的周边国家共同合作、共同发展的全新模式，也是未来中国对外经贸发展战略转型的目标和战略实施的支撑点。共同打造共同体要求中国的口岸外经贸必须更加开放，贸易更加便利，制度更加健全，联系更加紧密，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更要兼顾贸易伙伴国彼此的利益。

在口岸开放的顶层设计上，首先要考虑国家层面的大经贸，积极开展首脑外交，实施国家间合作的重大项目，同时也要筹划中国与周边城市之间、边境口岸之间的共同发展，兼顾文化交流、生态保护、民生幸福、城镇就业、产业聚集与生活配套的共同发展等。把中国的对外经贸战略转型，上升为与周边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使“一带一路”口岸对周边的市场更加开放，加快构建亚欧区域的一体化。

（四）全面开放“一带一路”口岸，从不同层面与周边国家共同打造口岸命运共同体 打造“一带一路”口岸开放共同体，应包括五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在政府层面上，应本着亲诚互信原则，深化同周边国家的战略契合点，把原来口岸过境的外贸企业的对外贸易、投资、合作中的国家级重大项目，转变成为中国主导的，由各国首脑出面共同签约的国家级项目。从国家层面推动双边的项目合作，为共同发展提供有力的政府支撑和项目实施的保障。

二是在市场层面上，应本着互利共赢原则，以“一带一路”口岸的市场为依托，利用好双边比较优势，找到市场上平衡点，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在追求市场份额的同时也要兼顾别国利益，不把过剩的产能倾销到别国市场，垄断别国市场，掠夺别国资源，损害他国利益；不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实现自己的发展，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实现两国开放口岸市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三是在企业层面上，应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不再把追求过境口岸的出口数量作为唯一的对外经贸的指标，而以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为基础，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各方面的资源，把在别国投资建设自己的产业飞地转变为在其他国家生产，雇佣当地居民，本国职工与他国职工保持一个合理比例的利益互惠的

企业。

四是在投资层面上，应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口岸的自由贸易区的共同建设，扩大贸易与投资空间，构建区域一体化新格局。逐步把对外投资型的项目转变为资源、技术、劳动力、土地、市场、资金互补型的共同合作项目，深化金融合作，共建投资银行，完善区域金融体制和安全。

五是在环境层面上，应本着共同发展，共享繁荣原则，不把本国污染企业转移到别国生产，不把污染性产品销售到他国市场，不以开发别国资源作为自己的投资唯一目的，而以资源互补、共同发展作为投资目标，把“一带一路”建成与邻国合作的命运共同体。

四、以“一带一路”口岸开放为依托， 加快实现对外经贸发展战略转型

打造边境口岸对外开放的命运共同体应要从五个方面入手，实现“五个转变”。一是要把“一带一路”口岸的开放，从追求购进口岸的商品数量转向过境产品的质量和提高附加值的经济效益转变；二是从出口产品的粗放加工向创新型的深加工和精加工转变；三是从出口产品参与国际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分工向参与国际高端产业价值链的转变；四是从东部地区口岸的开放向沿海、内陆、西部沿边地区的口岸开放，协作发展转变；五是从主要依靠货物、实物进出口贸易向服务贸易发展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打造边境口岸“三位一体”的共同体，才能真正促进中国对外经济创新转型和持续发展。

五、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边境口岸开放， 与周边国家打造“三位一体”共同体的对策建议

首先，让共同体的理念落地生根。中国要冲破美国对中国进行包围的太平洋战略，与周边国家打造共同体，则是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的有力武器，它包含了处理政治关系的原则，也包含了改善经济关系的内容，这一思想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逐渐被周边国家接受。打造共同体首先要把亲、诚、惠、荣的共同体理念，推广到国际关系中去，扎根周边国家。其次，要把握好“一带一路”开放口岸示范区的建设定位。与周边国家命运相同国家的口岸建设，可以定位为命运共同体。对那些经济上互补、地缘上相近的周边的口岸开放，可以打造成为利益共同体。对共同反对恐怖主义和“三股势力”势力国家的周边口岸开放，应首先打造成为责任共同体。再次，应优先选择那

些在历史上有过频繁交流，文化交融、血脉相同的边境口岸进行开放示范。在感情上、人脉上、交通上，加快实现人员交流、货物交流、文化交流，信息交流，增加互信，共同发展。第四，共同朝着口岸机制完善、合作全面、协调顺畅发展。针对问题，参考世贸规则，共同制定一套适应共同发展的规则，互相考虑彼此的利益，进一步扩大各个领域的相互开放与合作，共享各方的互补优势，共同享受发展成果。第五，提升政府间的协调能力，建立协调机构，解决冲突和摩擦。周边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因此，必须从首脑外交，顶层设计入手进行推动，从上到下地逐层落实，共同推进口岸对接、跨区域整合，形成口岸群、口岸带，把口岸建成互市贸易区、产品集散地、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带。

“一带一路”是过去几千年古老的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经贸不断换来的结果，承载着世界各国共同的历史，蕴含着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幸福梦想。它从陆路和海路上组成了世界上最长的，也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具发展潜力的陆路经贸大陆桥和海上运输的大通道，是当代全球共建 21 世纪的繁荣社会的基础，是实现中国宏伟梦想、海上强国的巨大舞台，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最广阔的大道。在新常态下，全面开放“一带一路”沿线口岸，是实现中国大经贸战略转移的关键。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应认真研究和讨论、统筹考虑、精密规划、逐步实施。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 10 月版。
2. 宋建钢、饶彦久、田玲娟：《向西开放全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光明日报》2014 年 8 月 1 日。
3. 董倩、邱力生：《以服务贸易助推西部地区发展》，《光明日报》2014 年 8 月 1 日。
4. 高建进：《福建“海丝”先行区频出新招》，《光明日报》2014 年 8 月 1 日。
5. 李斌、孟娜：《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光明日报》2014 年 9 月 12 日。
6. 陈贇、李斌：《习近平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光明日报》2014 年 9 月 12 日版。
7. 孙绪：《打造东北亚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光明日报》2014 年 09 月 14 日。
8. 赵春明：《国际经济规则新趋势及中国的应对策略》，《光明日报》2014 年 8 月 25 日。
9. 习近平：《让中塔友好像雄鹰展翅》，《光明日报》2014 年 9 月 11 日。
10. 陈恒：《超越贸易的经济带构想》，《光明日报》2014 年 9 月 11 日。

(下转第 123 页)

新常态下中国省域经济 综合竞争力评价分析

黄茂兴 李军军

摘要：省域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当前中国要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就必须着眼并着力提升省域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本文简要介绍了由课题组构建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分析 2012 年—2013 年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发展变化，总结了中国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优势、劣势和变化特征，为提升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新常态 省域经济 综合竞争力 评价分析

作者简介：黄茂兴，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军军，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进入 21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全球分工趋势更为明显，各国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竞争性增强，直接影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建设。实践证明，任何一个市场主体和经济区域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勇敢地面对竞争，积极参与竞争并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对一个经济区域而言，这就要求它有很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经济综合竞争力是一个地区、一个产业或行业在市场经济的激烈

竞争中占据优势、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提高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文化、企业等方面的竞争力。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尽快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上来”。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中国越来越重视国际竞争力和产业、行业竞争力的提升。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强化和中国转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如何应对经济发展？这就要同时面对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激烈竞争。如何开创并确保竞争优势？对一个省级行政区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具有很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也是顺应全球化趋势、增强综合国力和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由福建师范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牵头负责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蓝皮书已经连续出版了九部，该书围绕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内涵、特征和演变趋势进行了持续的跟踪研究。2015 年《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蓝皮书结合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特点，对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再次作了微调，力求使评价内容能更好地反映中国省域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增长要求。本文根据该书最新研究成果，简要介绍了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及其特点，并对 2012 年—2013 年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综合分析，总结了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优势、劣势和变化特征，对进一步提升中国省域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由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引伸出来的一个概念。省域经济从本质上说，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所谓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指一个省（市、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对资源的吸引力、对市场的争夺力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带动力。显然，一个省（市、区）域吸引资源、争夺市场和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能力强，这个省（市、区）的经济就有可能比其他省（市、区）的经济发展要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建立对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过去和现在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及其数学模型，是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础。形势在发展，情况在变化，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也是在不断更新调整，力求反映省域经济发展的最新特点。《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13—2014）》蓝皮书在以往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和研究的需要，充分吸收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对评价指标体系再次作了微调，特别是对一小部分指标进行了更新、调整，力求使评价内容能更好地反映省域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增长的要求。

最终确定的指标体系包括总指标一个，即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这是衡量一个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综合性指标，也是用以衡量评价一个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优劣的最终标准。该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实际上是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总称，这一体系需要由相应的组成部分即子系统来支撑。根据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内涵和结构，我们从宏观经济竞争力、产业经济竞争力、财政金融竞争力、知识经济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发展环境竞争力、政府作用竞争力、发展水平竞争力、统筹协调竞争力九个方面设立二级指标九个，构成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主要方面和主体框架。同时，在每个二级指标下面再设置三级指标和四级指标，最终形成的指标体系包括 25 个三级指标和 210 个四级指标。

（二）指标体系的特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评定政绩的偏向，这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而应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因此，本指标体系综合考虑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指标设置中，纳入了影响排名的各种要素，尽可能地体现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内涵要求。在该指标体系的 210 个四级指标中，所占权重最大的两个指标为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GDP）综合能耗，权重为 0.88%；其次是教育经费，权重是 0.85%；权重排在前三位的指标，都与科技教育、环境治理有关，说明了科技创新、知识经济、节能减排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地区生产总值即各地区的 GDP 所占的权重为 0.63%，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所占的权重为 0.54%，进出口总额所占的权重为 0.67%。这些经济总量指标所占的权重不是很高，这也表明了该指标体系是比较全面、广泛和科学的。

二、新常态下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评价结果

（一）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总体评价

根据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及其数学模型，对 2012 年—2013 年中国大陆地区 31 个省、市、区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得出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各级指标得分和排名，综合排名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2 年—2013 年中国各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比较

省份	2012 年	2013 年	省份	2012 年	2013 年	省份	2012 年	2013 年
江苏	1	1	河南	11	11	海南	21	21
广东	2	2	四川	10	12	黑龙江	22	22
北京	3	3	湖南	13	13	山西	23	23
上海	4	4	河北	17	14	新疆	24	24
浙江	5	5	安徽	14	15	广西	25	25
山东	6	6	重庆	15	16	贵州	28	26
天津	7	7	吉林	16	17	宁夏	29	27
辽宁	8	8	内蒙古	18	18	云南	27	28
福建	9	9	江西	19	19	青海	26	29
湖北	12	10	陕西	20	20	甘肃	30	30
						西藏	31	31

2012 年中国 31 个省、市、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 位）的依次为江苏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辽宁省、福建省、四川省；排在中游区（11~20 位）的依次为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重庆市、吉林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江西省、陕西省；处于下游区（21~31 位）的依次为海南省、黑龙江省、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西藏自治区。2013 年中国经济综合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 位）的省份依次为江苏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辽宁省、福建省、湖北省；排在中游区（11~20 位）的依次为河南省、四川省、湖南省、河北省、安徽省、重庆市、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江西省、陕西省；处于下游区（21~31 位）的依次为海南省、黑龙江省、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云南省、青海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

与 2012 年相比较，2013 年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上升的有四个省份，上升幅度最大的是河北省，排位均上升了三位，湖北省、贵州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排位均上升了两位；21 个省份的排位没有变化；排位下降的有六个省份，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青海省，排位下降了三位，其次是四川省，下降了两位，吉林省、安徽省、云南省和重庆市均下降了一位。

在评价期内，有个别省、市、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的升降出现了跨区段变化，表现在湖北省和四川省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出现了跨区段变化，其中，湖北省由中游

区升入上游区，四川省由上游区又重新降入中游区。总体上看，各省市区的排位相对稳定，特别是上游区的十个省份的排位稳定不变，中游区和下游区分别有四个省份排位发生变化。

（二）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分析

按照阈值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和加权求和后得到的全国各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反映出的只是排序位差。要想更为准确地反映各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实际差距，还需要分析各级竞争力指标的得分及分布情况，对竞争力得分的实际差距及其均衡性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图 1 反映了 2012 年和 2013 年中国各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分值的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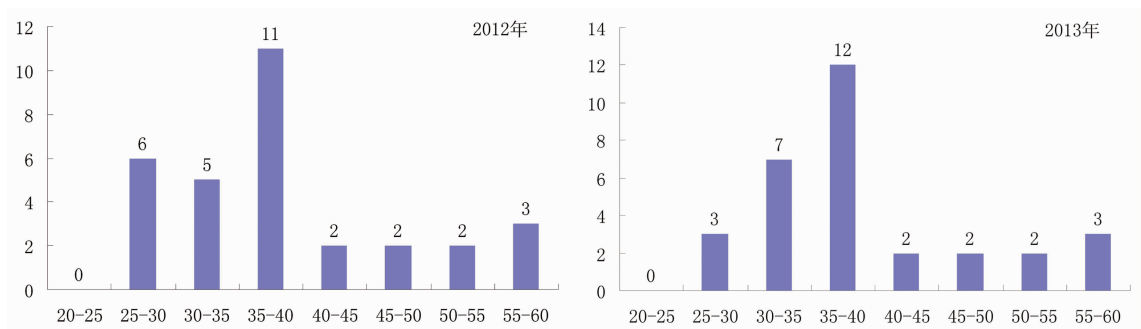


图 1 2012 年和 2013 年中国各省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评价分值分布

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分布很不均衡，中国有一半多的省份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集中在 30~40 分之间，从整体上看，都比较分散，而且呈现偏态分布。从 2012 年—2013 年的对比情况来看，2013 年各省份得分有所提高；其中得分在 25~30 之间的省份由六个减少到三个，在 30~35 之间的省份由五个增加到七个，而得分在 35~40 分之间的省份则由 11 个增加到 12 个；其他得分区间的省份数量变化不明显。

不同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差距悬殊，2013 年，得分最低的西藏自治区只有 27.2 分，不到第一名江苏省的一半。另外，相同区位内部各省份的得分差距也比较明显。同样是处于上游区，排在第十位的湖北省与排在第一位的江苏省在评价总分值上相差了 20.2 分；同样是处于下游区，排在第 21 位的海南省比排在第 31 位的西藏自治区超出 8.02 分；但是处于中游区的十个省份得分比较接近，排位第 11 位的河南省得分为 38.8 分，比排位第 20 位的陕西省仅多出 3.11 分。处于上游区的十个省、市、区平均分为 50.1 分，处于中游区的十个省的平均分值为 36.9 分，处于下游区的 11 个省、市、区的平均分为 31.2 分，三个平均分值的比差为 1.6:1.2:1。

表 2 2012 年—2013 年中国各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分值及其变化情况

地区	2012 年	2013 年	分值升降	地区	2012 年	2013 年	分值升降	地区	2012 年	2013 年	分值升降
江苏	59.6	58.9	-0.7	河南	38.1	38.8	0.7	海南	34.6	35.2	0.6
广东	57.3	58.4	1.1	四川	39.1	38.3	-0.8	黑龙江	34.6	34.4	-0.2
北京	56.1	56.4	0.3	湖南	36.8	37.8	1.0	山西	33.3	33.5	0.2
上海	53.9	54.7	0.8	河北	35.6	37.4	1.8	新疆	31.2	32.1	0.9
浙江	50.5	51.4	0.9	安徽	36.6	36.7	0.1	广西	31	31.3	0.3
山东	48.3	48.9	0.6	重庆	36.3	36.6	0.2	贵州	29.5	30.9	1.4
天津	45.9	47.8	2.0	吉林	35.8	35.9	0.1	宁夏	29.3	30.7	1.4
辽宁	42.9	43.5	0.6	内蒙古	35.4	35.8	0.4	云南	29.7	30.7	1.0
福建	40.4	41.8	1.5	江西	35.3	35.8	0.5	青海	29.7	29.1	-0.6
湖北	37.7	38.9	1.2	陕西	35.2	35.7	0.5	甘肃	27.7	28.6	0.9
平均	49.3	50.1	0.8	平均	36.4	36.9	0.5	西藏	26.7	27.2	0.5
								平均	30.7	31.2	0.5

从 2012 年—2013 年中国各省份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的升降来看，有 27 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出现上升趋势。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天津市，增加了 1.97 分；其次是河北省、福建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湖北省、广东省、湖南省、云南省，都增加了一分以上；但也有四个省份得分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四川省，下降了 0.77 分。从全国的平均分值来看，2013 年为 39.1 分，比 2012 年上升了 0.61 分，上升幅度比较大。总体来看，2012 年—2013 年中国各省市区的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三）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区域评价分析

从中国各区域间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综合测算和分差来看，2013 年中国四大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评价分值依次为：东部地区 49.1 分、中部地区 36.9 分、西部地区 32.2 分、东北地区 37.9 分，四者的比差为 1:0.75:0.66:0.77。与 2012 年相比，西部地区与东部的差距扩大了 0.38 分，这表明西部地区竞争力有所下降。

从 2012 年—2013 年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平均分值的变化情况看，四个地区平均分値各有变化。其中，东部地区分值上升最多，增加了 0.88 分；其次为中部地区，增加了 0.62 分；西部地区得分增加了 0.5 分。这些情况反映出中国各区域经济都得到了健康、持续发展，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都得到有效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有所增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也步入协调发展的新常态。

东部地区十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绝大部分都在上游区，只有河北省处于中游区和海南省处于下游区，其他八个省份都处在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上游区，并且排位都比较稳定，排位基本没有变化，这说明东部地区的竞争力在全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在东部地区的十个省份内部，竞争格局也是不平衡的，最明显的差距体现在海南省与其他省份之间，即使同样是排在上游区的省份，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根据中国 31 个省市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情况发现，江苏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得分超过 50 分，山东省、天津市、辽宁省和福建省的得分则在 50 分以内，而海南省的得分仅为 35.2 分。总体上看，2012 年—2013 年两年内东部地区内部的排位基本保持稳定。

中部地区六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除山西省处在下游区外，其他五个省份都处在中游区；与 2012 年相比，2013 年湖北省的综合排位波动明显，上升了两位；其他省份排位的变化幅度不大。从与其他区域比较来看，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得分差距较大，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得分差距较小，这说明整体上而言中部地区尚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中部地区内部的六个省份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湖北省、河南省、湖南省和安徽省都处于中游区的前列，江西省处于中游区的靠后位置，山西省则处于下游区。从地区内部的排位变化情况来看，中部地区各省份竞争力的相对变化并不明显。

西部地区 12 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大多数处在下游区，但是也有个别省份处于中游区，如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重庆市和陕西省处于中游区，而其他各省份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地位。从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得分来看，西部地区平均得分只有东部地区得分的 66%，表明其竞争力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比，很多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差距很小，其竞争劣势就不太明显。从 2012 年—2013 年得分变化来看，西部地区平均得分增加比较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反而有所扩大，说明西部地区的竞争力提升速度有待提高。从西部地区 12 个省份的综合得分来看，各省份之间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这使得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综合竞争力排位相对稳定，除了少数省份排位有所调整以外，没有太大的变化。

东北地区三个省份相对于其他地区，2013 年竞争优势有了一定的提升，其中吉林省下降了一位，但黑龙江省的排位与辽宁省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三、新常态下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表现特征

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由九个二级指标、25 个三级指标和 210 个四级指标构成的综合评价体系，综合反映了一个省份在经济、科技、教育、财政、金融、资源、环境、政府作用和统筹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发展能力，及其在全国的竞争地位。这些方面的发展相互

促进、相互制约，共同影响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排位和变化趋势，也表现出一定的变化规律和特征。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发展变化有其内在的基本特征，既有各个省、市、区普遍存在的共性特征，也有不同省情所决定的特殊性。要想有效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就需要深刻认识和深入把握这些特征，从而研究和发现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正确路径、方法和对策。

（一）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整体比较稳定，个别省份竞争力排位波动明显

从 2012 年—2013 年排位变化情况来看，整体上各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相对比较稳定，在某一区段内变化较小，只是在局部有所调整。2012 年处于上游区的十个省份，2013 年都继续保持在上游区，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地位。2012 年处于中游区的十个省份也都继续保持在中游区。处于下游区的 11 个省份仍然继续处于下游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几个省份的排位一直都处于下游区的末尾，表现出其长期而明显的竞争劣势，竞争劣势地位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尽管各省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排位相对稳定，但并不意味着各省份之间的竞争优势没有发生变化。从竞争力得分就可以看出，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之间的差距还是有所变化的，只不过这种变化在短时间内还不够明显，还没有对排位产生较大影响。当竞争过程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后，这种差距就会逐步扩大，使竞争力排位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中游区和下游区的省份，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发生变化的省份比较多，其中中游区十个省份中有五个省份的排位发生变化，下游区 11 个省份中有四个省份的排位发生了变化，主要是中游区和下游区的各省得分比较接近，各省份之间的竞争优劣势不明显，排位容易发生变化。尽管上游区各省的得分差距比较大，相互之间排位比较稳定，但当分值差距的变动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有可能发生排位上的变化，比如江苏和广东排位对调，上海和北京排位对调。

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稳定性说明，一个省份的竞争优势或者竞争劣势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通过众多客观指标综合反映的结果，从而形成该省域经济的综合竞争优势。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不能寄希望于一时的变化，也不能寄希望于少数指标的变化，而是需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是各个方面综合发展、协同提升的结果。但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又是动态变化的，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各种因素都有可能使其排位发生变化。不管是大省还是小省，经济是否发达还是欠发达，每个省份都要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发展、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才能有效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

（二）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多种要素综合反映的结果，客观上体现了各省域经济发

展的能力与水平

表 3 列出了 2012 年和 2013 年各省市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与九个二级指标竞争力得分的相关系数及其变化情况。

表 3 2012 年—2013 年全国各省市经济综合竞争力与二级指标得分相关系数

年份	宏观经济竞争力	产业经济竞争力	可持续发展竞争力	财政金融竞争力	知识经济竞争力	发展环境竞争力	政府作用竞争力	发展水平竞争力	统筹协调竞争力
2012	0.940	0.886	0.252	0.733	0.954	0.888	0.917	0.934	0.792
2013	0.944	0.897	0.213	0.808	0.929	0.890	0.882	0.939	0.718
变化	0.005	0.012	-0.039	0.074	-0.025	0.002	-0.036	0.005	-0.074

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相关系数最大的二级指标是宏观经济竞争力，其次为发展水平竞争力和知识经济竞争力，相关系数都超过 0.9，远高于其他几个二级指标，同时产业经济竞争力、发展环境竞争力和政府作用竞争力等几个二级指标的相关系数也比较大。这种高度拟合的结果说明宏观经济竞争力是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最直接的体现，也就是说，各省在大力发展经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过程中，经济综合竞争力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同时，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评价对象是以省域级别的行政区域划分的，各省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提升离不开各省级政府对本省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调控和指导作用。各省级政府依据本省的省情，制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和规划，实施针对本省发展经济、规范调控经济和保障经济措施，对本省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有直接影响。由于科技创新是省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教育发展为省域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所以知识经济是提高省域经济发展速度、优化省域经济结构、提高省域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从 2012 年—2013 年两年内相关系数的变化来看，系数增加的只有产业经济竞争力，其他二级指标和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相关系数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说明产业经济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产业经济竞争力的提升逐渐成为经济综合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动力。

总之，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多种要素综合反映的结果，既是经济总量的竞争，也是增长速度、平均水平、经济结构和效益的综合竞争，是显性优势和潜在优势的综合反映。任何一个省份要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要从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各要素出发，全面培养竞争优势，减少竞争劣势，制定竞争力提升的长期战略。

(三) 产业经济竞争力是影响或推动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次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载体，产

业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企业竞争力更是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图 2 和图 3 分别描述了 2012 年和 2013 年中国各省、市、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变化与产业经济竞争力的变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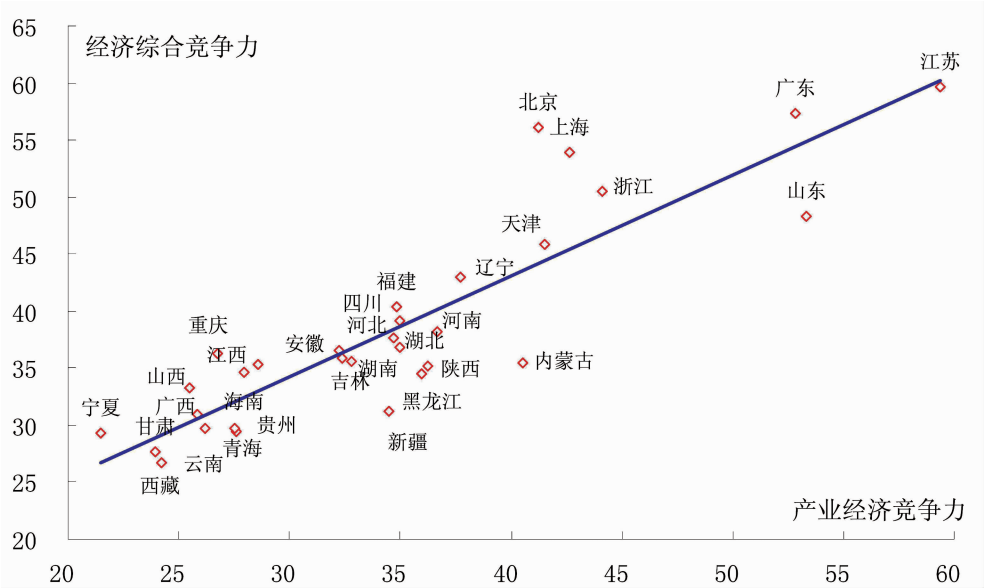


图 2 2012 年中国各省市产业经济竞争力和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的对应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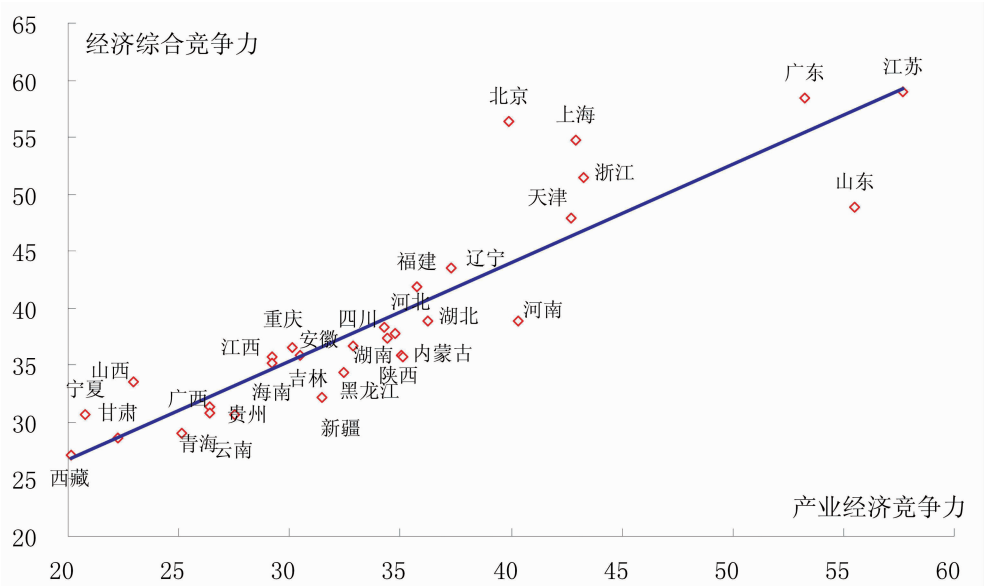


图 3 2013 年中国各省市产业经济竞争力和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的对应关系

各省、市、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和产业经济竞争力基本上是同方向变化的，大部分省份都聚集在趋势线上，具有较强的正向线性关系，也就是说产业经济竞争力得分越高的，其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也越高。2012 年和 2013 年的图形非常接近。当然，也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省份，比如北京市和上海市等地的产业经济竞争力不是特别靠前，但经济综合竞争力反而名列前茅，这是由于其他二级指标得分比较高的缘故。可以说，没有产业的发展，就没有国民经济的发展，产业就没有竞争力，国民经济也不会有竞争力，由此决定了产业经济竞争力是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产业经济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是推动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上升的主导力量，要大力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必须紧紧抓住产业经济竞争力这一关键环节。

（四）只有切实做到固强扶优、优化指标结构，才能保持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处于优势地位

表 4 列出了 2013 年中国各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四级指标的竞争态势结构，以反映竞争力指标优劣势结构对竞争力排位的影响。

表 4 2013 年中国各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四级指标优劣势结构分析

地区	强势指标（个）	优势指标（个）	中势指标（个）	劣势指标（个）	2013 年排位
江苏	60	77	37	36	1
广东	46	63	38	46	2
北京	73	38	36	63	3
上海	63	57	32	58	4
浙江	33	93	40	44	5
山东	38	66	67	39	6
天津	40	66	40	64	7
辽宁	13	84	77	36	8
福建	11	70	83	46	9
湖北	6	58	105	41	10
河南	14	53	79	64	11
四川	4	59	87	60	12
湖南	7	48	95	60	13
河北	5	50	83	72	14
安徽	4	42	105	59	15
重庆	6	50	98	56	16
吉林	8	34	97	71	17
内蒙古	16	36	69	89	18
江西	6	32	101	71	19
陕西	9	37	107	57	20
海南	20	45	60	85	21

续表 4

地区	强势指标（个）	优势指标（个）	中势指标（个）	劣势指标（个）	2013 年排位
黑龙江	11	43	65	91	22
山西	12	27	98	73	23
新疆	13	46	51	100	24
广西	2	25	92	91	25
贵州	16	29	46	119	26
宁夏	16	35	58	101	27
云南	10	37	57	106	28
青海	12	38	36	124	29
甘肃	11	23	56	120	30
西藏	34	19	17	140	31

一个省份拥有众多的强势指标和优势指标，其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才能在这段时间内保持竞争优势地位。江苏省、广东省、上海市和北京市等省份之所以长期处于上游区，排位始终名列前茅，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省份都有一大批始终处于上游区的强势指标和优势指标，而且强势指标的数量也是最多的。强势指标的数量以天津市为界线，形成了明显的断层，排位在天津市之前省份的强势指标数量最多，远远超过其他省份，其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优势地位非常稳固，而辽宁省、福建省和湖北省虽然位居于上游区，但强势指标个数相对较少，与其他很多省份没有太大差别。当然，强势指标的个数也不可能完全决定一个省份在全国的排位，特别是处于中游区省份的强势指标个数比较少，而处于下游区省份的强势指标个数反而比较多，很多排位比较靠前省份的强势指标个数反而比排位靠后省份的少。比如排在末位的西藏自治区，拥有 34 个强势指标，不但比中游区和下游区省份的强势指标多，甚至比处于上游区的辽宁省、福建省和四川省拥有的强势指标数量还要多。另外，海南省也拥有较多数量的强势指标，但排位都处在下游区。

决定一个省份排位的不仅仅是强势指标数量，更重要的是优势指标数量。处于上游区的辽宁省和福建虽然强势指标不多，但它们拥有的优势指标数量比较多，这是排在下游区的省份无法比拟的，其他处于上游区的省份也有这个特点。把各省份的强势指标个数和优势指标个数加总后，可以发现，强势和优势指标个数之和越多的省份，其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就越靠前。处于上游区的十个省份中，排在前七位省份的强势和优势指标个数之和都超过 100 个，辽宁省也接近 100 个，而福建省的强势指标和优势指标个数之和也远远超过中游区和下游区省份。所以，强势指标与优势指标的组合，才是决定一

个省域在全国排位处于上游区的关键因素。中游区和下游区省份的强势指标和优势指标数量之和都比较少，而且区别不大，因而区分中游区和下游区的重要因素就主要体现在劣势指标的数量上。排在第 24 位之后省份的劣势指标个数大多都超过 100 个，其他下游区省份的劣势指标个数也接近 100 个，远多于排位在前的省份。所以，一个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需要依靠更多的强势指标和优势指标来支撑，反之，劣势指标太多，就会导致其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靠后。处于下游区省份的强势、优势指标都比较少，中势指标和劣势指标数量相对较多，劣势指标越多，排位就越靠后。

总之，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优势地位的保持和提升，关键在于强势指标和优势指标数量的增加，从而对应于劣势指标数量的减少，因此，一个省份在指标体系中强势指标、优势指标、中势指标、劣势指标的不同结构分布，决定了这个省份在全国的竞争力排位。这也为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明了基本路径和方法，即，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保持强势指标，强化优势指标，减少劣势指标，不断优化指标的组成与结构，才能保持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优势地位。

（五）增加上升指标、减少下降指标，是显著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向

表 5 列出了 2013 年中国各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四级指标的竞争变化趋势，以反映竞争力指标排位波动及其结构对竞争力排位的影响。

表 5 2013 年中国各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四级指标的竞争变化趋势

地区	上升指标（个）	保持指标（个）	下降指标（个）	波动趋势	区位
河北	71	75	64	3	中游
湖北	67	81	62	2	上游
贵州	70	90	50	2	下游
宁夏	69	78	63	2	下游
北京	60	99	51	0	上游
天津	76	82	52	0	上游
山西	72	61	77	0	下游
内蒙古	49	84	77	0	中游
辽宁	66	83	61	0	上游
黑龙江	46	76	88	0	下游
上海	48	99	63	0	上游
江苏	52	107	51	0	上游
浙江	61	102	47	0	上游

续表 5

地区	上升指标（个）	保持指标（个）	下降指标（个）	波动趋势	区位
福建	72	81	57	0	上游
江西	72	68	70	0	中游
山东	61	95	54	0	上游
河南	66	87	57	0	中游
湖南	60	74	76	0	中游
广东	56	105	49	0	上游
广西	63	86	61	0	下游
海南	73	77	60	0	下游
西藏	44	119	47	0	下游
陕西	62	77	71	0	中游
甘肃	62	89	59	0	下游
新疆	68	89	53	0	下游
吉林	55	74	81	- 1	中游
安徽	69	64	77	- 1	中游
重庆	77	71	62	- 1	中游
云南	72	79	59	- 1	下游
四川	54	78	78	- 2	中游
青海	50	93	67	- 3	下游

各省、市、区 210 个四级指标的排位波动及其构成变化对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变化有较大影响。在综合排位上升的四个省份中，都是上升指标的个数超过了下降指标的个数，特别是上升指标个数显著大于下降指标个数的省份，其排位的上升幅度较大。比如湖北省，上升指标的个数超过下降指标的个数比较多，排位上升幅度比较大。排位保持不变的 21 个省份中，虽然上升指标的个数和下降指标的个数一致的省份不多，但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其中几个省份的上升指标数量和下降指标数量比较接近，但都是排位保持不变的指标个数最多，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天津市、浙江省、山东省和西藏自治区，排位保持不变的指标个数都非常大，所以其排位比较稳定。在综合排位下降的六个省份中，有四个省份的下降指标个数大于上升指标个数，特别是排位下降比较明显的青海省，下降指标个数超出上升指标个数比较多。因此，要保持省域的经济综合竞争优势，提高其综合排位，就需要维持各指标的竞争优势，力促有优势的指标排位不断上升，避免或减少劣势指标排位下降，才能系统而有效地促进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整体水平的不断提升。

(下转第 112 页)

世界经济发展新动力与 中国国企改革改革

李保民 李恒世

摘要：世界正处在历史性巨大变革之中，其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国际市场、全球产业、跨国公司和资源要素配置仍然发挥着导向性的基本推动作用。以战略的眼光研判经济全球化的总体形势，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中国企业加快改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施功能分类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实现国际国内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世界经济 改革动力 生产要素 国有企业 改制改革

作者简介：李保民，国务院国资委专职监事、经济学博士；

李恒世，大连市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教育培训中心教育长。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当今世界正处在历史性巨大变革之中，其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深入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情况、新特点，并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不断加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多，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基本趋势没有发生改变，对世界经济、国际市场、全球产业、跨国公司和资源要素配置仍然发挥着导向性的基础作用。以战略的眼光研判经济全球化的总体形势，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把握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是中国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基本任务。

（一）世界经济大变化的创新动力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处于动荡和不确定状态，复苏步伐依然缓慢和沉重，在短中期内继续呈低迷状态，面临的变化和风险也在不断增多。

第一，从变化特征上看，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发达国家复苏步伐沉重，增速低迷；新兴经济体增速普遍放缓；国际贸易增速明显下滑，争端频发；大宗商品价格呈戏剧性波动；发达经济体进一步释放流动性，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在错综复杂、充满变数的环境下，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将成为新常态，但对经济复苏的渴望、抓住机遇的期盼、积极应对风险的挑战，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第二，从治理格局上看，全球治理格局出现新变化，新兴经济体抓住全球化机遇，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近 20 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一直超过发达经济体。2011 年新兴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首次超越发达经济体。在此大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随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出现新变革的重要契机。自匹兹堡峰会以后，二十国集团（G20）已经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协调和合作的首要平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开始增加，未来势必发挥更大影响力，并成为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力量。

第三，从经济联系上看，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相互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加深、依赖性增强，区域集团化加速发展。现在有 146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 35 个区域性经济集团，这些区域经济集团不仅能够加快内部的商品和资本流动，促使共同大市场正在形成，而且还能够不断提高其外部的开放程度。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的规模日益扩大，现代管理和先进技术广泛传播，国际资本和信息互联网等资源要素跨界流动的障碍大大消除。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影响了相关国家的社会稳定，一些国家的通货膨胀、人员失业、社会保障和两极分化加剧等问题相互叠加，可能导致政局不稳，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风险的触发点增多，都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难以预料的冲击。深层次结构矛盾的调整，尽快消除全球经济复苏回升的羁绊，都要求各国加强经济联系。

（二）国际市场大动荡的重构动力

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国际市场的一体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融合不断加速，经贸活动异常复杂与活跃，国际市场的竞争格局正在重构。

第一，全球贸易总量扩张与贸易自由化范围不断扩大。本世纪以来，国际贸易量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贸易的范围和品种不断增加，由传统的商品领域不断向服务贸易领域拓展，服务贸易的扩张速度高于贸易总量的增长速度。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全球贸易总量增速从高位有所回落，欧美等传统进口大国的进口增速开始减缓。未来五年，国际贸易年均增速将逐步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将恢复到 5% 左右的增长水平。

第二，国际分工更加精细明确。国际市场中，各国基于比较优势所进行的全球分工协作体系正在形成，资源要素分工逐步居主导地位。发达国家拥有的资本、技术和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稀缺性，在国际分工中掌握着主动，具有主导和引领的地位。发展中国家拥有的自然资源、劳动等要素，对外来的资本、技术和信息以及经营、管理等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在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被动地位。

（三）全球产业大调整的融合动力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过度的产业转移造成了巨大的经济风险，产业空心化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各国在着手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加快了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重新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加紧在新兴科技领域进行前瞻布局，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全球产业的大调整孕育着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的新突破。

第一，实体经济的战略地位越来越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在反思发展模式，纷纷回归实体经济，不约而同地重振制造业，通过产业升级化解高成本压力，实体经济再次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美国 2010 年国情咨文提出，美国经济必须实现向实体经济的回归，从而增强美国的竞争力。为此，美国已经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欧盟国家也明确提出了“未来工厂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调整产业结构，防止产业空心化，大力发展制造业。

第二，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发达国家产业在趋向实业化的同时，纷纷加快对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布局，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积极推进新一代信息网络、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海洋开发和新能源、新材料等的发展，并加速其成长。即使在金融危机重灾之年的 2009 年，全球风机装机容量、光伏总装机容量、太阳能电池总产量较上年同比增长率也分别达到 31.7%、44% 和 49%。到 2012 年底，已经有约 200 万辆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车上路。新兴产业已日益成为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成为各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第三，产业转移的形式越来越多。伴随着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新兴产业的崛起，产业在国际间的转移也将再现新高潮，产业转移的能力不断提升。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应用使传统工业生产方式向集工业化、信息化于一体的现代生产方式转化，加速了各国产业升级的步伐，明显缩短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周期。国际产业转移进入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研究能力转移并存的新阶段。

（四）跨国公司大扩张的发展动力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和推动力，凭借全球市场实现了空前的大扩张，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导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商业模式的新变革。第一，生产的全球化。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进行生产，形成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网络化体系，向全世界提供商品和服务。以世界 500 强为首的跨国公司都相继在国外建厂，向世界各国出口商品和提供服务。第二，投资的全球化。全世界 70% 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跨国公司进行的，跨国公司“富可敌国”，美国标准普尔指数所涵盖的 500 家公司拥有的现金已超过 1.3 万亿美元，强大的资金实力是导致近年来全球投资并购活动强劲的关键因素。第三，研发的全球化。在全球战略的总体框架下，跨国公司的科技研发也逐渐趋于全球化，不仅把更多的研发活动转移到国外，而且把一部分核心创新项目放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表现是，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的比重逐渐上升，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在东道国研发体系中的作用逐渐上升；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东道国。第四，公司治理影响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逐渐扩展到全世界，主要表现在公司战略、组织架构、商业模式、风险管控和人力资源等治理影响的全球化。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各国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甚至将触角伸及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五）资源要素大流动的优化动力

经济全球化归根结底是资源要素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资源要素大流动预示着经济发展的新跨越。第一，要素范围的迅速拓宽。从传统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等低级要素拓宽到技术、专利、信息、人才、经营、管理和品牌等各类资源的高级要素，要素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呈现拓展之势。第二，要素流动不断加速。高新科技和信息网络推动各种要素在全球呈现高流动性和开放性，要素快速跨界流动的结果表现为高度的渗透性和互补性。物流、人才流、信息流、资本流和知识流的时空约束减少、成本降低及资源互补。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信息、管理、经营和文化等迅速向发展中国家渗透，使世界经济呈现出一体化特征。第三，集聚效应日益明显。要素集聚是要素在全球范围实现优化配置的具体体现。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要求，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和开放的市场成为要素国际流动和集聚的有效载体。同时，要素的国际流动呈现出结构性的偏向，表现为资本、技术、专利、管理和人才类要素极易流动，而一般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类要素的流动不充分甚至

基本不能流动，由此导致要素流动主要表现为高级要素拥有国家的要素向某些低级要素拥有国家流动。

总之，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渴望、国际市场动荡趋好的本能、全球产业调整变革的趋势、跨国公司扩张增长的期盼、资源要素丰富多样的流动配置，都蕴育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二、世界经济深入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未来五年，世界经济从总体上看，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并且机遇大于挑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一个机遇大于挑战的历史时期。中国应该牢牢抓住世界经济格局变革的难得机遇，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大力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充分利用各种国际机制和规则，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同时，要密切关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风险与挑战。

（一）世界经济震荡缓行趋势，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

世界经济由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带动的一轮经济周期已进入尾声，新一轮科技革命尚在孕育突破之中，可持续的新增长动力还没有形成，这对中国扩大投资、增加出口、提升消费都有巨大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出现新变革，对我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增加经济往来中的话语权、使经济决策权更加平等和均衡、共同改善全球治理格局，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新兴经济体有着保持旺盛发展势头的共同诉求，其发展方式脱离了原来受制于发达经济体的传统方式，进入了快速推进工业化的阶段，对工业设备、基础设施产生了巨大需求，为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设备的出口提供了重要市场，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二）国际市场动荡加剧，影响中国融入国际市场

国际市场的动荡变革为中国拓展国际市场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从项目承包、国际贸易、劳务输出和加工装配到资源开发、网络物流、科研合作，中国对外投资领域不断拓宽，金融危机更是为中国企业收购国外优质企业和知名品牌、开展能源资源领域合作开发、加快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中国企业投资设立的境外企业超过 1.5 万家，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一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的动荡变化加剧了中国经济外需空间的严重萎缩，突出了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当前，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据统计，金融危机以来有 20 多个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提高了关

税。一些发达国家采取限制出口、阻止入境投资等办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已从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和特殊措施、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转入针对国内产业政策、本币汇率、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国有经济部门等国内政策方面的交锋和较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欧借用“竞争中立性”等政策，极力推动“碳交易”“碳关税”等全球贸易规则和技术标准，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遏制，并加紧将这些遏制手段上升为国际规则，这给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将变得更加严峻。

（三）全球产业调整加速，影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结果。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未来五年中国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面临的重大挑战和任务。一是经过 30 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产业前沿与世界产业前沿已大幅度接近，通过购买先进技术实现国内产业升级的做法已经出现了困难。发达国家通过提高技术壁垒和技术垄断来控制市场，遏制中国企业在高端产品上的自主创新，这使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来源和引进出现重大困难与挑战。二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发育成熟，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由于国内要素成本大幅度上升而受到很大削弱，进一步拓展的余地已十分有限；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规模很大，但总体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主要依靠低生产成本优势进行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生产能力存在严重过剩，也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三是高新技术产业基本处于跟随发达国家和世界先进企业的阶段，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应用开发尚可而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还不具备全面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未来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挑战。

实体经济的回归和新兴产业的兴起，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一直是中国的坚实基础，有完整的配套体系，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这是未来参与全球分工和全球竞争新的比较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分工尚未完全明朗，技术路线不成熟使得行业创新模式仍有很大不确定性，行业主导企业的能力和地位并不稳定。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新兴产业的差距相对较小，站在相近的起跑线上，给中国的新兴产业带来了赶超的机遇。

（四）跨国公司迅速扩张，影响中国企业变革创新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大企业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推动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主要力量。跨国公司迅速扩张并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必须正视的既成事实，客观上会对中国相关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产生挤压效应。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若让跨国公司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将面临极大的经

济、社会和政治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在重创了一些跨国公司的同时，也为一些优秀跨国公司的扩张提供了机会，使之在危机后变得更为强大，这对中国企业形成了更大的压力和挑战。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外资企业的各种政策需要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

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为中国企业界做强做优一批跨国公司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企业与大多数跨国公司存在互补性，与跨国公司开展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广阔空间，可以带来投资、技术、公司治理、现代商业模式等生产要素和先进理念，促进中国企业变革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必须拥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依托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有效配置资源，打破国外跨国公司对相关市场的控制，并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与之抗衡。努力做强做优中国企业，培育中国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应当成为一项重要国策。

（五）资源要素流动加快，影响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创新

经济全球化下要素的流动加快，价格传导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更为流畅，使得资源的稀缺性更为突出，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这就促使企业技术创新与治理变革，在更高水平与层次上继续吸收国际先进技术与知识，加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全球化使要素的创造机制和分配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以资本要素为中心转向以知识要素为主。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和影响力，要更多地拥有知识性要素，不断提高优化配置和应用水平。中国处于全球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战略机遇期，在引进资金和产品的同时，要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优秀人才和企业文化，站在全球的高度对资源要素进行优化配置。

三、中国国有企业改制改革

中国国有企业通过不断地改制改革，其体制机制、经营管理能力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今天的国有企业是在自身凤凰涅槃中建立的“新国企”。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推行规范改制和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大多数国有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改制覆盖面超过 90%，中央企业改制覆盖面达到 72.3%，实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企业有 43 家，中央企业控股境内外上市公司已达 373 家，资产总额的 54%、净资产的 69%、营业收入的 60%集中在上市公司。企业普遍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全员竞争上岗和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工资制度，初步建立了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新机制。2013 年 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新形势，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2014 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启之年，2015 年中国必将掀起新一轮的国企国资改革高潮，在世界经济变革发展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国企国资改制改革之路。

（一）以改革产权制度为基础，加快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制改革的“重头戏”，产权多元化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抓手，这也是国务院国资委 2014 年 7 月 15 日启动的四项改革试点之一。总体要求是，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大部分国有企业通过产权多元化改革，逐步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利于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变化。梳理现有政策和各地实际经验，可侧重从以下八个方面进一步探索产权多元化。

第一，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和吸引非国有产权主体。《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再次重申：“鼓励非公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从放宽投资领域、拓展融资渠道、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等方面，“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放宽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其中的自然垄断业务，积极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非公有资本可以参股等方式进入；对其它业务，非国有资本可以独资、合资、合作、项目融资等方式进入”。从政策到方针，再到制度，都要保护“产权和合法利益，平等使用生产要素”。非国有企业迅速崛起，外商投资企业则在抢滩中国市场中快速发展，且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对象。

第二，鼓励对外投资和利用外商外资。《决定》深刻指出：“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鼓励中小企业根据国家利用外资政策，引

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创办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允许外商外资以直接投资方式并购境内企业的股权或资产。

第三，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主要指各类基金、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机构、经纪公司和证券公司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转股权后，即成为企业的股东，对企业持股或控股，派员参加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参与企业重大决策，但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继续大力发展证券投资基金。支持保险资金以多种方式直接投资资本市场，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基金、企业补充养老基金、商业保险资金等投入资本市场的资金比例。要培养一批诚信、守法、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使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为主的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

第四，支持和鼓励个人投资入股。《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努力实现“劳者有其产，工者有其股”，做到联股联利又联心。在企业改革发展中规范劳动合作加资本合作，探索按劳取酬加按资分配的薪酬机制。

第五，激励和帮助经营管理者投资入股，并持有大股东。允许国有和集体性质的高新技术企业吸收本单位的业务骨干参股，以增强企业凝聚力；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造时，允许业务骨干作为公司发起人。

第六，建立和完善职工持股会。职工持股会是专门从事企业内部职工持股资金管理，认购公司股份，行使股东义务，维护出资职工合法权益的组织。会员以出资额为限，对持股会承担责任。职工持股会的资金不能进行本企业以外的其他投资活动。

第七，改进和推动生产要素作价入股。十八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充满激情地号召：“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是实践的迫切要求，要尽快明确无形资产，包括知识、专利、技术、信息和经营、管理等要素作价入股的政策指引，关键是从产权制度上形成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肯定特殊的脑力劳动或复杂劳动在生产要素中的作用和体现。

第八，鼓励和促进公有产权之间互相参股入股，交叉持股。目前的现状是受限较多。如《公司法》规定，公司向其它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 50%，根本不能满足重组并购中庞大的资金需要，公司难以实现低成本扩张。又如，《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得直接投资于企业，且银行以贷款的稳健与安全为首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

总之，产权多元化是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制度保障，也是与社会资本、国际资本、金融资本相结合的内在要求，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础和抓手。

（二）以分类改革为前提，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积极探索国有资本运营主体

国际市场动荡变化的特点之一是国际分工更加精细明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企业分类指南，也是一个明确的企业改革导向。按照“公益类与盈利类、垄断性与竞争性”分类的基本前提，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除组建运营公司、改组投资公司外，结合多年国有资本运营主体探索的实践，还要发展集团公司、设立控股公司、建立综合类公司。在这五种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各类经营主体的主营业务。这样有利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加快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国家综合实力。

第一，提升重点产业集中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境外并购和投资合作，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联合和整合，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打造可以控制价值链高端的“系统集成者”，形成行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增强重要领域的话语权。第二，推动产业技术进步。通过自主创新和二次创新，提升核心技术控制能力，尽快摆脱对引进技术的依赖，实现从“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加强国家和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建设，瞄准引领行业发展的前沿技术、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引领和带动行业发展。第三，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使现有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条向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两端延伸，提高产品附加值，打造自主品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优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质量和结构，把研发基地建设、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高技术服务外包等作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鼓励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第四，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力量，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突破并掌握一批核心技术，率先实现规模化生产，逐步实现产业化并尽快使其发展成为主导型、支柱型产业，占领未来发展的制高点。第五，提升利用外资水平。立足提升技术能力、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适当提高成熟产业的开放度，引导外资进入亟需发展的薄弱环节。优化利用外资的结构，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第六，提升对外投资效率。对外投资要从追求短期盈利向长期发展和提高核心竞争力转变。鼓励国内企业投资收购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企业，获取核心技术、营销网络、品牌等资源。支持国

内技术成熟、国际市场需求大的行业向境外转移部分生产能力，推动国内中小企业集群式“走出去”。鼓励实力强、资本雄厚的大型企业开展成套工程项目承包、跨国并购、绿地投资和知识产权国际申请注册，建立境外营销网络和区域营销中心。通过对外投资，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整合和价值链整合，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三）以调整经济结构为抓手，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加快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抓住全球产业大调整的机遇，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与结构，是国有企业改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以做强做优为核心目标，国家出资的企业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的改革，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两国两重一新一特”是推进国家出资企业改革发展的前提。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国有资产出资人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努力做到权力、责任和义务相统一。

结构调整是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开放、实现稳定很好结合起来的结合点。中国产业升级主要靠引进技术来实现，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 50%，而美日仅为 5%。尤其是关键技术的自给率低，中国一些领域的关键技术、大型成套设备、核心元器件、重要基础件、关键新材料等主要依靠引进，产业发展严重受制于人。中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造成巨大的财富流失，更使中国产业升级失去了主动权和主导权。近年来，中国外资企业独资控股的倾向明显，大力收购中国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外资企业凭借规模、资金和技术优势，再加上优惠政策，对中国一些行业已形成产业控制，这种态势对中国相关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压力和紧迫感。因此，中国必须加快以转型升级为标志的结构调整，这主要有两个关键方面。

第一，以新兴产业为突破口，整合企业内外部科技资源，全力强化自主创新，加快实施赶超战略。现阶段，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着重处理好各种关系，切实做好相关工作。一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关系。要从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实际出发，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和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相结合。二是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关系。既要着力推进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又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加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共同创造和分享国际创新成果。三是整体推进与重点领域跨越发展的关系。要合理规划、统筹协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选择最有基础和条件的领域作为突破口，重点推进，形成新的增长点，大力培育产业集群，促进优势区域率先发展。四是加快推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要重点发展智能

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性制造，做大做强航空装备和卫星及应用产业，提升轨道交通装备水平，加快培育发展海洋工程装备。把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现我国装备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五是企业最应注意的是技术风险。目前的新兴产业均处于产业的形成期，各种技术路线都在探索当中，许多领域最大的特点是技术的不确定性与不够成熟。因此，企业应尽量规避新兴产业成长中的巨大风险。

第二，以跨国企业为载体，优化国际国内市场资源配置，打造现代商业模式，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加大培育大型跨国企业的政策支持，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一是支持行业优势企业跨国、跨地区联合重组，对企业之间以及集团内部的资产或产权无偿划转事项豁免缴纳所得税。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实施产融结合，对企业集团实施合并纳税政策，引导、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鼓励合作建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和壮大自主品牌。二是提高整合全球资源能力。树立立足全球配置各类资源的理念，创新国际化经营方式方法，实现在全球最适合的地方开展运营。三是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引导和支持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建立以企业中央研究院为核心的研发体系，加强全球范围内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支持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或通过跨国并购取得技术，实现企业在全世界利用和配置科技创新资源。四是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董事会建设，创新适应国际化经营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完善重大决策、投资、并购、财务、购销、金融衍生业务等高风险领域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和完善全面风险管理控制体系和长效机制，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五是鼓励跨国公司在华增加研发投入，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发展国内配套企业，推动我国从全球加工制造基地向研发、制造和服务基地转变。

（四）以董事会制度建设为核心，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大力提升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

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这必然会带来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主要体现为具有雄厚实力的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因此，作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国有企业成为跨国公司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对象。为获取有利竞争地位，国有企业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竞争新环境。

建立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跨国公司大扩张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影响力，二是以科技为前提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国有企业通过董事会试点，实现产权多元化，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深化三项制度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中国企业改制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按照现代企业的治理要求，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权责，完善企业领导人员的聘任制度，积极探索党管人才与出资人选择管理者的新路子，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机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

目前，中国仍然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国际化经营水平不高。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的经济规模和整体实力明显提升，2014 年已有 100 家企业进入了世界 500 强，其中 84 家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但从整体上看，中国企业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同跨国公司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大而不强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跨越。

（五）以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为突破口，深化企业劳动用工、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国际国内要素资源高效配置

2014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实际上就是以企业收入分配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全面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就是要让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最深层的源泉和内在动力，也是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企业改革发展的良好环境。以促进资源要素顺畅流转为关键，进一步健全市场体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基础。

面对世界经济的飞速变革发展，中国国有企业改制改革不仅仅是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开放领域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政策法规更加规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要建立现代政府。一是完善对外资的管理和规制，建立严格完整和公开透明的审批程序。完善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建立产业安全保护机制。改革“走出去”审批体制，建立统一的海外投资审批管理体系，进一步简化海外投资的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赋予企业更灵活的投资决策权。二是完善金融和外汇监管制度，放宽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额度限制和外汇管制，拓展企业融资渠道，增强境外投资金融支持。建立境

外资源能源开发专项风险基金，支持企业境外资源能源勘探和可行性研究，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政治风险和非商业性风险保障。三是完善对外开放的机制保障，进一步改善进出口管理、通关便利化、外汇管理等贸易环境，加强对重点出口市场的跟踪监测，及时发布进出口数据和监测预警信息，不断丰富和发展外汇市场产品，为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提供更多市场工具。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在绿色环保、节能减排、标准互认、社会责任等方面，加强与国际组织和相关机构的合作，推动中国行业标准体系与国际接轨，扩大在国际标准化领域的话语权。四是建立和完善企业“走出去”的信息服务平台，健全海外经营联动协调机制，加强对国际化经营的咨询、评估、法律援助等服务。扩大和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推动建立全球与区域合作的新机制，积极开展多边、双边政府间对话及行业交流活动，加强与贸易相关方的沟通理解，减少企业间的贸易摩擦。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国企改革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世界经济寻求新动力的历史转折点上，要有全新的考虑和规划，增强对国企改革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之路，努力做强做优，创造世界一流。

责任编辑：李 蕊

(上接第 98 页)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2.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 年。
3.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 年。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年版。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 年版。
6. 李建平等：《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13－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7. 李建平等：《“十二五”中期中国省域环境竞争力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责任编辑：黄启云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共同宣言

北京 · 2015

2015年6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举办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在中国北京举行。这是一次全球智库思想和智慧激荡的盛会，来自世界各地智库代表、专家、学者和前政府高官等参加了本届峰会，体现了全球智库峰会“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宗旨。

本届峰会以“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年后新路径”为主题，围绕八个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分析了近年来全球经济状况和其后的发展趋势，对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内容提出了建议。会议着重探讨了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提出全球治理需要解决的共同性问题和增进全球治理有效性的思路。我们相信，本次峰会深化了认识，扩大了共识，取得了积极成果。

我们认为，联合国在世纪之交所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减贫、普及小学教育、促进性别平等、饮用水安全、降低儿童死亡率等主要目标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全球解决发展不平衡、大量贫困人口基本生存等问题的任务依然很重，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解决众多全球性挑战的基础。全球应继续聚焦最贫困人口，将减贫作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点。应通过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科技水平、加强教育与技能培训、发展面向贫困群体的小微金融服务等措施，以及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等比较优势和发挥民众积极性、动员社会各方力量、采用多种有利于民众参与的方式，更有效解决减贫问题。同时，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应努力实现性别平等，注重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

我们关注，全球经济发展对气候和环境的影响在不断增强，要注重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气候环境的关系，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减排温室气体、环境保护，还是经济转型，都应当在推动发展、实现减贫的基础上进行。应探寻新的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发

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实现绿色增长；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互联网+”等措施，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些必将为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各国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调整优化产业与能源结构、加强技术合作和转让等途径，提高节能减排水平，保护好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气候，同时推动发展，为各国人民谋求福祉。

我们注意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复杂变化和深刻调整，我们探讨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对治理全球性问题和危机的措施进行了反思，对其效果进行了分析，这将对化解和预防金融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我们认为，全球治理还存在着效率不够高、协调性不够强、规则不够合理等问题，应继续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更好地发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和 G20 等全球治理平台在危机治理、全球共同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解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更好地形成国际机构、各国政府、企业界和社会力量共同努力、协调合作的机制。更尊重各国的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建立更加平等均衡、合作共赢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我们意识到，智库在解决和处理全球事务中的作用还有待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共同性重大挑战增多。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包容互鉴的大环境下，各国智库在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区域和平发展环境、引导国际舆论、集聚人类智慧等方面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同时，各国政府间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的趋势，要求智库间的合作与交流必须相应得到加强。我们希望，各国智库能够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提升自身能力，加强与政府、公众和媒体的互动，并加强多种方式的智库交流合作，相互借鉴，不断创新，共同发展。

我们相信，全球智库峰会这一平台，有助于智库之间加强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分享研究成果，增强智库对政策的影响力，共同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加快期刊评价体系改革 促进中国智库刊物发展

——智库期刊评价体系研讨会综述

沈家文

摘要：智库刊物是智库进行合作交流和广泛整合学术资源的重要平台，为智库建设、健全决策机制提供重要支撑，中国智库正处于大有作为、规范发展阶段，亟待充分发挥智库刊物的关键作用。中国智库期刊面临很多制约因素，直接影响智库期刊的办刊方向、生存发展以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影响力、竞争力，事关新型智库服务决策能力建设的大局。应加快改革现行的核心期刊评价标准，设立市场信誉度高、专业化的第三方评价认证机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期刊评价体系。

关键词：智库期刊 核心期刊 评价体系 改革

作者简介：沈家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全球化》编辑部主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智库刊物作为传播智库思想、学术观点、理论创新的主要载体，面临重大发展机遇。最近，《全球化》编辑部组织了《国际贸易》《金融论坛》《国际金融研究》《红旗文稿》《科技日报》及零点调查公司等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围绕如何办好智库期刊及其评价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亟待充分发挥智库刊物在引领新型智库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一，智库刊物是智库进行合作交流和广泛整合学术资源的重要平台，为智库建设、

健全决策机制提供重要支撑，中国智库正处于大有作为、规范发展阶段，亟待充分发挥智库刊物的关键作用。《全球化》副总编王晓红认为，智库刊物是智库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研究成果的平台，是推广智库品牌的重要窗口，具有权威性、高端性、专业性、理论性和应用性等特点，智库刊物对于智库建设的意义重大。《国际贸易》总编钱建初认为，中央提出要办好 50~100 家智库的目标，这是智库及智库刊物发展的好机会。《红旗文稿》副总编吴强认为，在“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智库刊物具有特殊使命、任务与角色，应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突出的贡献。

第二，智库刊物能够融合传播的社会属性和政府属性，在为政府决策咨询服务中兼顾受众的专业性、广泛性，可以更好地突出研究内容的容量和深度。吴强认为，智库及智库刊物立足为政府政策和企业决策服务，社会公益性决定了智库刊物立足社会需求，不能片面追求商业化。王晓红认为，智库刊物面向政府、咨询机构、科研单位、高校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主要特点在于其刊物内容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于对政府部门的决策影响力、对业内专家的学术影响力以及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第三，智库刊物的使命和生命力在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问题提出真知灼见。从全球视角看，各国主要智库大多拥有定期出版的智库刊物，比如美国外交委员会所属的《外交季刊》在国际事务方面具有独特的巨大影响力。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央提出“重点建设 50 至 100 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智库期刊通过刊发战略性、前瞻性、导向性、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将在引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智库期刊发展面临现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制约

中国智库期刊面临很多制约因素，加快改革现行学术期刊评价标准，完善智库刊物评价体系建设，“深化智库研究成果的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改革”，对于促进智库刊物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第一，现行核心期刊评价体系的导向不合理，直接影响智库刊物的正确定位与发展方向，甚至影响智库期刊的生存。目前，国内期刊评价机构通过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国内 6000 余种学术期刊进行评价，但在来源期刊选择、指标权重、评价流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钱建初认为，智库刊物主要侧重政策研究，主要目的是为决策服务，定位及考量标准都与单纯学术型期刊有所区别。王晓红认为，智库刊物具有较强的公益性特征，主要服务国家战略，为政府制定政策和企业决策服务，兼融应用性和学术性，不能简单照搬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和体系。《科技日报》记者张晶认为，目前核心

期刊评价指标体系对刊物发展方向起着非常大的引导作用，非核心期刊的稿源数量和质量直接受其影响，智库刊物的定位以至生存发展受其影响。

第二，现行核心期刊评价体系的指标选取不尽合理，不利于智库期刊的健康发展。目前国内几大核心期刊评价体系，由于评价选择的指标和权重差异、来源期刊选择领域不一，评选出的核心期刊目录差异较大，导致学术期刊评价出现混乱现象。王晓红认为，现有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不合理，严重影响期刊办刊的积极性、刊物来稿质量，论文作者出于职称考评等原因很少投稿给非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自然来稿的数量和质量不理想。吴强认为，智库刊物的文稿内容不能过于学术化，语言要注重通俗、平和，强调论文的观点明确、操作性强，但按现有期刊评价体系难以进入核心期刊目录，这种情况不合理。张晶认为，目前的期刊评价标准不尽合理，偏向学术型评价体系，多是依据学术论文的引用率，对于非学术期刊和媒体类刊物不公平。《国际金融研究》副主编李楠认为，学术刊物与理论刊物的服务对象不同，理论刊物是将有关研究成果直接拿来应用，学术刊物与理论刊物的不同在于有关研究成果所处的理论应用阶段不同，但现有的评价体系有利于学术类期刊，不利于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期刊。

第三，现行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关于论文社会应用价值导向的指标欠缺，过于偏重论文的引用率、转载率、影响因子等指标。《金融论坛》总编殷红认为，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不应该只考虑引用率，还应考虑论文的社会应用情况，因为应用性研究刊物主要服务于政府政策与企业决策，更加看重论文的实际应用价值。钱建初认为，智库期刊应建立一套不同于学术刊物的评价标准，不能只考虑引用率，应考虑论文被政府、企业采纳的情况，这些都与论文质量和期刊水准有关。王晓红认为，现在的期刊评价体系规定核心期刊考核为创办3~5年以上的期刊，导致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的市场竞争不公平，对于新刊物的发展环境非常不利。

三、加快改革中国期刊评价体系的对策建议

智库期刊是智库与社会公众之间、智库与政府之间、智库研究人员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平台。加快改革中国期刊评价体系，完善智库期刊评价标准，不仅直接影响智库期刊的办刊方向、生存发展以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影响力、竞争力，而且事关新型智库服务决策能力建设的大局。

第一，改革目前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对期刊进行分类评价，将智库期刊作为专门的期刊类别纳入期刊评价体系。2015年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完善以质量创新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办

法，构建用户评价、同行评价、社会评价相结合的指标体系”。智库刊物不同于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纯学术刊物，需要将政策采用率等指标纳入核心期刊评价体系。钱建初认为，智库期刊应立足于为政府政策和企业决策服务，要为外界非专业人士看懂，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应用价值，形成一个“价值”与“凝聚研究力量”的平台和媒介。《全球化》编辑部主任沈家文建议，明确智库刊物的定义和内涵，将智库刊物加入期刊分类体系，在现行核心期刊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增加关于智库期刊的评价标准，比如“政策采用率”“社会影响力”等智库评价指标。

第二，设立国家期刊统一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新型智库期刊评价体系，引导智库刊物的办刊方向。吴强认为，改进期刊评价体系的思路有两种：一是在原有的期刊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进行改进，将其他期刊的特点和要求纳入评价体系，增加对非学术期刊的评价指标；二是建立新的期刊评价体系。李楠认为，新的评价体系应关注非学术类期刊的应用性理论研究，不应倾向于用学术理论研究的评价标准来评价理论应用研究期刊。殷红认为，新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考虑论文已获奖项与被政府、企业采纳的情况。张晶认为，通过运用大数据来统计转载率、应用与采用情况，进行更合理的评价。钱建初认为，在期刊评价指标设计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兰德公司的评价标准，以刊物论文是否符合社会发展与政府发展需求作为应用型研究论文的应用功能评价指标。

第三，建立市场信誉度高、专业化的第三方评价认证机构，负责智库期刊评价指标的数据采集和评价等工作。借鉴国际一流智库的评价标准，进行问卷调查、定量分析，结合数字化新媒体的发展动态等，研究智库期刊评价标准。钱建初认为，新的期刊评价体系指标应由期刊行业内集体讨论确定，由独立第三方的市场化公司集中市场、官方、专家的多方意见完成，形成新的期刊评价体系，保证新评价体系更独立、更有说服力、更客观公正科学。零点调查公司总经理范文提出，可研究国际上期刊分类标准与评价指标体系，广泛听取报纸、杂志等媒体的意见，通过问卷调查摸清社会对期刊的需求与评价标准。王晓红提出，建议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社科规划办等部门牵头，建立全国统一的、真实科学地反映中国人文社科期刊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形成国家层面的统一期刊评价指标体系、行业征信体系、专家评审体系，同时，制定优秀期刊奖励和资助制度及违规期刊处罚制度、建立期刊评价机构的监督机制、实行一年一评的动态透明考核办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期刊评价体系。

责任编辑：李 蕊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5年5月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全球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英国经济智库——全国经济与社会研究所5月6日发布最新全球经济预测报告，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2月预测的3.3%下调至3.2%，但将明年全球经济增长速由此前预测的3.6%上调至3.8%。报告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后遗症仍然拖累全球经济复苏，如高失业率、高债务水平、脆弱的银行业系统和其他结构性问题等。今年以来全球经济表现低于预期，特别是美国、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

报告将美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由2月预测的3.2%下调至2.8%，受严寒天气、出口下滑等因素影响，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折年率增长0.2%^①，较去年第四季度的2.2%大幅放缓，但预计明年美国经济增长速或将升至2.9%。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被下调为6.8%和6.7%，比此前的预测值均调降0.2个百分点。该机构研究员亚纳·利亚泽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低于我们此前的预期，这是此次下调的主要原因”。欧元区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被上调为1.5%和2.2%，较此前预测值各上调0.1个和0.3个百分点，鉴于欧元区通缩风险降低，欧元贬值、低油价将刺激市场需求，该区域经济增长前景得到改善。此外，英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也被下调，由此前的2.9%下调至2.5%，今年第一季度英国

^①此为美国商务部首次发布数据，第一次修订值被下调至下降0.7%。

经济同样遭遇寒流，不过这将是暂时性的，受消费者支出增加以及油价下降带来的积极效应推动，预计英国经济将会反弹。

（二）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IFO）5 月 12 日发布的最新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第二季度世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为 99.5，比第一季度上升 3.5 点，显示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其中欧洲宏观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特别是中欧和东欧地区。亚洲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也重新回到平均值水平，北美经济指数虽然下降了 10 点，但仍高于其长期平均值。IFO 经济学家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 2.3%，其中欧洲经济增长 1.7%，美国经济增长 2.7%，亚洲经济增长 3.6%。

（三）全球经济以温和速度缓慢增长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5 月 19 日发布的《2015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将继续以温和速度缓慢增长，预计在 2015 年下半年和 2016 年得到逐步改善。该部发展政策及研究司司长洪平凡在发布会上指出，修正后的数据显示，2015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从 2014 年的 2.6% 小幅上升至 2.8%，比 2014 年底发布的数据下调了 0.3 个百分点；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微调至 3.1%，主要反映出拉美及俄罗斯等较大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恶化，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还有其他一些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使得这些石油出口和初级产品出口国家经济面临的负面影响比原来预料的要大。洪平凡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特点是五低两高：低增长、低贸易流动、低通货膨胀率、低投资和低利率，以及高股价和高债务水平。因此，多数商品出口经济体短期增长前景有所降级，而大宗商品进口国将因为更低的价格而获益，通货膨胀及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将有所减少。

报告指出，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增长势头在 2015 年将继续回升，平均增长率从 2014 年的 1.6% 上调至 2.2%。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计将回落 2 个百分点。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 4.4%，比危机前水平大约低 3 个百分点。东亚地区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预计今明两年经济将维持在 6% 的水平。报告还呼吁各国继续加大刺激投资的政策，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并同时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全球经济依然存在严重的下行风险，这主要是因为即将到来的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欧元区持续的不稳定、地缘政治冲突的潜在溢出效应以及新兴经济体经济存在的问题。上述风险因素彼此相互关联且可以形成合力，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弱于预期。

（四）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疲软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6月3日在其最新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异常疲软，未来18个月全球经济复苏将缓慢增强，2016年底全球经济增长仅能接近危机前水平。即便全球各经济体第一季度经济表现欠佳只是暂时的，但未来形势并非十分乐观。OECD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表示，目前全球经济表现勉强达到“B-”水平。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下调到3.1%，明年预测将达到3.8%，分别比3月的预测值下调0.5个和0.1个百分点。其中，美国经济今年预计增长2%，大幅下调0.9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预期则有所上调，预计今年会有1.4%的增长，明年有望增长2.1%；日本经济今年增长预计不到1%；印度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7.1%和7.4%；巴西和俄罗斯则将出现经济萎缩，今年将分别出现0.8%和3.1%的负增长，不过明年可能实现正增长。最近，许多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了全球需求，发达国家就业市场正在逐渐升温，通缩风险正在消退，同时，油价处于低位、货币政策处于宽松状态等因素会为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带来加速动力。

报告将投资作为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指出劳动生产率增长令人失望。许多经济体脆弱的投资正在拖累消费增长、就业岗位增加和工资水平提高，并且侵蚀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前景。为了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必须增加资本开支。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通过投资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同时，还要更多关注低薪资水平工人，并且处理好日益增长的贫富不均，这些长期来看都会影响经济增长。OECD秘书长古利亚表示，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仍会增强，但复苏步伐依然疲弱。未能实现强劲的可持续增长造成就业缺失，一些新兴经济体活力不足，全球的不公平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了使经济表现从“B-”转向“A”，需要增加投资以创造就业和刺激消费。这意味着，需要实施结构性政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鼓励市场竞争，减少政策不确定性。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中国不会爆发金融危机

原美联储主席伯南克6月2日在中国香港出席活动时表示，他对于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中国不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目前其银行体系存在的问题，也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和解决问题，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及庞大的财政资源。

伯南克认为，中国经济目前虽然面临着银行业坏账、影子银行、房地产等一系列问题，但最主要的问题应该是在未来十年内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而中国政府已经展示出他们处理这种难题的能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化、基建、

出口，随着经济规模到达某一水平，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持续，必须转向内需和消费拉动型经济结构。随着中国经济整体规模不断扩大，不可能一直保持 10% 左右的增长率，经济放缓不可避免。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经济放缓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由于货币财政政策导致的经济减速，它是由于中国改变增长模式所致，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在新的增长模式下，中国政府需要做的是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即通过建立良好的制度架构来鼓励民营经济。而现在，中国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当下的发展还仅仅是开头。

对于市场担忧中国金融改革进展略显保守，伯南克表示，过去十多年的经验和教训显示，金融改革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如果过于激进或者顺序错误的话，可能会引发各种问题，严重的如上世纪 90 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因此，中国政府在金融改革上采取相对谨慎、逐步推进的做法是可取的。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应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及养老保障，令人们有更强的消费动力。环保议题也值得关注，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会要求有更干净的水和空气。

（二）2015 年中国 GDP 增长 7%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目前中国经济状况是一个“昨日重现”的过程。“昨日重现”被称为典型的政治刺激型（CRIC）周期，指经济出现危机，政策开始反应，经济状况出现提升，然后出现一些骄傲自满。这样的周期在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都曾出现过，而现在也正处在这个周期的政策反应阶段，只不过 2015 年的 CRIC 周期比之前几年开始的要早，同时，调整的程度要更深。相对于市场的一些悲观情绪，乔虹更加乐观。她认为，政策制定者了解到的情况比一般市场人士更多，如果经济改善不是可持续的或者说不是非常明显的，政策就会继续加码。因此，她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仍然维持 2015 年中国 GDP 增长 7% 的预测。这与中国央行的报告相同，央行报告指出，中国持续释放的发展潜能将支撑中国经济保持 7% 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摩根士丹利在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之后认为，2015 年跟 2014 年的主要差别是外需比较弱。根据其预测，中国 2015 年出口增速将从 2014 年的 6.1% 下滑至 4.2%，有接近 2 个百分点的增速下滑。这主要与全球经济形势相关，同时国内需求也开始萎缩。预计在 2015 年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至少还有一次降息动作，这是在存款和贷款利率之间的一个平衡过程。代表无风险利率的中国国债收益率，在 2015 年 5 月 14 日达到了略低于 2013 年第一季度的水平。而在过去两年里，这一利率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这一结果部分是因为中国央行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定向货币宽松政策、降息、降准等产生的作用。而

未来是否会降准取决于资本外流的速度。预测未来可能还会看到央行继续使用降准这一政策，但是要看每一次资本流出到底有多少，然后才确定到底降多少。

同时，摩根士丹利预测，2015 年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涨幅为 1.3%，低于 2014 年的 2%，仍然还是存在对通缩的压力和担心。

（三）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 6.8%和 6.7%

OECD 6 月 3 日在其最新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 6.8%和 6.7%，比 3 月的预测值分别下调 0.3 个和 0.2 个百分点。OECD 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有序进行，服务业正在取代制造业和房地产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责任编辑：李 蕊

（上接第 84 页）

11. 杨君：《“新丝路”三问本报记者》，《光明日报》2014 年 9 月 11 日。

12. 陈恒：《上海自贸区 深探改革路》，《光明日报》2014 年 5 月 7 日。

13. 新华社：《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光明日报》2014 年 4 月 26 日。

14. 王宪举：《上合组织峰会：新的挑战 and 机遇》，《光明日报》2014 年 9 月 12 日。

15. 刘稚：《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光明日报》2015 年 3 月 19 日。

16. 朱艳：《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启示》，《光明日报》2015 年 3 月 22 日。

17.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光明日报》2015 年 3 月 29 日。

18. 陈恒：《中国改革开放新版图》，《光明日报》2015 年 4 月 2 日。

责任编辑：刘英奎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2013 年—2016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 年 4 月)				
世 界	3.4	3.4	3.5	3.8
发达国家	1.4	1.8	2.4	2.4
美 国	2.2	2.4	3.1	3.1
欧元区	-0.5	0.9	1.5	1.6
日 本	1.6	0.0	1.0	1.2
发展中国家	5.0	4.6	4.3	4.7
印 度	6.9	7.4	7.5	7.5
俄罗斯	1.3	0.6	-3.8	-1.1
巴 西	2.7	0.1	-1.0	1.0

世界银行(2015 年 6 月)

世 界	2.5	2.6	2.8	3.3
发达国家	1.4	1.8	2.0	2.4
发展中国家	5.1	4.6	4.4	5.2

英国共识公司(2015 年 6 月)

世 界	2.4	2.7	2.5	3.1
美 国	2.2	2.4	2.2	2.8
欧元区	-0.5	0.9	1.5	1.8
日 本	1.6	-0.0	1.0	1.7
印 度	6.9	7.3	7.8	8.1

注: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
2. 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2013 年、2014 年数据为印度官方大幅上修后数据,而 2015 年及 2016 年数据系参照官方修订后数据的预测结果。
3. 各国 2013 年、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2 2013 年—2016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世 界	3.5	3.4	3.7	4.7
进口				
发达国家	2.1	3.3	3.3	4.3
发展中国家	5.5	3.7	3.5	5.5
出口				
发达国家	3.1	3.3	3.2	4.1
发展中国家	4.6	3.4	5.3	5.7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5 年 4 月预测。

表 3 2013 年—2016 年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 年 4 月)				
发达国家	1.4	1.4	0.4	1.4
发展中国家	5.9	5.1	5.4	4.8
英国共识公司(2015 年 6 月)				
世 界	2.8	3.0	2.6	3.1
美 国	1.5	1.6	0.2	2.1
欧元区	1.4	0.4	0.2	1.3
日 本	0.4	2.7	0.7	1.0
印 度	9.5	6.0	5.4	5.6

注:1. 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
2. 各国 2013 年、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4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消费者价格同比 上涨率(上年 = 100) 单位: %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4 年		3.6	1.7	7.8
	5 月	3.9	2.0	7.9
	6 月	3.8	2.0	7.7
	7 月	3.8	1.8	7.9
	8 月	3.8	1.7	8.0
	9 月	3.7	1.7	7.8
	10 月	3.7	1.7	7.7
	11 月	3.5	1.5	7.7
	12 月	3.5	1.2	8.2
2015 年	1 月	3.1	0.9	7.7
	2 月	3.2	1.0	7.9
	3 月	3.3	1.1	7.8
	4 月	3.0	0.9	7.7
	5 月	3.1	1.0	7.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工业生产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4 年		3.2	2.7	5.2			
	5 月	3.8	2.2	5.5	52.1	53.5	53.1
	6 月	3.2	2.3	5.5	52.6	54.0	54.1
	7 月	3.8	2.4	5.0	52.4	53.8	53.9
	8 月	2.5	1.3	4.8	52.5	53.7	53.8
	9 月	3.1	1.8	5.9	52.2	53.2	52.9
	10 月	3.1	1.8	5.1	52.2	53.0	52.8
	11 月	2.5	1.4	5.1	51.8	52.3	52.3
	12 月	3.7	2.0	5.3	51.5	52.0	52.0
2015 年							
	1 月	2.5	1.7	4.1	51.7	52.9	52.3
	2 月	2.5	1.5	4.2	51.9	53.2	52.3
	3 月	2.5	1.5	4.1	51.8	53.3	52.2
	4 月	2.5	1.1	3.7	51.0	51.7	51.0
	5 月				51.2	51.9	51.4

注:1.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3 年		2.2	2.4	-2.0
	1 季度	2.7	3.6	-3.9
	2 季度	1.8	1.8	0.2
	3 季度	4.5	2.0	0.2
	4 季度	3.5	3.7	-3.8
2014 年		2.4	2.5	-0.2
	1 季度	-2.1	1.2	-0.8
	2 季度	4.6	2.5	1.7
	3 季度	5.0	3.2	4.4
	4 季度	2.2	4.4	-1.9
2015 年				
	1 季度	-0.2	2.1	-0.6

表 7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3 年		4.7	3.0	1.1
	1 季度	2.7	-0.8	-0.3
	2 季度	4.9	6.3	8.5
	3 季度	6.6	5.1	0.6
	4 季度	6.3	10.0	1.3
2014 年		5.3	3.2	4.0
	1 季度	0.2	-9.2	2.2
	2 季度	9.5	11.1	11.3
	3 季度	7.7	4.5	-0.9
	4 季度	4.5	4.5	10.4
2015 年				
	1 季度	-0.3	-5.9	7.1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3 年		2.2	2.4	-2.0
	1 季度	1.7	2.2	-2.0
	2 季度	1.8	2.3	-1.8
	3 季度	2.3	2.3	-2.4
	4 季度	3.1	2.8	-1.9
2014 年		2.4	2.5	-0.2
	1 季度	1.9	2.2	-1.1
	2 季度	2.6	2.4	-0.7
	3 季度	2.7	2.7	0.3
	4 季度	2.4	2.9	0.8
2015 年				
	1 季度	2.9	3.1	0.9

表 9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3 年		4. 7	3. 0	1. 1
	1 季度	4. 2	1. 9	- 0. 1
	2 季度	4. 3	2. 2	1. 0
	3 季度	5. 2	3. 0	1. 2
	4 季度	5. 1	5. 1	2. 5
2014 年		5. 3	3. 2	4. 0
	1 季度	4. 5	2. 8	3. 1
	2 季度	5. 6	3. 9	3. 8
	3 季度	5. 9	3. 8	3. 4
	4 季度	5. 4	2. 4	5. 6
2015 年				
	1 季度	5. 3	3. 4	6. 8

注: 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劳动力市场
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14 年		0. 8		6. 2	264. 9
	5 月			6. 3	23. 6
	6 月	2. 9	1. 1	6. 1	28. 6
	7 月			6. 2	24. 9
	8 月			6. 1	21. 3
	9 月	3. 9	1. 2	5. 9	25. 0
	10 月			5. 7	22. 1
	11 月			5. 8	42. 3
	12 月	- 2. 2	- 0. 1	5. 6	32. 9
2015 年					
	1 月			5. 7	20. 1
	2 月			5. 5	26. 6
	3 月	- 1. 9	0. 6	5. 5	11. 9
	4 月			5. 4	22. 1
	5 月			5. 5	28. 0

注: 除年度数据以外,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 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4 年	23432. 1			2. 8	28515. 3			3. 4	- 5083. 2
4 月	1950. 2	0. 1	3. 7		2393. 0	0. 6	5. 0		- 442. 7
5 月	1972. 7	1. 2	5. 2		2393. 4	0. 0	3. 5		- 420. 7
6 月	1955. 8	- 0. 9	3. 1		2379. 5	- 0. 6	4. 7		- 423. 7
7 月	1969. 1	0. 7	4. 0		2383. 2	0. 2	4. 1		- 414. 1
8 月	1973. 0	0. 2	3. 8		2385. 8	0. 1	3. 7		- 412. 8
9 月	1950. 5	- 1. 1	2. 6		2382. 4	- 0. 1	2. 5		- 431. 9
10 月	1977. 6	1. 4	2. 2		2405. 1	1. 0	3. 0		- 427. 5
11 月	1962. 0	- 0. 8	0. 6		2362. 2	- 1. 8	2. 3		- 400. 2
12 月	1949. 8	- 0. 6	1. 0		2405. 2	1. 8	4. 4		- 455. 5
2015 年									
1 月	1895. 0	- 2. 8	- 1. 8		2319. 4	- 3. 6	- 0. 2		- 424. 5
2 月	1867. 7	- 1. 4	- 1. 4		2240. 1	- 3. 4	- 3. 6		- 372. 5
3 月	1880. 0	0. 7	- 3. 5		2385. 7	6. 5	0. 3		- 505. 7
4 月	1899. 1	1. 0	- 2. 6		2307. 8	- 3. 3	- 3. 6		- 408. 8

注: 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 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3 年		2115. 0	3079. 3	- 964. 3
	1 季度	379. 4	801. 2	- 421. 8
	2 季度	612. 1	1028. 7	- 416. 6
	3 季度	531. 4	893. 5	- 362. 1
	4 季度	592. 1	355. 9	236. 2
2014 年		1066. 1	3165. 5	- 2099. 4
	1 季度	- 1034. 7	577. 7	- 1612. 3
	2 季度	653. 2	771. 3	- 118. 2
	3 季度	955. 9	969. 7	- 13. 7
	4 季度	491. 7	846. 8	- 355. 1
2015 年				
	1 季度	1921. 6	825. 1	1096. 5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0.2	-0.2	0.2
	2 季度	0.3	0.2	0.0
	3 季度	0.1	0.2	0.3
	4 季度	0.3	0.1	-0.3
2014 年		0.9	1.0	0.7
	1 季度	0.3	0.2	0.2
	2 季度	0.1	0.2	0.2
	3 季度	0.2	0.5	0.2
	4 季度	0.3	0.4	0.2
2015 年				
	1 季度	0.4	0.5	0.6

表 14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1.6	-0.8	-0.8
	2 季度	0.1	2.3	1.6
	3 季度	0.5	0.1	1.1
	4 季度	1.0	1.4	0.7
2014 年		0.9	3.7	3.8
	1 季度	0.4	0.4	0.6
	2 季度	-0.5	1.3	1.3
	3 季度	0.0	1.5	1.7
	4 季度	0.4	0.8	0.4
2015 年				
	1 季度	0.8	0.6	1.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4 年			0.02		11.6
	4 月				11.6
	5 月				11.6
	6 月	-0.3	0.23	49.0	11.6
	7 月				11.6
	8 月				11.5
	9 月	-0.06	0.08	35.0	11.5
	10 月				11.5
	11 月				11.5
	12 月	0.2	-0.01	19.7	11.4
2015 年					
	1 月				11.2
	2 月				11.3
	3 月	0.2	0.21	22.3	11.2
	4 月				11.1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1.2	-1.4	-0.2
	2 季度	-0.6	-0.7	0.0
	3 季度	-0.3	-0.4	0.6
	4 季度	0.5	0.2	0.2
2014 年		0.9	1.0	0.7
	1 季度	1.1	0.6	0.6
	2 季度	0.8	0.8	0.6
	3 季度	0.8	1.1	0.7
	4 季度	0.9	1.4	0.8
2015 年				
	1 季度	1.0	1.7	1.1

表 17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5.2	0.2	-1.7
	2 季度	-3.4	1.6	0.0
	3 季度	-2.4	1.0	0.9
	4 季度	0.0	3.0	2.6
2014 年		0.9	3.7	3.8
	1 季度	2.3	3.6	3.7
	2 季度	0.9	3.1	3.7
	3 季度	0.1	4.0	3.9
	4 季度	0.1	4.1	4.0
2015 年				
	1 季度	0.8	4.2	5.1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	%		%	%	口额
2014 年	19391		2.3	17415		0.1	1976
4 月	1596	0.0	- 1.6	1448	0.1	- 2.5	148
5 月	1611	1.0	0.3	1459	0.8	0.1	153
6 月	1602	- 0.6	3.2	1470	0.7	3.2	133
7 月	1611	0.5	2.9	1476	0.4	0.9	135
8 月	1592	- 1.2	- 3.2	1443	- 2.3	- 4.0	150
9 月	1657	4.1	8.6	1475	2.3	4.1	182
10 月	1658	0.0	4.3	1461	- 1.0	- 0.1	197
11 月	1667	0.5	1.1	1458	- 0.2	- 1.8	209
12 月	1656	- 0.7	8.4	1427	- 2.1	1.4	229
2015 年							
1 月	1638	- 1.1	- 0.7	1423	- 0.3	- 6.0	215
2 月	1685	2.9	4.3	1459	2.5	- 0.1	227
3 月	1714	1.7	10.9	1516	3.9	7.4	199
4 月	1734	1.1	8.8	1491	- 1.6	2.8	243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60	642.7	- 581.4
	4 月	- 33	153.8	- 187.1
	5 月	258	151.5	106.5
	6 月	94	15.2	78.8
	7 月	15	34.1	- 18.7
	8 月	150	60.0	90.0
	9 月	111	410.0	- 299.0
	10 月	116	107.0	10.0
	11 月	- 115	170.0	- 285.0
	12 月	- 205	- 372.0	167.0
2015 年	1 月	77	136.0	- 59.0
	2 月	331	348.0	- 17.0
	3 月	234	- 214.0	448.0
	4 月	212	72.0	140.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8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3 年		1.6	2.1	1.9
	1 季度	1.4	1.2	0.8
	2 季度	0.7	0.9	0.6
	3 季度	0.5	0.3	- 0.1
	4 季度	- 0.3	- 0.2	0.1
2014 年		- 0.1	- 1.3	0.3
	1 季度	1.2	2.1	- 0.3
	2 季度	- 1.8	- 5.1	0.4
	3 季度	- 0.5	0.3	0.2
	4 季度	0.3	0.4	0.3
2015 年				
	1 季度	0.6	0.4	0.1

表 21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3 年		3.2	1.5	3.1
	1 季度	0.6	4.0	1.1
	2 季度	2.3	3.0	2.4
	3 季度	2.3	- 0.4	1.8
	4 季度	1.2	0.1	3.1
2014 年		2.6	8.4	7.4
	1 季度	3.8	6.1	6.6
	2 季度	- 4.8	0.0	- 5.2
	3 季度	- 0.6	1.6	1.1
	4 季度	- 0.1	3.2	1.4
2015 年				
	1 季度	0.1	2.4	2.9

表 22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3 年		1.6	2.1	1.9
	1 季度	0.5	1.9	1.5
	2 季度	1.4	1.9	2.6
	3 季度	2.2	2.3	2.0
	4 季度	2.3	2.3	1.5
2014 年		- 0.1	- 1.3	0.3
	1 季度	2.4	3.4	0.2
	2 季度	- 0.4	- 2.9	0.1
	3 季度	- 1.4	- 3.1	0.3
	4 季度	- 0.9	- 2.4	0.6
2015 年				
	1 季度	- 1.4	- 4.1	0.9

表 23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3 年		3.2	1.5	3.1
	1 季度	- 0.3	- 3.7	0.0
	2 季度	1.4	- 0.6	0.5
	3 季度	4.7	2.6	2.9
	4 季度	7.2	6.8	8.9
2014 年		2.6	8.4	7.4
	1 季度	9.9	9.1	14.8
	2 季度	2.1	5.7	6.0
	3 季度	- 0.6	7.7	5.2
	4 季度	- 1.7	11.3	3.8
2015 年				
	1 季度	- 5.1	7.4	0.0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4 年		1.8	1.66	3.6
	5 月	1.0	1.64	3.6
	6 月	3.0	1.65	3.7
	7 月	- 1.6	1.66	3.7
	8 月	- 1.3	1.65	3.5
	9 月	1.4	1.68	3.6
	10 月	- 1.6	1.69	3.5
	11 月	- 1.6	1.69	3.5
	12 月	1.2	1.77	3.4
2015 年	1 月	- 2.7	1.77	3.6
	2 月	- 2.2	1.63	3.5
	3 月	- 3.2	1.72	3.4
	4 月	- 2.5	1.77	3.3
	5 月		1.78	3.3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	%		%	%	
2014 年	731052		4.8	858865		5.7	-127813
5 月	58262	-0.9	-2.7	67325	-1.3	-3.5	-9064
6 月	59415	2.0	-1.9	70467	4.7	8.5	-11052
7 月	60530	1.9	3.9	70671	0.3	2.4	-10141
8 月	60817	0.5	-1.3	69992	-1.0	-1.4	-9175
9 月	62692	3.1	6.9	73098	4.4	6.2	-10406
10 月	63854	1.9	9.6	72091	-1.4	3.1	-8236
11 月	64309	0.7	4.9	72195	0.1	-1.7	-7886
12 月	65313	1.6	12.9	71347	-1.2	1.9	-6033
2015 年							
1 月	66917	2.5	17.0	69857	-2.1	-9.0	-2940
2 月	62123	-7.2	2.4	67745	-3.0	-3.6	-5622
3 月	64388	3.6	8.5	64464	-4.8	-14.5	-76
4 月	63142	-1.9	8.0	65542	1.7	-4.2	-2399
5 月	61455	-2.7	2.4	63280	-3.5	-8.7	-1825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9548	127682	-118134
	4 月	-1351	20566	-21917
	5 月	480	7493	-7013
	6 月	2528	7027	-4499
	7 月	-818	8165	-8983
	8 月	122	6334	-6212
	9 月	2939	6944	-4005
	10 月	-1351	16368	-17719
	11 月	397	15074	-14677
	12 月	2932	13443	-10511
2015 年				
	1 月	-329	11901	-12230
	2 月	940	13833	-12893
	3 月	2928	9244	-6316
	4 月	-826	10023	-10849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3 年		2.0	1.7	2.2	2.7	6.9	1.3
	1 季度	3.2	0.8	1.8	2.8		0.8
	2 季度	2.0	1.7	2.2	3.9	7.0	1.2
	3 季度	2.7	1.6	1.8	2.4	7.5	1.3
	4 季度	2.9	2.4	2.9	2.1	6.4	2.1
2014 年		2.4	2.8	1.5	0.1	7.3	0.6
	1 季度	1.0	2.7	1.9	2.7	6.7	0.6
	2 季度	3.8	2.9	1.3	-1.2	6.7	0.7
	3 季度	3.2	2.8	1.6	-0.6	8.4	0.9
	4 季度	2.2	3.0	1.3	-0.3	6.6	0.4
2015 年							
	1 季度	-0.6	2.4	2.1	-1.6	7.5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3 年		2.9	1.4	2.9	2.2	4.7	5.6
	1 季度	2.1	1.0	2.9	1.4	4.2	5.6
	2 季度	2.7	1.8	3.0	2.6	4.5	5.6
	3 季度	3.2	1.6	3.0	1.5	5.0	5.5
	4 季度	3.4	1.1	2.9	3.4	5.1	5.6
2014 年		3.3	2.1	2.3	3.7	6.0	5.0
	1 季度	3.9	2.0	2.6	3.4	6.2	5.2
	2 季度	3.4	1.6	1.8	3.9	6.5	5.1
	3 季度	3.3	2.2	2.7	4.3	5.6	4.9
	4 季度	2.7	2.6	2.2	3.3	5.8	5.0
2015 年							
	1 季度	2.4	2.5	2.1	3.4	5.6	4.7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4 年		6.9	6.2	4.8	5.2	25.1
	4 月	6.9	6.6	4.9	5.3	
	5 月	7.0	6.5	4.9	4.9	
	6 月	7.0	6.4	4.8	4.9	25.5
	7 月	7.0	6.2	4.9	4.9	
	8 月	7.0	6.0	5.0	4.8	
	9 月	6.9	6.0	4.9	4.9	25.4
	10 月	6.6	6.0	4.7	5.1	
	11 月	6.7	5.8	4.8	5.2	
	12 月	6.7	5.7	4.3	5.3	24.3
2015 年						
	1 月	6.6	5.7	5.3	5.5	
	2 月	6.8	5.6	5.9	5.8	
	3 月	6.8	5.5	6.2	5.9	26.4
	4 月	6.8		6.4	5.8	

表 30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4 年		3.5	4.5	3.3	4.0	2.9
	4 月	3.7	4.9	3.1	3.9	2.9
	5 月	3.7	4.9	3.1	3.9	2.9
	6 月	3.6	4.8	3.2	3.9	2.8
	7 月	3.4	5.5	3.3	4.0	2.8
	8 月	3.5	5.2	3.3	4.1	2.7
	9 月	3.5	5.1	3.3	4.0	2.7
	10 月	3.5	4.8	3.3	4.0	2.7
	11 月	3.4	4.5	3.3	3.9	2.7
	12 月	3.5	3.8	3.3	3.8	3.0
2015 年						
	1 月	3.4	4.5	3.3	3.8	3.0
	2 月	3.9	4.3	3.3	3.7	3.2
	3 月	3.7	3.9	3.3	3.8	3.0
	4 月	3.7	4.3	3.2	3.8	3.0

注:1.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31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4746.3	4625.4	120.9	5050.0	6832.1	-1782.1
4 月	389.0	396.1	-7.1	403.3	566.8	-163.5
5 月	413.0	408.6	4.4	429.6	574.3	-144.7
6 月	415.4	402.8	12.5	416.4	578.3	-161.9
7 月	397.9	384.7	13.1	425.8	648.3	-222.4
8 月	394.4	398.6	-4.2	354.4	534.4	-180.0
9 月	417.2	398.6	18.6	426.6	591.5	-165.0
10 月	417.6	416.1	1.4	437.3	593.9	-156.6
11 月	374.1	371.3	2.8	448.7	535.7	-87.0
12 月	394.6	365.9	28.7	390.7	537.2	-146.5
2015 年						
1 月	348.0	332.5	15.5	346.0	503.9	-157.9
2 月	318.2	322.8	-4.5	345.4	517.1	-171.6
3 月	356.7	376.8	-20.1	416.2	539.4	-123.2
4 月	337.7	364.4	-26.7	387.5	491.3	-103.8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910.5	998.9	-88.4	2090.7	2124.1	-33.4
4 月	73.4	85.6	-12.2	197.2	201.1	-3.9
5 月	74.6	81.4	-6.9	207.5	209.4	-1.9
6 月	75.4	75.4	0.0	204.7	181.0	23.7
7 月	79.9	86.2	-6.3	230.2	214.5	15.7
8 月	71.9	87.8	-15.8	204.6	193.0	11.6
9 月	82.0	85.3	-3.3	196.2	205.6	-9.4
10 月	79.8	99.7	-19.9	183.3	195.1	-11.8
11 月	75.8	80.5	-4.7	156.5	180.0	-23.5
12 月	76.1	70.3	5.8	174.9	172.0	2.9
2015 年						
1 月	57.8	78.9	-21.1	137.0	168.8	-31.7
2 月	66.1	73.7	-7.5	120.9	149.3	-28.4
3 月	75.7	75.3	0.4	169.8	165.2	4.6
4 月	70.8	72.0	-1.2	151.6	146.7	4.9

表 33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3172.4	4604.8	-1432.4	4977.6	3080.3	1897.4
4 月	237.3	358.5	-121.2	475.8	277.7	198.2
5 月	274.2	394.5	-120.3	440.5	261.2	179.3
6 月	261.4	384.9	-123.5	407.0	267.5	139.5
7 月	267.9	401.4	-133.5	462.1	292.0	170.1
8 月	264.9	375.1	-110.2	414.5	252.8	161.7
9 月	282.1	430.1	-148.0	380.8	260.0	120.9
10 月	255.3	393.5	-138.2	415.4	268.3	147.1
11 月	256.1	424.3	-168.2	367.6	230.9	136.6
12 月	260.2	347.3	-87.1	383.8	244.9	139.0
2015 年						
1 月	238.8	322.1	-83.2	275.1	124.6	150.5
2 月	215.5	383.9	-168.5	291.6	155.6	136.0
3 月	239.5	337.4	-97.9	324.0	174.2	149.8
4 月	220.5	330.5	-109.9	314.7	164.3	150.4

表 34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5726.6	5255.1	471.5	3975.3	4056.1	-80.8
4 月	502.7	458.7	44.0	340.7	345.7	-5.0
5 月	475.8	426.1	49.8	343.8	352.6	-8.8
6 月	478.3	424.8	53.6	334.7	340.0	-5.3
7 月	482.1	458.6	23.4	337.1	346.9	-9.8
8 月	461.1	427.9	33.2	333.6	344.8	-11.2
9 月	474.5	441.9	32.6	342.6	336.7	5.9
10 月	516.3	441.0	75.3	368.8	369.4	-0.6
11 月	466.1	413.4	52.6	323.6	334.1	-10.5
12 月	494.6	439.1	55.5	341.4	338.6	2.8
2015 年						
1 月	451.2	395.0	56.2	265.5	298.2	-32.6
2 月	414.8	338.2	76.6	297.2	291.2	5.9
3 月	468.6	384.8	83.8	341.3	336.6	4.7
4 月	462.5	377.1	85.3	329.5	330.4	-0.9

表 35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5241.3	6007.7	-766.3	3138.4	2742.3	396.1
4 月	408.1	483.5	-75.4	266.0	240.6	25.4
5 月	428.1	486.4	-58.3	266.6	213.8	52.8
6 月	426.6	486.5	-59.9	267.9	249.2	18.8
7 月	442.9	494.9	-52.0	267.5	241.6	25.9
8 月	442.1	478.3	-36.2	280.9	240.0	40.9
9 月	471.3	527.2	-56.0	264.3	229.3	35.0
10 月	477.4	534.0	-56.6	269.0	222.8	46.2
11 月	484.8	545.2	-60.3	266.8	224.6	42.2
12 月	455.0	537.0	-82.0	256.5	212.0	44.5
2015 年						
1 月	438.0	484.2	-46.2	251.2	203.2	48.0
2 月	327.8	380.1	-52.2	198.6	153.0	45.6
3 月	416.2	470.8	-54.6	252.7	212.0	40.7
4 月	401.4	457.2	-55.8	234.9	187.3	47.6

表 36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2341.4	2088.7	252.7	1762.9	1781.8	-18.9
4 月	203.3	176.5	26.8	142.9	162.6	-19.6
5 月	200.8	183.3	17.5	148.2	147.7	0.5
6 月	190.2	177.5	12.8	154.1	157.0	-2.9
7 月	191.9	180.5	11.4	141.2	140.8	0.4
8 月	201.0	188.8	12.2	144.8	147.9	-3.1
9 月	200.5	171.5	29.0	152.8	155.5	-2.7
10 月	199.0	195.5	3.5	153.5	153.3	0.2
11 月	190.6	157.3	33.3	136.2	140.4	-4.3
12 月	194.5	168.0	26.5	146.2	144.4	1.9
2015 年						
1 月	177.5	152.5	25.0	133.6	126.1	7.4
2 月	148.0	135.3	12.7	121.7	115.1	6.6
3 月	180.6	159.3	21.3	136.3	126.1	10.3
4 月	166.1	147.1	19.0	130.8	126.3	4.6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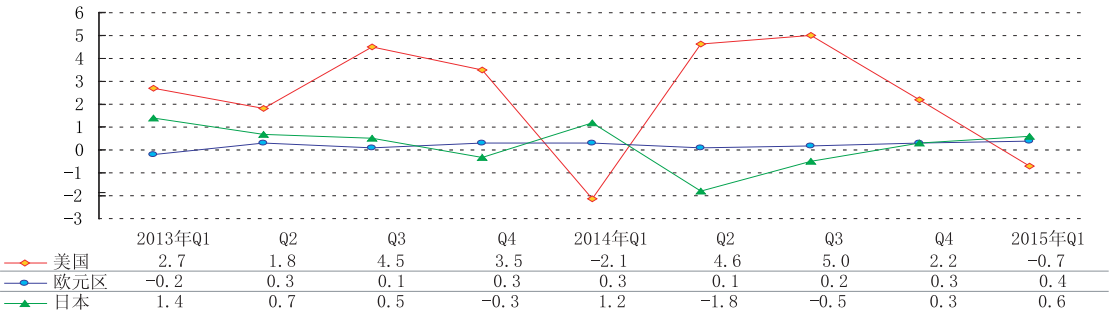


图 1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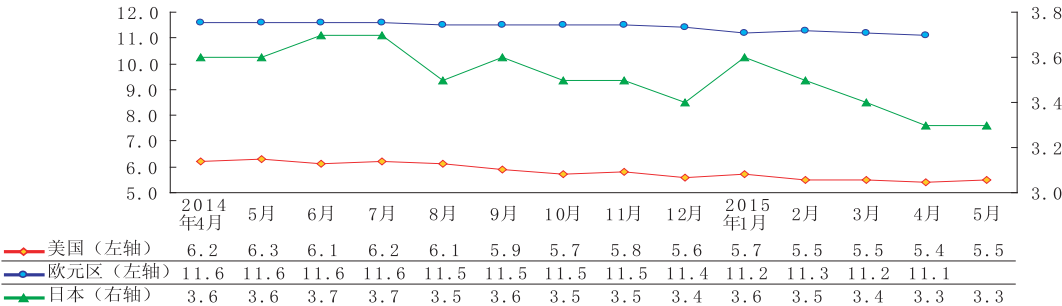


图 2 2014 年 4 月—2015 年 5 月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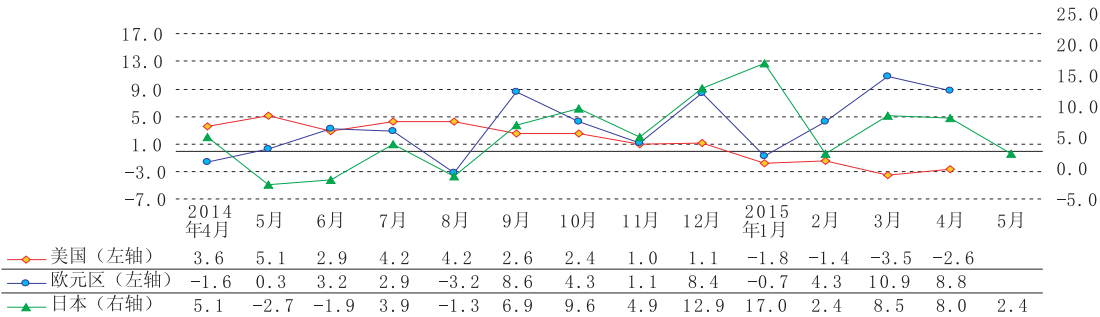


图 3 2014 年 4 月—2015 年 5 月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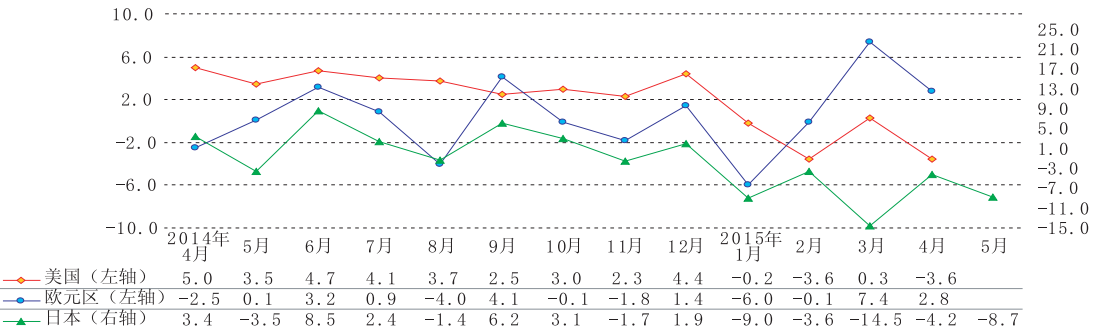


图 4 2014 年 4 月—2015 年 5 月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责任编辑:沈家文

ABSTRACTS

(1)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exchanges, mutual learning, and win-win cooperation

Liu Yandong

It is a significant consensus in terms of humans' growth vision as well as the common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fulfil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pooling global wisdom and strength, holding the main line of cooperation for win-win, we would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centered by removing poverty and advancing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diversified and harmonious civilizations and construct a fair, inclusive and orderly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governanc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hall be increased, multi-level, multi-field and multi-form innovation cooperation shall be strengthened,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shall be shared and promoted, thus cultural exchanges being deepened. Global think tanks shall take their thoughts and strategies advantages,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offer more pragmatic policies, and promot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nd-by-hand.

(2) Promot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Zeng Peiyan

Representing the mainstream of the current world's seeking for peac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 has bee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by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ut its realization still remains uneven. As a positive practitioner of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China has achieved the domestic poverty reduction target ahead of time, and proposed to co-build "One Belt and One Road"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As the United Nations is planning to propose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China is willing to make efforts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3) China's Role from the "World Factory"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pacity — Promotion of China'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Value Chain

Ding Xuedong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China, relying on the policy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cheap labor, land costs, have undertaken a larg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of production orders, acting as the "world factory", obtained a rapid growth in trade and economy.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tuation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China has come to a transitional crossroad subjectively and objectively i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 Judging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expand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rough overseas factories, joint venture and carrying out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other activities has become important measures for many countries to extend or adjust their distribution of chain overseas, to transfer domestic superiority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to improve thei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ir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paper explored and answered what kind of development path and

policy support needed for China in the proceed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 and China's exact position, and its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4) Study on New Impetus of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Nie Zhenbang, Xiao Jincheng, Ma Qingbin

In the new era, it is significant to cultivate new impetus to stimulat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steady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It is suggested to build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cusing on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ing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into modern agriculture, accelera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rural e-commerce and systems of agricultural protected areas. Activating new driving force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development is to achieve its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ccomplish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under the new normal background of services.

(5) Changes of National Supply—Demand Pattern and Choices of Policies

Yang Ping, Yue Guoqiang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 found that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phase wa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er rate of investment, greater reliance on external demand, thus domestic demand and external demand have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upward. Based on the cond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during the "Thirteen Five" period, on the demand side,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ill rely more on domestic demand and growth in consumption; while on the supply side, China will rely more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capital growth. Our government may make policy choices combined supply and demand: such as to relax restrictions on entry into the industry,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market environment, promote faste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services sectors such a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e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ing services; constantly perfect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reform in the education, health care, pension and other social areas.

(6) Analysis on China's Current Foreign Trade Situation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ang Xiaohong

China's foreign trade growth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inflection, and understanding correctly the new changes in the foreign trade situation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and achieving the "two middle-high" goals, and stabilizing employ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acing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proposes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market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cessing trade, and developing energetically service trade, playing the leading role of overse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exports, expanding actively import and speeding up the reform of foreign trade management system.

(7) Opening up overall the Port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route and building the common community of destiny

Shen Jinjian, Chen Jiaqin

The paper sets out an analysis from five perspectives as to fully open the port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route; the strategic positions and important roles played by border ports in jointly buildi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further mutual opening-up of the border ports and jointly creating of the community of destiny, interest and responsibility; new ideas on further opening-up the border port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route and creating community of destiny; speeding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the opening – up of port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route; seizing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and building the jointly open ports demonstration area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inity system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China should build the community of destiny with other countries jointly from the five aspects mentioned above with the direction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economic integration, cultural inclusiveness and perfection of system”.

(8) Analysis on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provincial econom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ormal

Huang Maoxing, Li Junjun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economy, provincial economy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Currentl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ndogenous dynamic and pow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must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 of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provincial economies.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index system of China’s provincial economy, evaluate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provincial economies from 2012 to 2013,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 Chinese provinces, thus provides the decision – making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provincial economies.

(9)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Economy & the Restructuring and Reform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i Baomin, Li Hengshi

The world today is undergoing historically huge changes, among them the most decisive one is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hich still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on the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market, global industry,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It’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and judge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th strategic vision, and realize the new engine for world economic growth, for the sake of speeding up the reform and restructuring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mixed – ownership economy, implementing the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reform, promoting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level, and achieving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actors of resources.

(10) Accelerating the Journal Evaluation System Reform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ink Tank Journals –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n Think Tank journals’ evaluation system

Shen Jiawen

The think tank journals are the important platform for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nd wide range academic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they can provide significant support for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and decision – making mechanism improvement. Currently, China’s think tanks are under the stage of rapid and regular development, and it’s urgent to bring the role of think tank journals into full play. Many restraints facing Chinese think tank journals affect their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survival, the influence power and competitiveness of new type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capability of servicing decision – mak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new type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rough speeding up the reform of current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core journals, setting up the specialized third party evalu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institutions with high market credit.

Editor: Guo Zhouming

欢迎订阅 《全球化》 杂志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 / 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企业国际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类理论月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6008/F；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0675）。刊物按照曾培炎理事长的办刊宗旨，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致力于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研究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尤其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平台。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82-572；也可填好“征订单回执”，直接汇款向我部订阅。联系人：李蕊；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5号235室《全球化》编辑部；邮编：100050；电话：010-83362183/83362182。

本刊定价：每期人民币 35 元，美元 20 元，港币 50 元，每月 25 日出版（国内免费邮寄）。

2015 年 《全球化》 杂志 （月刊） 征订单回执

订阅单位			订阅人姓名、 电话	
详细地址 (邮编)				
征订份数		420 元 / 年 (12 期)	总计金额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海外控股集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就与中国海外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研究，提供调研和分析报告，开展合作交流，召开成果发布会、举办专题论坛，开办讲座、培训等，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中心发挥智库功能，就有关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管理等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研究成果和对策性建议，为企业提供投资战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海外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联系地址：北京市王府井东街 8 号澳门中心四层（邮编 100006）
合作/咨询电话：010-58138101-302 邮箱：perc@zhwkg.com